

Eric Hsu

朱子家著

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

第一冊

春秋雜誌社印行

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

(第一冊)

朱子家著

春秋雜誌社印行

自序

對日抗戰時期，由汪精衛所領導而在淪陷區建立的一個政權，當其存在的時候，人們對它有過那樣多的揣測；於其覆亡以後，仍然會有那樣多的傳說。歷史上很少有一個政權，會像它那樣給予世人以如此不確定的觀念！到今天為止，這政權已經消逝了十四年，在事諸人，且已泰半物化，大體早因成敗而蓋棺論定，但留駐在人們心理的一項微妙感，似乎並不會完全祛除。

當兩年前姚勵頗兄創刊春秋雜誌時，認為汪政權不論其本質如何，目的如何，歷史終將寫下這一頁。不管是讓後人齒冷；或者是供後人嘆息。而戰後尚無人比較完整地寫過這一段往事。他希望我以此中人寫此中事，為讀者打破這一個謎樣的疑團。我卻不過他的盛意；事前也來不及作一個寫作的準備，糊裏糊塗就寫好了第一節交給他。

直待春秋出版以後，纔看到他代我安上了一個大題目——「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而又為我安上了我這幾年常用的筆名——「朱子家」。無可諱言，這題目在我來說是不夠莊重的。而且以我當時見聞的狹陋，我也不至於狂妄地竟會用這個包羅太廣的大題目。雖然我也曾受過有類於蠶室腐刑之痛，但我決不敢以太史公自居。用筆名寫實事，也容易引起人家藏頭露尾的誤會。然而一切既然已經決定了，在過去兩年中；我只有勉力做去，在我的筆下，盡力求其能做到「信」與「實」。

在連續寫作期內，因為忙於筆債，事前既沒有預先擬定一個大綱，更以記憶力的減退，參攷資料

的全付缺如，事實上連一個大綱也竟然無從立起。到每期春秋的最後截稿期，就隨便抓上一節往事，完篇塞責，所以前後每多倒置，次序也見凌亂。又因為我力求想做到信實，僅就我親見親聞的事實為根據，每以孤陋，失之瑣碎。假如有一天我還能重回故土，將以我的餘年，搜集資料，重為改寫，這只有期之於渺茫的將來了。這一本書，只能說是我參加汪政權的個人回憶錄，也是我流浪中的一份紀念，假如謬承讀者以史料相視，將會愈增我的慚愧。

雖然和平以後，我有過太不幸的遭遇：籍沒、羈囚、以及一頂脫不掉的帽子，但我全沒有後悔，

因為我明白本來這就是叫做政治！

公元一九五九年七月飄零第十週年

金雄白自序於香港旅次

目次

- (一) 身歷了一幕歷史的悲劇……………(一)
- (二) 一個似曾相識者的出現……………(三)
- (三) 大雨滂沱中重晤周佛海……………(五)
- (四) 德大使調停失敗的秘聞……………(七)
- (五) 近衛三原則是怎樣來的……………(一三)
- (六) 汪精衛怎樣脫離了重慶……………(一六)
- (七) 河內高朗街的槍聲血痕……………(二一)
- (八) 香港成爲最早的發祥地……………(二四)
- (九) 我提出了一連串的疑問……………(二六)
- (一〇) 形勢迫得我作一個選擇……………(二九)
- (一一) 上海愚園路一一三六弄……………(三二)
- (一二) 七十六號中的丁李搭檔……………(三四)
- (一三) 在滬積極展開政治活動……………(三七)

- (一四) 聖地亞哥一戰 (四二)
- (一五) 陳公博無奈一死酬知己 (四二)
- (一六) 汪日幻想中之全面和平 (四六)
- (一七) 高宗武陶希聖何事叛離 (四九)
- (一八) 公館派與CC間的暗潮 (五二)
- (一九) 周佛海左右之十人組織 (五六)
- (二〇) 鄭蘋如謀刺丁默邨顛末 (五八)
- (二一) 如此這般的雙方特工戰 (六一)
- (二二) 追悼會終於引開了殺戒 (六四)
- (二三) 上海爲腥風血雨所籠罩 (六六)
- (二四) 特工戰中申報首當其衝 (七〇)
- (二五) 金華亭被殺是自取其咎 (七三)
- (二六) 我逃過了五次危險關頭 (七六)
- (二七) 日軍闕徘徊於和戰之間 (八〇)
- (二八) 青島會談後三政權合流 (八四)
- (二九) 吳佩孚汪精衛魚雁不絕 (八六)

- (三〇) 爲民族英雄乎爲漢奸乎……………(九一)
- (三一) 非驢非馬的青天白日旗……………(九四)
- (三二) 同舟胡越淒其一紙名單……………(九六)
- (三三) 千迴百轉中的人事安排……………(一〇三)
- (三四) 揭開了歷史悲劇的序幕……………(一〇八)
- (三五) 汪精衛兩行酸淚立階前……………(一一一)
- (三六) 六年中的財政經濟概貌……………(一一四)
- (三七) 法幣與中儲券兩度折換……………(一一七)
- (三八) 汪日經濟鬥爭又一回合……………(一二〇)
- (三九) 紗布收購後的三項去路……………(一二三)
- (四〇) 汪周間僅有一次的誤會……………(一二五)
- (四一) 周系十人組織暗潮初起……………(一二八)
- (四二) 三個人分成兩派的習性……………(一三一)
- (四三) 稅警團成爲內訌導火線……………(一三四)
- (四四) 關於清鄉的一幕爭奪戰……………(一三七)
- (四五) 我處身在內訌的夾縫中……………(一四〇)

- (四六) 李士羣長怎樣被毒死的……………(一四三)
- (四七) 隔室中傳來的一陣哭聲……………(一四六)
- (四八) 吳開先被捕與回渝內幕……………(一四九)
- (四九) 日憲兵救了蔣伯誠一命……………(一五二)
- (五〇) 保證人所負的兩項責任……………(一五五)
- (五一) 被汪親自所否決的提案……………(一五八)
- (五二) 陳公博完成了一半心事……………(一六一)
- (五三) 南進北進所引起的揣測……………(一六三)
- (五四) 發動太平洋戰爭的內幕……………(一六七)
- (五五) 斷定了日本失敗的命運……………(一七二)
- (五六) 武裝抗日外的和平抗日……………(一七五)

(一) 身歷了一幕歷史的悲劇

我曾經目擊過一個政權的創建，以迄其沒落；而且我身親了這個政權的籌備、創建、發展，直到最後的消散。

這是一幕我自己的悲劇；朋友們的悲劇；也是中國歷史的悲劇！

到現在，事情已經過了十多年，過去的一切，也如塵、如夢、如煙般地逝去了。而曾經使我激動；使我憂傷；使我痛苦的往事，卻永遠牢繫在我的深處。

從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是中國前所未有遭受外族侵略的一個大時代，而我剛剛生長在這一段不平凡的時間，而又身歷了其間一幕不平凡的悲劇。

每個中國人一定會記得一九三八年，中國對日抗戰，已由武漢撤守而退往四川，戰局陷於極度困難與極度悲觀的時候。突然，一個會因革命而行刺前清的攝政王幾權大辟有着半生光榮歷史的人物；一個曾經是中山先生的左右手；那時又是執政的國民黨的副領袖；一個會領導過抗戰的行政首長；而且還是號稱最高民意機關——國民參政會的議長，他就是汪精衛！而他竟毅然脫離了中樞，由重慶，而昆明，而河內，而上海，而南京。在東南的一片廢墟上，在敵人槍刺下的佔領地區，樹起了與國民政府同一的旗幟，奉行同一的主義，採取了同一的政治制度，更叫着同一的名稱；但建立起基本政策絕對相反的另一政權！

遭一個惡報，自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開始，到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二日，共四個月又十二天的壽命，失敗了、消散了。於是在成王敗寇的原則下，一般人對之蓋棺論定：「汪政權的創建，是醜惡的活劇，其性質是被敵人驅策的傀儡。」但是仍然也有人發生了疑問，像汪氏這樣的人，真會爲了利祿或者爲了意氣，甘心於出賣國家民族，以自毀其半生光榮的歷史嗎？這一羣被指爲國家的叛逆者們，當時做了些什麼？與想了些什麼？或許真如人們對他那樣地想像，但畢竟經過了五年多的一段時期，以及佔據有廣大地區的一個空間，歷史終將寫下這一頁。我不想爲自己辯護，爲朋友們洗刷，爲失敗的政權文飾。我願意憑了我的良知，就記憶中所留存的一點一滴，儘量忠實地，寫出身親目擊的真相，作爲後人的殷鑒與嘆息！

此自信應該有資格寫這一段沉痛的回憶，因爲在這是一個政權中，在黨，我是中委；在政，我的官階是特任，而最重要的一點，我又參加了汪政權合柱周佛海的最機密部份。而在政權沒落以後，我又能躬與其盛，被籍沒了所有的財產，以漢奸罪判處了十年徒刑。唯一可以引爲安慰與認爲德律的，是法院莊嚴的判決書中，竟然確認我有一「協助抗戰，有利人民」的事實和證據，「法外施仁」，竟邀末減，以徒刑兩年半的一紙判決書，代替了一枚勝利勳章。因此，讓我能終始其役，目親了這一幕不平

凡悲劇中許多重要脚色，當初怎樣忍淚登台，最後又怎樣從容赴死。從鑼鼓登場，直至曲終人渺。在寫出這一幕往事之前，我所認爲值得遺憾的，當一九四九年，又一個大時代來臨的時候，我深怕捲入了另一次漩渦，拋妻別子，倉皇南來，臨行前把一切文件，包括書函、紀錄、照相、密件、報刊、都把它焚棄了。現在祇能純憑藉記憶來追寫。其中特別關於人名、時間等，相信一定會發生很多錯誤。同時，我也不否認人總是容易被感情所支配，有主觀，也會有恩怨，雖然我將儘量不向壁虛構

，不顛倒黑白，我仍然期待讀者們的指教、糾正和原諒。

(二) 一個似曾相識者的出現

一九三八年冬天，上海四周的砲聲，早已趨於沉寂。而租界裏卻呈現着一片畸形的繁榮，市民們驚魂初定，轉而就於逸樂。也有人于悵惘中看到咫尺之間的南市、閘北、浦東，敵人鐵騎縱橫，奸淫燒殺，漢奸們所組織的維持會更助桀為虐。同胞們的血淚洒遍了各處，但祖國離他們卻一步一步地遙遠。對抗戰的最後勝利，每個人雖然仍抱着殷切的期望，但誰也不敢預料抗戰將再經過多少的時候，與將在怎樣狀態下取得勝利。淪陷區民衆的心理是複雜的，正在危疑震撼之中，而一個突如其來的消息，使市民們感到驚愕。前行政院院長汪精衛忽然從重慶出走，抵達了越南的河內，而且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發出了艷電，響應日本首相近衛文麿「調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之聲明」，即所謂善隣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携的「近衛三原則」。這一個消息太突兀了！使上海所有的市民紛紛猜測。而接着，上海各報又接到了中央對汪的行動暫時不許攻擊的通令。於是，在無法獲得真相以前，上海的市民們相信蔣汪之間是在玩着一面抗戰一面談和的雙簧。這傳言是够厲害的，我竟也是被迷亂者之一。做久了記者的我，窺探秘密的好奇心，已養成習慣，但是，當時在淪陷了的上海，卻怎樣也無法證實這一項傳說的真偽。

幾個月過去了，汪精衛已經由河內到達上海，中央且已通過了對汪開除黨籍的決議，汪的言行也

一天一天趨於明朗，汪派的中華日報，且已在滬復刊，兩人們心裏「白雲」

直至一九三九年八月的一個中午，我正在上海南京路冠生園三樓午飯，當飯畢行經二樓時，新聞界的舊友葉如晉也正在進食，他起來向我招呼，旁邊還坐着一個白淨面孔的人，我向他瞥了一眼，好似有點面熟，但我已完全記不起他是誰了，他也望着我，祇微微的一笑，他沒有開口，我就先走開了。隔了一天，如晉忽然同了那位似會相識的人到我家裏來，一開始就由他自我介紹說：「我是羅君強，恐怕你忘記了我。十年前，周佛海先生兼總司令部政治訓練處長時，我是他的主任秘書，在周先生南京舒家花園的公館，你和布雷、力子先生不是還和我打過好幾次麻將？」我纔記起了確實有一個他。接着他開門見山地對我說：「周先生已隨汪先生來到了上海，現在暫時住在虹口江灣路，他說在漢口時曾經接到過你的去信，你說希望能轉至後方爲抗戰効力，他本想在中央宣傳部中，請你担任新聞處長一職，後來剛因戰局不利，政府退往重慶而作罷。今天他要我來看你，希望你能約定一個日期，和他談一次。」我被出於意外的談話所驚住，一時不知應當怎樣答覆。不錯，我與佛海之間，過去十年中存有相當的友誼。民十八，我正担任京報採訪主任一職時，奉派隨蔣先生北上赴平，在蔣先生的專車中，陳布雷、邵力子等，都是多年的同業；孔祥熙、趙戴文（那時的內政部長）、熊式輝等因採訪關係，也早已認識。而當時隨節諸人中，不認識的還是很多。當專車開行以後，我們正聚在起居室中間談時，蔣先生從前一節車過來了，他問我同車的是不是都相熟。我指指周佛海，表示我與他並不相識，這樣蔣先生爲我們介紹了，友誼也就這樣的開始。在北平的一週中，我們每天共遊宴，周氏有湖南人爽朗的脾氣；也有書生的性格，因此談得很投機。以後回到了南京，我們來往得很密，而且他爲我在政治訓練處掛了一個上校秘書的名義，按月由他所主辦的新生命書店送給我一份乾薪。自政府

西撤以後，就僅僅通過幾封信。睽隔多年，在情感上，我無可諱言希望能見他一次；而且我知道他與蔣先生間關係之深，而此次竟會隨汪出走，這是政治上的一個謎，引起了我的好奇。我脫口而出的說：「當然，我也希望與他談談，但是我不願意過橋（指外白渡橋）向敵軍除帽鞠躬。有負他的盛意，恐祇能期之於異日了。」君強說：「那容易辦，假如他到租界來時，再約你見面何如？」我不能推卻，事情也就這樣的決定了。

(三) 大雨滂沱中重晤周佛海

四五天之後，民國二十八年的八月中旬，一個天低欲壓而又大雨滂沱的下午，葉如晉又匆匆而來，說汽車已等在外面，佛海特地由虹口來到滬西，在極司斐爾路七十六號專誠等我，希望能立刻去與他談一談。我什麼準備也沒有，就匆匆地隨着他上車，不到二十分鐘的行程，已經到達了那裏。極司斐爾路本是外人的越界築路，馬路歸公共租界工部局管理，而兩側的房屋，則是華界的主權，滬西一帶那樣許多越界建築的道路，就是一個舉世所無的特殊狀態。

汽車到了門口，門外靜悄悄地什麼聲音也沒有，鐵門緊緊的關閉着，我仰頭一望，恍然於這原是前山東省政府主席陳雪暄（調元）的別墅。房屋建造得並不華麗精緻，但所佔據的地位卻相當廣大。就在抗戰前兩三年，陳雪暄曾在那裏為他的母親祝壽，那時賓客如雲，連天的盛大堂會，為上海稀有的場面，我曾經為那裏的賀客之一。不料幾年之後，陳雪暄死了，他那清幽的別墅，竟然成爲一幕歷

史悲劇的孕育之處。汽車的喇叭聲響了幾下，鐵門「由一乍」滑開了。且說明了要見的是什麼人，警衛室事前似已預先接到了通知，衛兵向車中注視了一下，大鐵門就呀然而啓。汽車緩緩前進，一個武裝衛兵立上了車外的踏腳板，指揮汽車在一條平廣的水泥路上，經過了第二道鐵門，直向一所廣廈駛去。雨下得很大，四周的景色在雨點中顯得模糊一片，但氣氛令人感到緊張。兩面的衛兵們五步一崗，十步一哨，一身給黑色的雨衣雨帽連頭裹住，樣子像照片上看見的美國三K黨，手裏更持有長短的槍械，像隨時防備突然事變的發生。我情緒上有些不寧，已很有多此一行行的後悔。如晉看看我，我發覺他與我有同樣的感覺，我輕輕的問他：「你來過嗎？」他搖了一下頭，像陷入於沉思，默默地一聲不響。我們在對視中，車停止了，車邊的衛兵跳下來告訴屋前的另一衛士，開了車門，導引我們進入一間陳設簡陋的會客室。

兩分鐘以後，周佛海已微笑地出現在我的面前，蓬鬆的頭髮，微帶着黑的皮膚，穿一件藍綢長衫，幾年不見，比從前豐腴了一些，但臉上顯出有疲勞的神態。他的外表不必恭維，他有讀書人的風格，至少他像一個樸實的中小學教員。從他的面貌以至與人晉接的態度來看，他絕對不像是一個政客。誰會想到他以一個窮學生，民十（一九二一年）還在日本西京帝國大學留學時期，已經是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十個代表之一，而且被選為黨中央的副主席，其地位僅次於陳獨秀。後來佐蔣先生的戎幕，前後二十年中，儘管職務有過許多變動，自黃埔軍校的教官起，一直到他離渝前的代理中央宣傳部長爲止，除了寧漢分裂一段時期他留在漢口外，其餘的時間，他都朝夕不離的隨侍在蔣先生的左右，有許多重要文告，都出自他的手筆。而且是CC的最高幹部與黃埔系的指導階層。聞揚孫文學說的所有著作中，也以他所寫的「三民主義理論的體系」爲最權威的著作。但在他的形態上，找不出一

絲這種氣息。我從民十八與他交游起，十年之中，祇覺得他具有豪爽的性格，以及親切的談吐。現在立在我面前的他，已經成爲一個傳奇性的人物，卻依然如十年前初見時完全一樣。

(四) 德大使調停失敗的秘聞

佛海與我們熱烈握手，他似乎有些感喟地說：「我想不到你竟然到這裏來看我，這是我到上海後第一個看到的故人了。」看樣子他也還是第一次來到這裏，目光向四周掃射了一下，發現後面牆壁上，還掛着當年他送給陳雪暄母親的一副湘綉壽聯，他停視了一下，又接着說：「短短幾年中，連這裏的情形也完全改變了！過去雪暄一切的陳設，已蕩然無存，而獨獨留着這一副我所送的壽聯，一飲一啄，豈不莫非前定？誰想到最後勝利的來臨之前，我會閒關萬里的舊地重游，而又親見了當年我自己的舊物！」我不知應當如何答覆他言下的無窮感喟，我與如晉都以微笑來代替言辭。

他從回憶中猛然地醒過來，單刀直入說：「我叫君強找你的原因，我是隨了汪先生來創造一個局面，但隨我來的除了我太太與兩個孩子以外，祇有君強與惺華（楊惺華是他的內弟）。汪先生已決定如全面和平絕望，爲了拯救國家，將另行組府，還都南京。舊日的朋好，都在重慶，上海的一切情形你太熟悉，憑了我們十年的交誼，這次非請你幫忙不可。」我夢想不到他竟會直截了當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我覺得再不能含糊了，我也老實地說：「雖然在友誼上，我希望能與你見一面，此外，汪先生的行動，引起了外界的揣測，尤其你與汪先生向無淵源，何以會忽然合在一起？做慣了新聞記者的我，

項自由職業律師職務，業務還不錯，溫飽有餘以外，還足夠供我的揮霍，你停止努力吧！

或許有你們的作用，但我以悠閒之身，無意於捲入爲國人所不諒的政治漩渦之內。」

「我不會讓你糊裏糊塗的參加，希望你靜靜地聽了我告訴你前後果之後，再作鄭重考慮。今天，我並不勉強你立時有一個決定。」說來真是話長了！他又嘆了一口氣，「國事不是兒戲，也不應當純憑一時的意氣。當年日本的步步進逼，遲早會有這一天的；但抗戰前夕的形勢，顯然還不宜輕於言戰。自從北伐以後的幾年中，國力都消耗於內戰，當時空軍未曾建立，軍備也遠不足與強大的日本爲敵，但是純潔的民衆與別有用心的黨派、政客，正在大唱抗日的高調，蔣先生是清楚知道這一點的，他既無法抑制當時激昂的民氣，又不能宣洩國家實力的秘密。抗戰固然無可避免，但不應當在準備未完成前，作冒險的嘗試。你也許知道當時政府高級人員中，文的如汪先生，武的如何××，也會提出過審慎的意見。尤其我在南京西流灣的寓所中，許多比較知好的朋友，時常聚談有關國家興亡的當前局勢。如胡適、陶希聖、梅思平等，曾就一般的實際問題，不時加以討論，加以分析，我們會經自稱之爲「低調俱樂部」。而七七事變之後，以日本的得寸進尺，國內民情洶洶之勢，終於無法挽救這一次空前浩劫！」

他停頓了一下，又繼續着說：「在過去的一段戰爭過程中，日本顯然已有過兩次的錯誤。在開戰以前，日本過於低估了我們的實力，他真以爲三天可以佔領淞滬；三個月可以掃平全國。日軍打到南京，國軍在大潰退以後，顯然一時已喪失了鬥志，但日本以爲我國政府一定會屈服，祇願肆行屠殺，按兵不動。假如當時他們乘勝追擊，抗戰的能否持續，還是一個絕大的疑問。而日本犯了兩次重大的

錯誤，曠日費時，他們有了前途茫茫之感；而我們也有其不可終日之勢，但最後錯過了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調停這一個機會以後，雙方儘管都已筋疲力盡，事實上還必須僵持下去。」

「陶德曼大使爲中日調停的一幕，是太足令人惋惜了！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十一月下旬，陶德曼送來了日本讓和基本條件七項，大體是這樣的：日本答應分期撤兵，與放棄賠償。華北一帶，恢復七七事變前何梅協定的原狀，唯一的要求，是要承認『滿洲國』。我們接到了上項條件以後，就在那一年的十二月六日，在漢口中中國銀行，召集了一次國防最高會議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在會議中雖然有不同的意見，但終於正式通過了有條件的接受日本停戰條件。當時蔣先生正在鄭州部署軍事，國防會議推孔庸之（祥熙）代表向蔣先生報告，以作最後決定。」

「會議以後，孔庸之就在電話中，就陶德曼轉來日本條件的內容，國防最高會議中委員們個別的意見，以及最後的決議，向蔣先生詳述了一遍，請其裁決。蔣先生當時的意思是：除了承認『偽滿』以外，日本的條件不能算太苛，他說：「如此，日本又何必輕啓釁端？可照國防會議的決定，依外交途徑去進行。」通話本已告一段落，而蔣先生忽又說還是把全部文件送給他，讓他再作一度的考慮。電話就這樣結束。而雙方卻因匆匆通話，未注意到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日本所定最後答覆的期限，竟然沒有報告蔣先生。那時日本內閣首相林銑十郎已因外交政策解組，復由近衛文麿組閣，廣田任外相，日本所提議和基本條件七項，廣田本限年終答覆，後經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之要求，始允延長至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一月十日。」

「漢口方面自孔庸之與蔣先生通話後，立派專人把有關陶德曼調停的重要文件，送給蔣先生。專人到達鄭州時，蔣先生已轉赴洛陽，再追踪到洛陽，時間畢竟已有些就誤了。蔣先生最後的指示，仍

12/6/37

然依照國防會議的決議，與他在電話中所決定的一樣願與日本談和。政府立刻通知陶德曼大使正式表示中國政府的意見。陶德曼發覺中國政府的答覆，顯已超過了日本所定的最後限期。但他仍然把答覆轉達了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

「當陶德曼轉到德國駐日大使館時，德駐日大使狄克遜急忙趕去訪問那時的日本首相近衛，希望對期限的延遲，有所解釋，但當他到達外相官邸時，才知道近衛正在出席一項重要會議。狄克遜一直坐候他回來，才把中國政府的覆文當面提出，近衛皺着眉頭說：日本政府因為得不到中國政府有關停戰條件的答覆，在期限屆滿以後，立即舉行了剛才我所出席的御前會議。鑒於中國政府沒有談和的誠意，已有了了一個決議，這決議是在御前舉行的，是無可挽救的決議。這就是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永不以國民政府為交涉對象』的近衛內閣聲明。陶德曼大使的調停，至此乃完全絕望。」

（附錄）

國防最高會議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時

地 址：漢口中央銀行

出席：于右任 居正 孔祥熙 何應欽
列席：陳果夫 陳布雷 徐謨 翁文灝 邵力子 陳立夫 董顯光
主席：汪副主席
秘書長：張羣
秘書主任：曾仲鳴

徐次長謨報告：「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於上月二十八號，接得德國政府訓令，來見孔院長，二十九號上午，又見王部長，據稱「彼奉政府訓令云：德國駐日大使在東京會與日本陸軍外務兩大臣談話，探詢日本是否想結束現在局勢，並問日本政府欲結束現在局勢，是在何種條件之下，方能結束；日本政府遂提出條件數項，囑德國轉達於中國當局。其條件爲（一）內蒙自治。（二）華北不駐兵區域須擴大，但華北行政權仍全部屬於中央，惟希望將來勿派仇日之人物爲華北最高首領。現在能結束，便如此做法。若將來華北有新政權之成立，應任其存在；但截至今日止，日方尙無在華北設立新政權之意。至於目前正在談判中之鑛產開發，仍繼續辦理。（三）上海停戰區域須擴大；至於如何擴大，日本未提及，但上海行政權仍舊。（四）對於排日問題，此問題希望照去年張羣部長與川樾所表示之態度做去，詳細辦法係技術問題。（五）防共問題，日方希望對此問題有相當辦法。（六）關稅改善問題。（七）中國政府要尊重外人在中國之權利」云云。陶大使見孔院長王部長後，表示希望可以往見蔣委員長，遂即去電請示，蔣委員長立即覆請陶大使前往一談。本人乃於三十日陪陶大使同往南京。

在船中與陶大使私人談話，陶大使謂：中國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戰精神，如今已到結束的時機。歐戰時，德國本有幾次好機會可以講和，但終自信自己力量，不肯講和，直至凡爾賽條約簽了內

時候，任人提出條件，德國不能不接受。陶大使又引希特勒意見，希望中國考慮；並謂在彼看，日本之條件並不苛刻。十二月二日抵京，本人先見蔣委員長，蔣委員長對本人所述加以考慮後，謂要與在京各級將領一商。下午四時又去，在座者已有顧墨三、白健生、唐孟藩、徐次辰。蔣委員長叫本人報告德大使來京的任務。本人報告後，各人就問有否旁的條件，有否限制我國的軍備。本人答稱：據德大使所說，只是現在所提出的條件，並無其他別的附件，如能答應，便可停戰。蔣委員長先問孟藩的意見，唐未即答。又問健生有何意見。白謂只是如此條件，那麼爲何打仗？本人答：陶大使所提者只是此數項條件。蔣委員長又問次辰有何意見？徐答只是如此條件，可以答應。又問墨三，顧答可以答應。再問孟藩，唐亦稱贊同各人意見。蔣委員長遂表示：（一）德之調停不應拒絕，並謂如此尙不算是亡國條件；（二）華北政權要保存。

下午五時，德大使見蔣委員長，本人在旁担任翻譯。德大使對蔣委員長所說，與在漢口對孔院長王部長所說者相同，但加一句謂：如現在不答應，戰事再進行下去，將來之條件恐非如此。蔣委員長表示（一）對日不敢相信；日本對條約可撕破，說話可以不算數。但對德是好友，德如此出力調停，因爲相信德國調停之好意，可以將各項條件作爲談判之基礎及範圍。但尚有兩點須請陶大使報告德國政府：（一）關於我國與日談判中，德國要始終爲調停者，就是說，德國須任調人到底；（二）華北行政主權須維持到底。在此範圍內，可以將此條件作爲談判之基礎。惟日本不可自視爲戰勝國，以爲此條件乃是哀的美敦書。德大使乃問：可否加一句？蔣委員長說：可以。德大使說：在談判中，中國政府宜採取忍讓態度。蔣委員長云：兩方是一樣的。蔣委員長又謂：在戰爭如此緊急中，無法調停，進行談判，希望德國向日本表示，先行停戰。陶大使稱：蔣委員長所提兩點，可以代爲轉達，如德國

願居中調停，而日本願意者，可由希特勒元首提出中日兩方先行停戰。蔣委員長說：如日本自視爲戰勝國，並先作宣傳，以爲中國已承認各項條件，則不能再談判下去。在歸途中，陶大使表示，以爲此次之談話有希望。離京時，陶大使並對蔣委員長說：此項條件並非哀的美敦書。陶大使在船中即去電東京及柏林，但至今尚未有回復，此後發展如何，尙不可知。」

附註一：國防最高會議主席是蔣中正，副主席是汪兆銘，當時國府表面上由南京遷往重慶，實際上在武漢辦公，蔣主席因軍事指揮，留在南京，故國防會議，由汪副主席代理主席。

附註二：外交部長王寵惠，亦爲常務委員之一，是日因感冒請假，故由次長徐謨列席，且徐次長新僭德大使由南京回，亦有列席報告之必要。

附註三：徐次長報告中所說墨三，是願祝同；健生，是白崇禧；孟瀟，是唐生智；次辰，是徐永昌。

(五) 近衛三原則是怎樣來的

周佛海一口氣講完了這一節故事，雖然我來此見他的目的，並不爲了聽聽還是漢口時期的陶德曼調停經過。我呆呆地坐着，在猜想他何以要告訴我這些故事的原因。他好似看出了我的神情，繼續又說：「希望今後不再提這些舊事了，但我既要你幫忙，我願意趁今天大家都有閒空的一個下午，把『和平運動』的前因後果，說個暢快。」我說：「上海離開後方太遠了，我們只知道政府是拒絕了德國大使的調停，原來中間還有那麼多的曲折。任何有關戰局的事，都是我所關心，我所願意知道的。」

佛海在微喟中，又道出一段當時的秘聞，他說：「陶德曼大使的調停，既然陰錯陽差的無疾而終，戰爭也只有延長下去了。那時日軍發動的攻勢，較前更加猛烈，衝破了武漢外圍長江的馬當和田家鎮的封鎖線以後，一作爲行都的漢口，無法再守，政府就一直撤守到重慶。國際形勢，顯然對我不利，許多人對最後勝利的信念，起了動搖。戰局上，北起渤海灣，南至廣州灣，完全被日軍佔領而封鎖了。我們已再沒有通達國際的海口，英美對我的幫助，卻遠不如以物資運往日本那樣的多，靠自己的國力來支持抗戰，所有補給軍需，當然是不可想像的。給我國最大的一項打擊是僅餘的一條國際通道緬滇公路也被英國宣佈封鎖了，這予士氣與民心以最嚴重的影響。政府也爲了當前的局勢所困擾，汪先生等許多政府的重要人士，不得不把抗戰前途重加考慮，在考慮中，自然而然會想到漢口時代陶德曼大使所提出的日本停戰條件，假如日本仍然維持原來條件的話，國家還不至於滅亡。不如先保全一線生機，以期之於異日的發奮圖強，瀟雪前恥。况且最高國防會議既然曾經有過接受的決議，在危急中何妨作再度的試探。」

「那時汪先生把試探日本關於戰事意向的責任，付託於當時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的身上，高是著名的『日本通』。他奉命後從重慶秘密飛往香港，再轉赴日本，與日首相近衛晤見之後，就帶回來對兩國停戰問題的三項原則，即所謂：『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携』的近衛三原則。宗武回到重慶，首先呈給汪先生，汪先生認爲大體上可以同意，遂把宗武携回的近衛原則拿去見蔣先生，蔣先生素來對汪的態度是相當客氣的，當時表示經過縝密考慮後，再給日本答覆。」

「據說，中樞爲此會召集過若干重要文武大員，徵詢對日停戰意見，並以近衛三原則爲藍本，而作進一步的研究。當時在座的人都僅在聽取蔣先生的意見，持異議的只有陳××、××等數人，他們

基本上有一個觀念，以爲假如終止抗日，是給予國內反政府份子以藉口，不論爲共產黨、桂系、馮系，都將振振有辭地以行動來反對政府，另一次的內戰，勢將不可避免，因此，他們認爲一旦停止抗戰，結果必然將禦侮之戰變爲鬪牆之爭。中樞若抗戰到底而成功，無疑領導抗戰者將爲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即使抗戰失敗，而領導抗戰者爲國禦侮的精神，仍將永垂青史。在座諸人既未有再發表意見，便在這樣的結論下，結束了這一次談話。爲蔣先生個人計，停了抗戰，再打內戰，這算盤無論如何是打不通的。自然，這消息也傳到了汪先生的耳裏，他正在將信將疑之間，蔣先生派人與汪先生約晤，率直地表示了拒絕近衛所提出的停戰原則。」

「那時國家的實力是這樣，而希望得到國際間的援助，又是那樣。汪先生對於抗戰的看法是，除非產生奇蹟，否則前途是黯淡的。何況汪先生又十分瞭解蔣先生的個性，既經決定了的事很難變更，但他仍然想如何說服蔣先生。對於日本，因此並未立刻予以答覆。在這中間，我（周自稱）奉命與汪先生談過幾次，汪先生有很沉痛的意見，以爲在國家的存亡關頭，不應當以一二人的成敗毀譽作爲決定國家命運的標準。他目標中共借了抗戰的機會，在擴充實力，志不在小，即使抗戰能够獲得勝利，但國軍於抗戰中是在消耗，而共軍是在增強，戰後的內亂，同樣不可避免，肘腋之患，國家的未來命運，更在不可知之數。我與汪先生的觀點，不期而有若干相同之處。」

「然而，當時的輿論，似已爲有作用的野心份子所左右，高調仍然是奉爲最高原則，有人主張談和的，就成爲攻擊的目標；就是漢奸！日本的意向，一般人固然不知道，而我國軍事上劣勢的機密，政府也不能宣之於國人。汪先生是決定抗戰政策的最高首長之一，在國策未變更以前，他不能發表與國策相反的言論，而且週遭的形勢，也不許可他那樣做。他經過了幾度的躊躇，終於決定了離開職位

，離開重慶，以一個黨員與一個國民的身份，爲了國家前途，向政府提出建議，提出個人的主張。這是汪先生要脫離重慶的真正原因。」

(六) 汪精衛如何能脫離重慶

佛海爲我追述那一段經過時，情緒很激動，但我說不出他是興奮還是傷感。過去我與他交往中，平日所談，多關風月，很少牽涉到國家大事，他總是很風趣，也很輕鬆，因此，那一天特別顯出了他態度的鄭重。

他接着說：「汪先生對抗戰前途既有看法，爲表示他對於國是的意見，自願以在野的國民身份，向中樞提出和平建議。他明白那樣的建議，在重慶決沒有接受的可能，而且不會有公開發表的機會，所以他決定相機出國，再把與日人交涉經過，訴之國人，以待民意的公決。他第一個目的地是越南，赴越也必須經過雲南，他先派汪夫人單獨秘密赴昆明，以期取得龍雲的諒解。迨汪夫人去後返渝覆命，說龍雲很同情汪氏爲國家犧牲一己的精神，假如他決定取道滇境出國，他願意負安全與便利的責任。」

「恰巧那時蔣先生離渝出巡去了，汪先生打電話給交通部長彭學沛，要他預留幾個最近飛往昆明的飛機客位，並且把飛機票直接送給汪先生。那時中樞要人離開重慶，若非因公，必先獲得最高當局的批准。但是汪先生地位不同，而且彭學沛又是汪先生一系的人物，他除了唯唯聽命以外，自然不敢

問搭機者的姓名。同時，他也夢想不到搭機的就會是汪先生。在這一段時間中，沒有人發覺汪先生的動靜，機票也由彭學沛於班期的先一日送到。戰時一切處於特殊狀態之下，政府所預定的客位，乘客姓名照例不通知航空公司，航空公司即使知道，因為預防敵機襲擊關係，也照例保持機密。汪先生的能够順利離渝，就是得了這一個便利。

那天，離飛機起飛前三分鐘，汪先生、汪夫人、曾仲鳴等趕到了，僅携着簡單的行李，一到機場立刻登機，派在機場負責監視責任的保密人員，平常照例需要查驗搭客離渝手續，但是他們對汪先生儘管感到突兀，不敢問，也不敢阻止，飛機飛航在即，連保密人員向上級請示的時間也沒有。起飛時問到了，汪先生很從容地脫離了重慶。時為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十二月十八日，以後我也以視察黨務為名，追跡前往。

汪先生離渝前，留下了一封長信給蔣先生，大意是分析當前的國際環境，指出抗戰前途的形勢，要求蔣先生能諒解他的苦衷。最後有兩句話，記得原文是『今後兄為其易，而弟為其難。』汪先生的意思，彼此為了國家，原則上決無二致，但所定的策略與應取的途徑，一時容有歧異。汪先生所說的難與易，就是指的抗戰與和平。因為不論其為勝為敗，凡獻身於抗戰陣營者，無疑都將成為民族英雄；但要保全國家元氣，與敵言和，則頭緒萬千，事繁責重，尤其軍事處於劣勢狀態之下，日本以戰勝者之地位，未必肯真心讓步，和談條件，就很難鑿國人之望，措置稍有不當，條款稍有出入，則以苦心為國始，而以千古罪人終。但汪先生認定前方的軍事，與滇緬公路的封鎖，抗戰有難乎為繼之勢，及今談和，國家尚可免於糜爛，而蔣先生抗戰到底之意，既然一時無法動搖，則如其最後勝利，仍然屬我，則國家一切，自有蔣先生。如不幸而抗戰被迫作城下之盟，則汪先生與日本媾和在前，日人

自難反汗，今後一切，有汪先生來担当週旋的大任。和戰並進，爲國家打算，不盲才識長一。作善自計謀。或許外間所傳蔣汪變簧之說，卽淵源於此。我前後十餘年中受蔣先生推心置腹的知遇之隆，不論從任何方面講，均不應背棄蔣先生，因此，我在離渝以前，也留了一封信給布雷，請他等蔣先生回渝後轉呈，除聲述離渝苦衷以外，我向蔣先生矢言得當以報的決心。」

「迨我們先後到達昆明，龍雲果然能克踐前言，在我們留滇之時，一連幾天，彼此談得都很投契。以後我們離滇赴越，他還派了人沿途妥爲保護。抵達越南的河內以後，汪先生就暫時卜居在高朗街二十七號，準備向中央提出和戰意見。因爲日本近衛內閣曾經有過今後不與國民政府爲交涉對象的聲明，因此汪先生要求近衛如要談和，首先必須取消這一項聲明。也因此，近衛復於一九三八（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重新發表『調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之聲明』，即所謂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携的三原則，自動取消前一聲明。汪先生也於同月二十九日通電響應，此卽艷電是矣。」

（附錄）

（一）艷電原文

重慶中央黨部，蔣總裁，暨中央執監委員諸同志均鑒：

今年四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說明此次抗戰之原因，曰：「自塘沽協定以來，吾人所以忍

辱負重與日本周旋，無非欲停止軍事行動，採用和平方法，先謀北方各省之保全，再進而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權及行政之完整為最低限度。在經濟上以互惠平等為合作原則。

自去歲七月蘆溝橋事變突發，中國認為此種希望不能實現，始迫而出於抗戰。頃讀日本政府本月二十二日關於調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的闡明：第一點，為善鄰友好。並鄭重聲明日本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國之主權，且將仿明治維新前例，以允許內地營業之自由為條件，交還租界，廢除治外法權，俾中國能完成其獨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鄭重聲明，則吾人依於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復，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則吾人遵照宣言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實為應有之決心與步驟。

第二點，為共同防共。前此數年，日本政府屢會提議，吾人願慮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國之軍事及內政。今日日本政府既已闡明，當以日德義防共協定之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則此種顧慮，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產國際之擾亂與陰謀，對蘇邦交不生影響。中國共產黨人既聲明願為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奮鬥，則應即澈底拋棄其組織及宣傳，並取消其邊區政府及軍隊之特殊組織，完全遵守中華民國之法律制度。三民主義為中華民國之最高原則，一切違背此最高原則之組織與宣傳，吾人必自動的積極的加以制裁，以盡其維護中華民國之責任。

第三點，為經濟提攜。此亦數年以來，日本政府屢會提議者，吾人以政治糾紛尚未解決，則經濟提攜無從說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鄭重闡明尊重中國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並闡明非欲在中國實行經濟上之獨佔，亦非欲要求中國限制第三國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則，以謀經濟提攜之實現，則對此主張應在原則上予以贊同，並應本此原則，以商訂各種具體方案。以上三點，兆銘經熟慮之後，以為國民政府應即以此為根據，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日

本政府十一月三日之聲明，已改變一月十六日聲明之態度，如國民政府根據以上三點，為和平之談判，則交涉之途徑已開。中國抗戰之目的，在求國家之生存獨立，抗戰年餘，創鉅痛深，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以上三點，為和平之原則，至其條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適當。其尤要者，日本軍隊全部由中國撤去，必須普遍而迅速，所關在防共協定期間內，在特定地點允許駐兵，至多以內蒙附近之地點為限，此為中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所關，必須如此，中國始能努力於戰後之休養，努力於現代國家之建設。中日兩國壤地相接，善鄰友好有其自然與必要，歷年以來，所以背道而馳，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瞭其責任。今後中國固應以善鄰友好為教育方針，日本尤應令其國民放棄其侵華侮華之傳統思想，而在教育上確立親華之方針，以奠定兩國永久和平之基礎，此為吾人對於東亞幸福應有之努力。同時吾人對於太平洋之安寧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須與關係各國一致努力，以維持增進其友誼及共同利益也。謹此提議，伏祈採納！汪兆銘，艷。（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二）民國二十八年一月四日汪精衛覆孔祥熙親筆函

庸之先生助鑒：漾日賜電，因輾轉周折，直到今晨始獲拜讀，稽答為歉。弟此行目的，具詳艷電，及致中常國防同人函中，無待贅陳。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弟覺得緘口不言，對黨對國，良心上，責任上，皆不能安，故決然言之。前此秘密提議，已不知若干次，今之改為公開提議，欲以公諸同志及國人，而喚起其注意也。來書謂「此時國際情勢，愛惡益為明顯」，誠

然誠然，然此等愛惡，僅能因勢利導，使和平談判有利於我，不能以為各國必出於參戰，此吾兄所洞悉者。然則於相當條件之下，以謀和平，當亦公忠謀國如兄者所不以為河漢也。謹覆，並頌
助安！

汪兆銘謹啓。一月四日

(七) 河內高朗街的槍聲血痕

「艷電發表了，汪先生離渝的目的，可說已經完全達到。」佛海又繼續告訴我過去的一切，他說：「中央的反應，起初是通過私人關係，勸他放棄和平主張，回渝共襄大計。經汪先生拒絕以後，重慶作了一連串的措施，黨籍被開除了，與政府有關報紙的猛烈抨擊也展開了，最後，由蔣先生自己正面發表了演講。這一切，都在汪先生意料之中，他本已在作赴法的摒擋，正倚裝待發。突然，河內的行刺案件發生了，會仲鳴因誤中而慘死，這是有關汪先生中途變計的一個重要關鍵。他以國民身份與黨員身份，提出國是意見，是否採納，權在中樞，暗殺手段，激使汪先生大怒，他決定改變出國的計劃，考慮由他自己來擔當收拾殘局與實現和平的責任。」佛海一口氣說到這裏，頓了一下，又說：「我已告訴了你所有過去的內幕真相，現在，我再重申前意，希望你能幫忙，假如你還有疑問的話，我仍然願意掏誠奉告。」

事實確是如此，河內的行刺案件，是促成汪政權直接的與主要的原因之一，雖然那天佛海沒有告訴我當時的情形，而在以後數年中，我從林栢生等許多人口中知道了比較詳細的經過，對此關係重要

而又不幸的一幕，我先在這裏對佛海的談話，作一簡略的補充。

汪氏由滇赴越，抵達河內以後，以高朗街二十七號朱培德公館作爲寓所，那裏是一所兩層的普通小花園洋房，沒有甚麼特別的警戒，當然，汪氏也從沒有夢想過竟然會有人向他行刺。

當他把艷電發表以後，除了中樞要人不斷有函電挽勸外，中央也兩度派了谷正鼎到河內。第一次是那年二月中旬，希望汪先生打銷原意，仍回渝供職。汪氏表示對抗戰政策既已與當局發生了不容的歧見，即不宜再廁身其間，徒然引起不必要的糾紛。他的離渝，祇希望公開發表對於和平的主張，而能否採納，則權操中央，他之不願勉強中樞遷就他的意見，正如他希望中央不要勉強他今後的行止。如果中央堅持抗戰到底，他決定偕同其夫人陳璧君與周佛海、陶希聖、曾仲鳴等五人赴法，等國家一旦需要他回來的時候，他依然願意爲國家效力。汪並託谷氏轉致幾句話，汪說：「我不離開重慶，艷電不能發出，離重慶已經很痛心的了，何況離國？我之所以願意離國，是表明主張如得蒙採納，個人都不成問題。」他聲明他之出此，祇是對國是的意見，並不夾雜其他任何個人的意氣之爭，他並希望中央能給予他們以出國的護照，請求中央諒解，不必強其所難。谷正鼎即將汪氏的意見返渝覆命。迨第二次到河內見汪，是一個月以後的事，他携來了汪氏等所需要的出國護照，並且還帶來了一筆政府所給汪氏等的旅費。本來汪的和平主張，至此已可以完全告一段落，不料谷氏於是年三月二十日再回重慶的翌日（即三月二十一日），行刺事件發生了，使汪氏的整個行動也隨之而中變。

高朗街二十七號住的人很簡單，除了汪氏夫婦、曾仲鳴方君璧夫婦以外，僅有朱執信的女公子，與汪氏的秘書陳國琦等數人（陳爲陳璧君之姪）。那裏的房屋，是兩開間的二層樓，樓上向街一連兩間，較小的一間，是汪氏夫婦的臥室，較大的一間，是曾仲鳴夫婦的臥室，白天就作爲汪氏會客起居

之所。而行刺他們的人，卻處心積慮地早已有了一週密的佈置。在汪氏寓所的對面，於汪氏抵達河內以後，賃定了一所房屋，朝夕有人隔街向汪寓遙窺。他們見到汪氏每天在這較大的一室與周佛海等聚談，而且裏面還有床舖的設備，因此推定這必然是汪氏的臥室了。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日的午夜，所有汪寓的人，早已熄燈就寢。有人就從花園後面踰垣而入，撬開樓下的門，蹣跚登樓，直抵會仲鳴臥室之外，臥室門是玻璃的，至臥榻的位置，行刺者也早已在隔街看得很清楚，所以行刺的人把臥室的玻璃門擊破之後，即將手提機關槍伸入門內開火掃射。首當其衝的是會仲鳴，他在開槍以前，已聽到有人登樓的聲息，剛好起床察看，而無數的槍彈，就直接命中在他的胸部，尤其腹部給打得彈洞密如蜂房，當場倒地。會的夫人方君璧（女畫家，曾在港日開畫展，現僑居法國。）也身中數槍，幸而躲在床下，雖受傷而所中尚非要害，得免於死。最幸運的是朱執信的女公子，她聞到槍聲，急起躲在門後，那裏剛好是一個死角，乃得平安無事。刺客聽到室內的倒地聲、呼號聲，以後除了呻吟聲以外，一切又歸沉寂，以為任務完成，汪氏定已命中，遂携槍下樓準備離去。而睡在樓下的陳國琦，已聞聲上樓赴救，刺客在黑暗中看到人影，再度開槍轟擊，陳國琦被擊中腿部受傷倒地，刺客們乃得以從容逃逸。而汪氏夫婦，因為睡在隔壁，雖受虛驚，未損毫髮。

雖然這行刺的一幕，結果是誤中了副車，但所給予汪氏精神上的影響很大，他認定這是重慶特務人員所為，而絕不是私人的仇殺。汪氏本患有嚴重的糖尿病，自從中央黨部被刺中槍以後，一彈尙留體內，益發容易動肝陽。經此刺激，更引起了他很大的衝動。尤其會仲鳴是他最親信的部下，他的姊姊會三姑——會醒，是同盟會的老會員，與汪氏夫婦有深厚的感情，而會夫人方君璧又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方聲洞氏的胞妹。基於這兩種淵源，汪之對會，一向視同己子，仲鳴很早就留學法國，雖

然就讀於里昂大學，但中文則出之汪氏的親授，隨汪諸人臨摹汪的字跡能維肖維妙的有林栢生、陳春圃等諸人，獨會仲鳴所寫幾可完全亂真。仲鳴自學成以後，始終隨侍在汪之左右。當汪氏於九一八事變後返國，出任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兼行政院長時代，會氏是中政會的副秘書長、鐵道部次長，以及最高國防會議秘書主任。事無大小，汪一以委之。曾在中彈後彌留時，尚說：「國事有汪先生，家事有我妻，我沒有甚麼不放心的。」仲鳴之終於不起，實給汪以無限的悲傷與刺激，所以行刺案件的發生是民國二十八年的三月二十一日，而汪在同月二十七日就發表了一篇題目叫「舉一個例」的文件，（即國防最高會議紀錄，已見上文。）雖然表面上在證明他的和平主張，曾經最高國防議會的正式通過，而最主要的目的，卻是爲了會仲鳴之死，對中央起了絕大的反感，激使他有自組政府之意。汪在河內時就說：「會先生臨死的時候，因爲對於國事尚有主張相同的我在，引爲放心。我一息尚存，爲着安慰我臨死的朋友，爲着安慰我所念念不忘的他，我應該盡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張的實現。」在這寥寥幾句中，已充分表現了汪氏的內心。行刺一幕的禍闖大了！本來已預備赴法的汪氏，因此而打銷原意，會仲鳴代汪而死，竟直接促成了汪政權的出現，這是人謀之不臧呢？還是造化小兒在暗中作弄？

（八）香港成爲最早的發祥地

當汪氏還留駐在河內的期內，香港成爲汪系活動的最早發祥地。周佛海等也已先後由越來港，陳璧君則不時往返於港越之間。那時陳璧君是住在九龍漢口道二十六號三樓。陳公博、周佛海、陶希聖

、梅思平等則合住在九龍約道五號。汪系在港的原有機構，一是創刊於民國十八年由林栢生主持的南華日報（社址在香港荷李活道四十九號）；一是華人行六樓六號A的蔚藍書局，本是國民政府戰時研究國際情勢的機關，亦以林栢生爲主任。梅思平、樊仲震、胡蘭成等爲幹事。李聖五、朱樸等爲研究員。其性質也就等於漢口時代由周佛海、陶希聖主持的藝文研究社。而且林栢生、梅思平兩人當時還是駐港的中宣部特派員。所以汪的艷電發表，港方就由林梅兩人具名負責分送，幾乎所有的港報都一律全文照登。

汪既然失意從言論而改取行動，就在港的梅思平與高宗武，着手積極活動。影佐禎昭所主持的特務機構梅機關，立刻與梅高取得了聯繫。經初步談判協議，梅機關方面派出犬養健親赴河內與汪氏作進一步之商談，（犬養健爲日本前首相犬養毅之子，戰後吉田茂內閣時代之司法大臣。）犬養健抵達河內以後，爲避免國際注意，經常扮作越南的漁夫，在河畔垂釣，把文件放在不注意的地方，由汪方派人取送。經過了相當時期的秘密接觸，汪決計由越直接赴滬籌備組織政權，日期定爲一九三九年的五月七日。汪於上一日離開了高朗街寓所，避居在山上的一所秘密的房屋中，那天搭了一艘一百多噸的小船，在東京灣行駛了一百多海哩，那裏早由影佐與山下汽船會社商定派一艘貨船「北光丸」迎候，遂直駛上海。

同時，汪方在宣傳上，也以香港爲根據地，展開活動，所有有關汪氏之主張，完全由南華日報爲大本營，向國內外發表。南華日報林栢生爲社長，顏加保爲經理。在這一短時期，社論則由周佛海、陶希聖、梅思平輪流負責。因爲一切對外是由林栢生出面，於是在汪河內被刺前後，林栢生在香港也遭到了襲擊。一九三九年三月的某一日，剛好陳璧君邀請周、梅、陶、林等中午在其寓所午飯，

而本港警察局的政治部，也約了林栢生於下午四時談話。林於汪宅午飯後逕赴政治部，談話完畢，因梅思平、陳春圃、顏加保等約在告羅士打飲茶，當他步行經過現在的歷山大廈門前時，忽然有兩個大漢以鐵鎚從後向林氏頭部猛擊，林受傷倒地，而暴徒仍繼續向其額部面部痛打，林已奄奄一息，幸而有兩個外國水手經過，當場將一名叫陳林的兇手擒獲，另一名則被乘間逃逸。林經警察送往瑪麗醫院留醫達一月有餘，始逐漸痊可。陳林則被判處了十五年徒刑。

在汪氏由越南去滬以後，留港的人，也先後於那年的初夏，紛紛搭輪追跡而往，汪政權之開場，至此幾已完全成爲定局。

(九) 我提出了一連串的疑問

那一天，我和周佛海在這次冗長的談話中，他雖然已告訴了許多使我驚訝的內幕，但談話卻並未就此終止。他既已決心幫助汪氏一面努力促成全面和平，一面準備全面和平失敗後建立政權，而所有籌備與折衝的重担，又通統落在他的身上。做事就需要人，而且既以上海爲根據地，更需要熟諳上海情形的人，而我是那裏的土著，佔了地利與人之宜。因此，他期待我的應承，更表示願意答覆我任何所提出的疑問。

我那時的心理很複雜、很微妙，我無法懷疑他告訴我的話不是事實，而我那時內心卻仍然很堅決，並沒有絲毫動搖。既然如此，談話本該可以告一段落，即使我不願意使他難堪，也儘可運用讓我從

長考慮等一類的外交辭令來推搪。而做慣了記者的我，由於好奇心的驅使，忍不住又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下面是當時我們之間的談話內容：

「汪先生與日本之間，就建立政府一點上，所有基本問題，有無取得原則上的協議？」

「沒有。」

「那是否你們的來滬，是表示不問將來結果如何，政權將一定建立？」

「我們的立場，剛剛與此相反，假如日本政府堅持不肯讓步，而條件又足以妨害我國的獨立自主，我們認為完全無補於國家民族時，我們隨時會毅然離開這裏。所以，我們初步的宣佈，僅是展開全面和平運動，而不是籌備建立政府。」

「在日軍的佔領地區中建立政權，你相信會有不致於喪權辱國的奇跡發生嗎？」

「我們從不加以過高的期望。初步，我們祇要國家不亡，我們願意忍辱負重去做，這也就是汪先生離渝時留信中所說『爲其難』的意思。」

「除了渺茫的國家前途以外，你以爲在敵人的槍刺下可以做些甚麼事？」

「無可否認，日人在淪陷區是可以任意地掠奪與任情地殘殺，現在他們要拿走一百分就是一百分。以後，盡了我們的能力，即使祇能拖住一分，少拿走一分，就是爲國家保存了一分元氣！說得更明白一些，我們是要爲了自己的國家，給他們以牽制與阻止，而不是協助他們得到更多的便利。」

「你以爲有此把握？」

「應該說：我們有此決心。當然，一切還待我們的努力，以及集合許多實心爲國，不問個人成敗毀譽的朋友，一起來幹。」

「從事政治活動，即需要經費，和平運動的經費，是不是由日人所供給？」

「你真以為我們會受日本的豢養嗎？」

「如其可能的話，我想先知道這一個秘密。」

「如其你答應我不向外界洩露，我可以坦白告訴你。在香港時代的活動費用，一共祇五萬元，是周作民、錢新之、杜月笙三人以友誼關係所自動資助。來滬以後，我們用的是日人應該交還我們存在正金銀行的關餘。這完全是中國的關稅收入，抗戰以後給日本凍結了的，現經交涉後解凍，交還我們作為活動經費。」

「我相信你不是為了利祿，必有如你所說的苦衷，但表面上與敵人合作的行動，將為國人所不諒，我不敢說自惜羽毛，我的律師職務足夠維持生活而有餘。我無力幫你，我也不想捲入這一個是非的漩渦。」

「假如在國家危急的時候，每個人只為自己的利害毀譽打算，國家的前途是可以想得到的。我很遺憾於你竟會這樣地斤斤於小我，當然，個人的問題，也應當在考慮之列，你或者知道法國的×××（我忘記了他當時所說的名字），當普法戰爭的時候，他單獨提出了與一般相反的意見，這自然是有利於國家的意見，當時會引起了民衆的不滿，詬罵他，甚至在他所住的四週，用石塊投擲。然而百年之後，證明了他的心跡，稱他為偉大的愛國者。我並不為了身後是非，纔說這樣的話，至少，在國家與同胞在目前的處境下，稍有良知的人，應該以但求無愧之心，各人盡一些各人的能力。」

「那你以為抗戰前途，是完全絕望了？」

「目前的看法是如此，但抗戰如有一天真能得到最後勝利，國家有救了，個人的成敗毀譽，還值

得顧慮計較嗎？那時我願意含笑接受法律的任何制裁。」

話講到這裏，已無可再講，我向他告辭，他諄諄地囑咐我經過考慮以後，於短時期內，給他一個確實的答復。

(十) 形勢迫得我作一個選擇

告別佛海回來，我好像做了一場夢，心裏極度紛亂。自從抗戰發生，我一直熱血沸騰，對於最後勝利，雖然漸漸因戰事的後撤而感到渺茫，但從來沒有認為絕望，聽了佛海的話，使我精神上受了一個很大的打擊。平時我很少在家，而在家時也總是有說有笑，那天回到家裏，窗外的雨聲，還在淅淅瀝瀝地落個不停，我意興闌珊地和衣睡在床上，妻顯然看出了我懷有極大的心事，她溫柔地坐向床邊，問我是否身體上有甚麼不舒服，我微微地搖了一下頭，她又問：今天下午葉先生（如晉）約你到那裏去的？我不得不簡單地告訴她這一個下午的經過。我說佛海的勸我幫他，也不能不說自有其相當理由。我們目擊淪陷區的老百姓，在敵人鐵蹄下水深火熱，汪先生是有過光榮革命歷史的人，佛海的爲人我是可以相信的，但爲自身計，我又不想搞，因此使我躊躇，我不能立刻下一個決定。妻爲突如其來的消息所驚愕，一反她平日安詳的常態，急忙說：我一向不干涉你的任何行動，但這次我堅決反對你去做那樣的事。想想你自己的前途，也爲家庭和孩子們想想，沒有人會諒解與敵人合作的任何動機！我知足，但求有一個平凡的丈夫，我不忍你給人罵漢奸，我也不稀罕你成爲甚麼英雄，不要再胡思亂

想，把今天的經過，儘量忘記。我無可奈何地點了一下頭，她仍然凝視着我，深恐我是表面在敷衍她。

第二天起，我真的不再考慮這一個問題，我如常地忙着我的律師職務。大約在一個星期之後，我正在法租界薛華立路第二特區地方法院爲了一起案子出庭。一個新聞界的同業，倉皇地奔來看我，在律師休息室一看到我，就一把拉我到外面，低聲而焦慮地說：「你胆子真大！你真不要命？」我聽了他的話，正如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不曉得他說得那樣嚴重爲了甚麼？我說：「到底是甚麼事，值得你如此爲我張皇？」他說：「某一方面對你的助汪行爲，很不諒解，我從可靠方面得來的消息，已經準備對你採取行動了。而你，仍然照常出入，毫無顧忌！」我以爲我與周佛海見面的消息，已經爲某方面所知道，我理直氣壯地說：「不錯，我們見過面，但考慮結果，我並不準備參加。」他說：「中華日報的復刊，你不是出過很大的力嗎？」我說：「我僅是爲了友誼，毫無其他政治作用。」他說：「够了！誰能够原諒你、相信你？現在已錯過了辯白的機會。我特地來通知你，希望你有個防備，不要以自己的性命作兒戲。」說完，他望着我嘆了一口氣，又匆匆地走了。

朋友說的話是不錯的，當民國二十一年汪氏從海外回國，我以記者職務關係，到意國郵船「康脫羅素」號訪問的時候，我又遇到了隨汪氏回來的會仲鳴。民十六汪氏住在上海善鐘路七十七號，我與仲鳴相處得很好，幾乎是朝夕相見的人，在那時，我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自從他隨汪去國，已幾年不見，這一天在甲板上見到我，他爲我介紹一位我所沒有見過的人，那是林相生。他說相生奉汪先生之命，來滬創辦中華日報，他是廣東人，對上海情形不熟，希望我給以協助。此後，在中華日報創刊前後，相生經常爲了報務與我聯絡，我盡我所知道的告訴他，盡我所能做的幫忙他，我之如此，純粹爲了仲鳴的囑託。我既沒有參加汪系的政治組織，也沒有受過中華日報的酬勞，事實上我僅是中華

日報的一名技術顧問。到了民國二十七年淞滬抗戰，國軍後撤，中華日報停刊了，栢生也回到香港。在他離滬的前夕，他到我家裏來向我辭行，他說中華日報祇有經理葉雪松等寥寥數人留守，他再三託我就近予以照顧。中華日報的經濟一向不太好，到二十八年的春天，已經積欠了房租七八個月，業主起訴的結果，判令遷移，並將中華日報自置的德國高速度「伏美」牌輪轉機拍賣抵償。到那時，雪松纔來找我。打官司既是我的職業，我就爲他提起了執行異議之訴，以機器爲蔚藍書店所有爲理由，反對以之拍賣抵償中華日報的欠租。異議之訴終於獲得了勝訴的判決，房屋與機器，也幸而得以保全。

直至民國二十八年的夏季，栢生電葉雪松將中華日報復刊，以響應汪氏的和平主張。雪松又來找我，要我幫他做兩件事：代請幾位有經驗的編輯，以及疏通望平街報販發行復刊後的中華日報。一向沒有政治頭腦的我，自然沒有考慮到政治上的問題，僅僅想到了應該爲朋友解決困難，我就毫不遲疑地答應了，而且也如他所願的替他辦到了，料不到竟因此而可能召來殺身之禍。

那天聽到了朋友的警告，我自己悔恨天真與鹵莽，沒有人相信我除了友誼以外，的確毫無其他作用，同時也沒有地方可以聽取我的辯白。外面風聲一天緊似一天，若干報紙上還隱約登出了我是中華日報的總編輯。在我住所的四週，也不時發現有形跡可疑的人在徘徊，而同業中如申報的錢華等，已被人暗殺身死。無可否認，我內心有些恐懼，我自己不知道應該怎樣去做。我也得承認，佛海的談話，給了我相當的影響力，正當我徬徨中，離開與佛海的那次談話，已有一個月的时间，他等不及我的答覆，又來信約我見面。那時，他已從虹口搬到愚園路一一三六弄五十九號居住。我立刻回信約定日期，事實上，在與他見面以前，形勢逼上梁山，我已決定了參加這一幕歷史性的時代悲劇。

(十一) 上海愚園路一一三六弄

第二次與佛海見面，因為他先聽到我答應參加，談話就顯得輕鬆得多。我並不諱言我所以願意參加的原因，我承認受到了他上次談話的影響，而朋友所告訴我潛伏在我四週的生命危機，是促成我立刻作一個決定的主因。我向佛海聲明了兩點：我的參加，與其說是爲了政治，不如說是爲了友誼。以佛海豪爽坦白的性格，我相信他不可能繪影繪聲地捏造出許多事實，他也不需要浪費許多時間來欺騙像我那樣一個無足輕重的人。所以我希望能多做一些爲他分勞的事，儘量不給我擔任實際的職務。葉如晉與羅君強曾告訴我，正在籌備一張報紙，假如建立政權實現的話，就將在新政權登場的一天，在南京出版，以代替「維新政府」所辦的「南京新報」。那天我說明我對報紙的厭倦，不願再投身在最易招惹是非的場合。並且我強調對於與日人合作一點，毫無信心，自己的立場就有些曖昧，也決不能辦出一張符合他希望的報紙。

佛海完全接受了我的要求，在我談話的時候，不住的點頭。等我一切都講完了，佛海即表示，辦報的事已有君強與如晉在負責，不必再強我所難。但他很關心我的安全問題，他勸我立即停止律師職務，暫時離開家到別處去住幾天，現在他住處的隔壁一所房屋，目前還空關着。羅君強由渝追蹤來滬以後，仍寄寓在呂班路的呂班公寓中，也不是長久之計。他預備立刻飭人裝修佈置，一星期後可與君強一同遷入，作爲我與他共同的住所。如此安全上可以得到保障，而與他之間的聯絡，也可得到便利。

。就這樣，我後半生的悲慘命運就這樣完全決定了。我也於一星期後，拋棄了原有溫暖的家，放棄了固有平穩的職業，携了一肩行李，遷住到那邊，開始爲「和平運動」奔走。

有着兩個租界的上海，本來已經是一個畸形的世界，而滬西愚園路、大西路，以至極司斐爾路一帶，尤其是畸形世界中的畸形地區。在靜安寺路以西，統稱爲越界築路，道路警權，屬於公共租界，而路側的房屋，則屬於華界。汪精衛、周佛海等由僻遠而且是日本軍事地區的虹口搬到愚園路，目的就是得到畸形上的一切便利。他們形式上脫離了日人的控制，用自己的警衛力量來保護自己；向正金銀行提取被凍結的關餘，作爲活動經費，分配職務，展開籌備工作。這是汪政權在上海所建立的最初雛型。

汪氏夫婦所居愚園路一一三六弄口的一所大宅，原是前交通部長王伯羣的私邸，當王氏出任上海大夏大學校長時，與該校的校花保志寧由師生戀愛而結婚，於是鳩工興建此美輪美奐的大廈，作爲藏嬌的金屋。國軍西撤以後，一直空關着，在汪氏遷入以前，更在花園四週裝置了瞭望亭，牆垣上加築了鐵絲網，利用爲在滬發縱指揮與安身立命之處。

一一三六弄是一條長長的里弄，祇有一個面向愚園路的出口，很幽靜，也很隱僻，弄內另有十餘宅獨立的小花園洋房，事前，把原有的居戶全部遷走了。就由周佛海、褚民誼、梅思平、陳春圃、羅君強等一批人分宅而居，有百來名武裝警衛，嚴密地日夜保護着，沒有所發的臨時證件，或者預先通知的特定賓客，完全無法進入弄內。當時參加新政權籌備工作比較重要的人物，祇有極少數不住在裏面，除了岑德廣、林栢生等以外，就是陶希聖與高宗武。

一切籌建政權的工作，也在那裏開始展開了，除了汪自己主持「大計」而外，那時陳公博還沒有

到上海，財政與對日交涉的重責，都落到了佛海的肩上。大致上職務的分配是：褚民誼與陳春圃分任「中央黨部」正副秘書長，梅思平、朱樸任組織；陶希聖、林栢生任宣傳。除了上述諸人外，由香港去的有李聖五、陳君慧、樊仲雲等，代表國社黨的有諸青來、陸鼎揆等，代表青年黨的有趙毓松等，軍人有劉郁芬、鮑文樾、楊毓珣、葉蓬等，無黨無派的有趙正平、傅式說等。而以原上海市黨部的舊人參加的爲最多，有蔡洪田、汪曼雲、顧繼武、凌憲文、黃香谷等。一三六弄裏，不時有你所夢想不到的人物進出，他們是來講價，來當面歌頌汪氏的「遠見與毅力」，以及明白表示他們所希望將來在新政權中的地位。有的在汪政權成立以後躍居了高位；有的因爲斟盤不成而未會實現。幾乎那時間廢在上海各朝各代的過去文武大員，自北洋政府一直到國民政府的人，都直接間接有過接觸。甚至遙遠的重慶與香港，也有不斷的魚雁往來，我不想在這裏指出誰會想諺附爲汪周等的知己，以及誰會經對於汪政權表示同情與希冀。假使這真是一齣歷史上醜惡的活劇的話，那末那時的人心，是太值得慨嘆了！

(十二) 七十六號中的丁李搭檔

從正金銀行提來整箱交通銀行發行的十元新鈔，是有它無比的力量，「和平運動」的潛勢力，立時在上海社會上發生了巨大的作用。每一家報館中，不問是商辦的或官辦的，都已有了汪方的地下份子潛伏着，報館中的動態，重慶來的指示，每一個人的言論，每天都有詳盡的報告。若干報紙在消極態度中逐漸轉變，對汪方減輕了抨擊的成份。甚至幫會方面也發生了關係，青幫如張嘯林、季雲卿

、張德欽等；洪幫如徐朗西等。每個月都送去一筆可觀的數目。公共租界與法租界政治部的要人員，也先後有了默契，避免了無數工作上的困難。上海社會之間，有人竟然偷偷摸摸地躡尋門路，有人竟然洋洋得意地告訴別人將不日飛昇。任何一個政權的創建，定然會有大批攀龍附鳳的人。汪政權在未成立之前，已經有了一個在淪陷區中的有利環境，以及足夠的經濟力量，這種現象，應該也同樣不足為奇。

但是汪方最重要人物所聚居的一一三六弄，知道的人反而並不普遍，「七十六號」纔是被認為汪方最重要的所在。一直到戰後，還有人提起了「七十六號」而為之談虎色變的，而且在若干書報上，還有要證明其為魔窟而作了完全不實的記載。

所謂「七十六號」，就是滬西極司斐爾路七十六號。我已在前面說過，這原是前山東省政府主席陳調元的一所別墅，與一一三六弄同樣處於畸形的越界築路上。主持的人物是丁默邨與李士羣，正式的名稱為「中國國民黨特務委員會特工總部」。周佛海是特務委員會的主任委員，而實際的權力則操諸丁李兩人之手。「七十六號」雖然地方很大，但房屋却並不多，於是像一一三六弄一樣，把毗連的一條名叫「華村」的弄堂，劃入了「七十六號」範圍之內，把原有的住戶迫走，讓許多參加人員遷入居住。

這一個特務組織的形成，事實上還遠在汪氏等抵滬以前。李士羣是浙江人，本為一個留俄學生，而且是一個共產黨員。在清黨期內，曾經有過七次入獄的紀錄，反正以後，隸屬於「中統」擔任一個中級幹部。在一次因違反紀律而將遭到嚴重處分的時候，竟然給他逃到了香港，並且很快與日本的特務頭子土肥原發生了關係。隨後由土肥原派他到上海做情報工作。就在國軍撤退後梁鴻志等所組織的

「維新政府」時代，他早已在滬西億庭盤路諸安浜十號建立起特務機構，不時往返於滬滬之間。什麼輕有活力，那時還不過卅一二歲，而且受過蘇俄的特務訓練，他對工作表演得很好，頗得士肥原的信任，同時也引起了重慶的注意。

民國二十八年的春季，中統的第二處處長丁默邨奉命來港，目的要把李士羣勸回去。丁在中統中是李的上司，兩人間過去的感情還不壞，滿擬以私人的情誼，阻止李士羣為敵人所利用。當默邨抵港以後，士羣却又已去了上海，默邨摸索不到士羣在港的線索，而那時周佛海還留在香港，周是CC十個最高幹部之一，這一點默邨是清楚的。他在無法覆命的尷尬局面之下，他想到去問一下周，而又不周的地址，他到香港荷李活道四十九號南華日報去訪林栢生，而剛巧栢生被狙擊後正在療養時期，於是向該報經理顏加保代見後，丁留了一封信給佛海。結果在兩人會面幾度晤談以後，丁反而放棄了原來勸李回渝的任務，隨周赴滬，而且負起汪方特工的大任。他將士羣的原有組織改組，由他出任主任，而以士羣為副，地點也從億庭盤路諸安浜十號遷至極司斐爾路七十六號，性質也從秘密一變而為公開。

「七十六號」是一個龐大的組織，丁李又是特工中的老手，他們搜盡了三山五岳的人物，弓上弦、刀出鞘，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六年中在上海製造出不少令人震慄的血腥事件，假如汪政權六年中的措施，最值得令人詬責的話，「七十六號」的所作所為，至少應該負起很大的責任。

「七十六號」除了丁李而外，有主任秘書黃敬彌，辦公廳主任傅也文，其下的所謂行動大隊，有投順的軍統大將林之江、王天木、陳恭澍、萬里浪、中統的胡均鶴等；有原來公共租界的特別警察潘達、戴昌齡等；也有幫會中人的夏仲明、楊傑、吳四寶等。

特別是吳四寶，更爲滬人所切齒、他原是一個黑社會中的流氓，一個汽車司機，識不了斗大幾個字，但是有魁偉的身體，體重最少在一百五十磅以上。他是江蘇南通人，卻像是燕趙間的產物，他生成粗鹵野蠻的性格，但知道怎樣對上司恭順，祇要能博得他上司的歡心，他毫不考慮，毫不遲疑去執行，別的行動大隊所不肯做或不敢做的事，他奮勇當先，做得澈底，做得乾淨。什麼江蘇農民銀行職工宿舍的集體槍殺事件，中國銀行的定時炸彈慘案，都是他的「傑作」。凡是給「七十六號」所拘捕的人，祇要撞在他手裏，沒有問一句話，先給他一頓皮鞭打得血淋淋的下馬威。他的妻子余愛珍，倒是在啓秀女校受過中等教育的人，但她也相夫「有道」，能够親自審訊女犯人，也能够携了槍械出去行動，當時人們對「七十六號」的畏懼，並不下於日本的憲兵隊。他的參加七十六號，因爲他與李士羣都是拜青幫季雲卿爲老頭子的同參弟兄。

(十三) 在滬積極展開政治活動

汪氏在上海那一段時期，儘管對外標榜的是和平運動，但敏感的上海人，都明白將是在淪陷區建立政權的前奏。丁默邨與李士羣所主持的「七十六號」，雖然是一個特工機構，但開始所吸收的各階層人物，卻並不限於從事特務工作的人員。「七十六號」除了担负特務工作以外，也成爲對外最活動的公開機構。許多不甘寂寞而希冀得道飛昇的人，都在輾轉設法，躡頭覓縫地尋覓門路。一向冷落的極司斐爾路，頓時顯得熱鬧起來。平時高喊抗戰到底的人，有時出乎你意料之外，會在「七十六號」的會客室中出現。租界以內的渝方報紙，逐漸展開了猛烈的抨擊，但若干編輯與記者，却又於暗中取

得了默契。汪方的中華日報，也已經恢復出版，由梅思平等輪流主持着社論。在特工戰之前，當二十八年的秋季，首先展開的是與重慶方面的言論戰。

汪氏除了較有份量的人物予以接見而外，那時他本人很少直接出面，一切對日本的交涉責任，都由周佛海負責。每週僅有一兩次在汪氏的寓所中召集周佛海、褚民誼、梅思平、陶希聖、高宗武、林相生、李聖五、陳春圃等舉行幹部會議。以後與日方正式接觸之後，問題就顯得漸趨複雜，「政府」的組織、名稱、權限、國旗，以至對於「維新」與「臨時」南北兩政權的處置等等，與日本之間，都有着很大的距離。代表軍部的犬養健，不斷奔走於影佐與周佛海之間。而汪周等所希望的「全面和平」，同時也仍在暗中進行。周佛海曾經派遣張彬人（即影星葛蘭之父）赴日試探日政府的意見。留港與重慶有關係的人士，也不斷有信使往還，傳達消息。但這一切都成爲徒勞之舉。首先，重慶對汪予以永遠開除黨籍，及解除一切職務之處分。當是年（民國二十八年）六月，汪氏赴日與日首相平沼會見以後，中樞更對其明令通緝。之後，又通緝了陳璧君、周佛海、褚民誼三人。至八月間，又有梅思平、林相生、丁默邨、羅君強、金雄白等二十三人被明令通緝，處處顯出雙方已無妥協餘地。抗戰期中不幸的內部分裂，至此到了無可彌縫的狀態。

籌組政權工作與對日交涉對渝談和同樣地在積極進行，汪系的親信人物，陸續由港粵行抵上海。周佛海已確定了將在新政權中担任僅次於汪的重要角色，他更亟亟於在滬搜羅人才，因此，設立了類似漢口時代他在宣傳部長任內的藝文研究社組織，暗中在威海衛路的太陽公寓內成立了機構，委派羅君強與我分任總幹事與總秘書。直接投效或經人介紹的，經過填寫一紙履歷，即每月給以相當的生活津貼，留待政權成立時量才錄用。短短數日之內，人數已超過五百以上，其間如陳之碩、易次乾等，

以後都與汪政權相終始，也有填過履歷，收過津貼而爲了別的原因，中途變計的，如賈××、潘××等。過去在軍政界有過地位的人，有的通過岑德廣等的關係，而與周直接見面的。每當薄暮以後，常有知名的人物，偷偷摸摸地進入一一三六弄與周閉戶傾談。另外，傅式說在亞培爾路一號接待許多教授，學者與專家，劉星辰、阮毓麟、張素民、徐季敦等，數十人先後參加。上海立時成爲爲雙方政治鬥爭最尖銳的地區。

是年八月下旬，我又突然收到了一封參加「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通函。汪氏在創建政權以前，決先利用黨的名義，作一次更廣泛的宣傳，也使新政權之建立，有所依據。這一次會議的召開，使人們知道這一幕歷史性的戲劇，勢將于不久揭開序幕。

當我收到這一紙通告之先，我覺得有一些驚異，因爲，雖然從北伐抵達東南地區以後，我以職務上的關係，一直自動爲國民黨效力，但我始終並不是一個黨員，這代表資格，來得未免有一些突兀，而在召開大會以前，我又忙着藝文社的事，也很少與佛海見面，故事前對此一無所知。直至收到通告以後，我去問他，他承認是由他保舉我爲江蘇區代表，希望我能參加那一次的會議。

(十四) 登場第一聲的六全大會

民國二十八年九月一日，汪氏所召集的「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五次大會係於二十七年四月，在武昌舉行，即汪當選爲副總裁之一次)，在上海極司斐爾路七十六號舉行。當我驅車

到達那裏的時候，公共租界携着長槍的巡捕以及印度籍的馬巡，幾於立滿了半條馬路，形勢顯得十分緊張，「七十六號」的兩扇大鐵門，緊緊的關閉着，開着的祇是一扇小門，讓「代表」們進去。「七十六號」的武裝人員，密密層層地佈滿着通道的兩側，虎視眈眈地注視每個人的行動。一個招待員引導我到代表報到處，我發覺了以一個不是國民黨員的我，而竟然具有兩個地區的「代表身份」，因為林栢生也保舉了我為廣東區的代表。我內心雖然感到一絲尷尬，終於簽了一個名，完成了報到手續。廣場上已聚集了不少「代表」，一簇一簇地在分別談話，每一個人的進來都會引起彼此間的驚訝。這樣多與汪系素無淵源的人參加了！這樣多在今天以前還在激昂地高呼抗日的人改變了！上海社會上形形色式的份子，都成為「和平運動」的擁護者。我感到政治可怕的魅力，我又為熱中的人發出了微喟！我無可奈何地與他們握手，彼此之間，似多少懷有些沉重的心境，心不在焉地講一些不着邊際的話。

時間到了，樂隊奏起嚴莊的國歌，「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歌聲，似乎特別嘹亮，一面青天白日旗冉冉升起，這是上海淪陷以後在中國土地第一次重新見到的國旗。我看到許多人在流淚、在飲泣，大家木然地站在那裏，直到升旗禮完成，纜魚貫進入會場。

汪氏無疑是主席，他經過了冗長的一段演講，當他講到國勢的岌岌，以及未來任務的艱鉅，在聲音漸漸地抽咽中結束。接着是主席團宣佈了了近百名的「中央委員」，現在我已不能憑記憶指出正確的數字與列舉全部的名單，我祇記得舊中央委員，祇有汪氏夫婦、陳公博、褚民誼、周佛海、克興額（？）何世楨（後來何世楨又聲明否認了）等寥寥數人。大會再宣讀了一紙長達萬言的宣言，就匆匆地結束了那一次會議。

我不想再在這裏引用宣言全文，因為汪氏對於悲觀的抗戰論調，已給歷史全部否定了，汪氏所希

望於日本軍閥的誠意謀和，也於六年中的體驗證明是錯誤了。但汪氏在抗戰期中所提出的「和平反共建國」的論調，在那一紙宣言中，今天讀來，覺得猶有餘痛。這一個歷史上的文獻，我覺得還有摘錄的價值：

「在此次戰爭中，……日本深切認識中國民族意識之盛，與建國信念之堅固而不可拔，雖抗戰以來，中國喪師失地，然全國人民犧牲決心，久而彌厲，將士効命，前仆後繼，合於正義之和平，一日不達，則抗戰一日不懈。……所可痛心者，去歲四五月間，共產黨人所秘密傳授『中共的策略路線』一書，已被發覺。其所謂『一切以抗日為前提，在抗日口號掩護之下，進行階級鬥爭，土地革命』，已定為信條。其見之於行事者：假藉抗戰，以削弱國民政府之力量，使之繼續不斷，喪師失地，以促成其崩潰之勢；假藉抗戰，以實行民窮財盡政策，所至焚殺，使所謂中小資產階級歸於掃蕩，且使大多數人皆成爲無業游民，供其使用；假藉抗戰，以實行愚民政策，剝奪所謂知識階級之一切自由，使全國陷於精神破產，不識不知隨而盲動；假藉抗戰，以擴大邊區政府之勢力，謀於相當時機取國民政府而代之，夷中華民國永爲蘇聯之附庸；假藉抗戰，使中日兵連禍結，使蘇聯得安坐而乘其敝。凡此種種，無不根據已定之策略，爲有系統的進行。……其在國民政府所在地，則隱身於擁蔣抗日口號之下，使人民爲之側目，將士爲之離心，同志爲之解體。……蓋和平所以順利建國之進行，反共則所以掃除建國之障礙。……」云云。汪政權雖對國際情勢因估計錯誤而覆亡，但對國內未來的發展，宣言中無不洞若觀火，至著者執筆時爲止，爲期適爲廿年，而國共的進退成敗，無不一如這次大會宣言所指出，汪氏等其能瞞目於九原耶？

這次會議，是汪政權開場的第一聲，自此以後，政權的建立，已勢成騎虎，與重慶之間，壁壘更

爲分明，而汪方在上海的活動，也更爲積極。但周佛海所負起與日方的交涉，很少有進步妥協的跡象，原定雙十節「還都」南京的日期，不得不推延至翌年元旦，更自元旦推延至不可知之歲月。汪政權的最重大錯誤，雖然有近衛聲明爲其根據，但日本軍部與日政府之間，先存在着綜錯複雜的種種因素，而與汪方直接聯繫的卻是軍部的特務機關，影佐禎昭主持着這一件事，而又無權作決定性之主張。影佐所提出的條件，竟然以「滿洲國」的一切爲藍本，而汪方則以自主獨立爲原則，要恢復九一八以前的一切現狀，談判時斷時續，始終未能取得結論。

(十五) 陳公博決心一死酬知己

汪政權除汪氏外，以陳公博、周佛海兩人爲兩枝最重要的台柱，兩人同爲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爲中共元勳，而又是最早脫離共籍者。他們雖省籍不同（陳是廣東而周爲湖南），又同具豪爽勇毅的性格。對於汪政權的建立，一樣懷有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精神，但兩人對於汪政權之做法與看法，卻有很大的歧異。

在抗戰發動之前，陳周都是政府中的重要人物，陳氏不但是中央民訓部長、實業部長，而且與顧孟餘爲汪氏左右的輔弼。周爲代理宣傳部長，而又兼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的要職，兩人處於不同的派系，而對於抗戰則具有同一的觀點，認爲以當時日本軍閥的得寸進尺，咄咄逼人，最後的一戰將遲早無可避免。但如立即抗戰，當時剿共的工作，非但將功虧一簣，而由於中共與附共份子對於抗

戰的叫聲，意味着共黨的目的，不僅在藉抗戰以圖存，而是要借抗戰求發展。同時，與日本軍備的比較，一旦戰端既起，國力懸殊，很難樂觀。所以最早他們同樣認為蔣氏所主張安內攘外的政策，不失為明智的決策。但陳周兩人，論其當時之地位與環境，都還沒有足以左右當局的力量。佛海最多在其「低調俱樂部」中唱其低調，而公博則連此種興趣也沒有。

陳公博自汪氏在中央黨部遇刺以後，更有一個新的感覺，他認為國民黨內部的派系糾紛，將削弱黨的力量，與召致黨的解體。所以他希望從他本身起，不再搞派系。對於「改組派」，更希望從無形的存在，進而為無形的結束。但一切並不能如他的心願，因西安事變而對於抗戰政策的急轉直下，因抗戰而黨的暗潮愈烈，雖然他仍在中樞服務，態度上已經顯得很為消極。

抗戰初期的淞滬撤退，德國大使陶德曼的出而調停，已啓和談之端。至首都淪陷，武漢危急，戰局證明了抗戰前途的黯淡，最高國防會議接受調停的決議，如前文所述，更可窺見當局對和戰問題的態度。一直至退處重慶，高宗武的所以亟亟奉命試探日政府意見，當時的危疑震撼，也不言可知。汪氏對於抗戰，自始就抱着悲觀的看法，政府遷渝以後，軍事的節節失敗，緬滇公路的突被封鎖，英美態度的曖昧，共黨勢力的膨脹，當前的種種事實，無時不在加深他主和的主張。但是很早便附和汪氏和運的，不是關係極深的陳公博，反而是向乏淵源的周佛海。

周於代理宣傳部長任內，在漢口時代，已有一「藝文研究社」之設立，為對外宣傳抗戰爭取國際同情的機構，他與陶希聖分任總幹事與總秘書。陶是老改組派，向得汪氏寵信，與周同事以後，朝夕相見，私誼日深，周與汪的發生關係，陶應該是在中間拉攏的主要人物。汪有和平的主張，而當時尚無和平的行動，正式向日本的試探，也顯然出之陶與高宗武的主動與促成，但是陳公博那時方任四川省

黨部主任委員，遠處成都，事實上對此是一無所知。

汪氏離渝的日期，爲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汪與蔣氏最後之一面，則爲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九日，而汪在河內發表艷電，爲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蔣氏於九日拒絕了汪氏的和談建議，他纔決心離渝，在離渝之前一星期，始去電召陳氏由成都回重慶。當時在汪的私邸談話，在場的也祇有汪氏夫婦與公博三人，汪氏告訴他關於國際形勢的看法，（參閱本節附錄汪氏致中常會最高國防會議書。）戰局前途的估計，與當局爭議的經過，以及日本談和的條件。以當時國內外的形勢而論；陳氏雖同意汪氏的看法，但認爲在對外抗戰的時候，內部不宜分裂。爲了國家，應該以最大的忍耐來說服當局，遲以有待，俾歸於一致。陳氏曾經以爽直坦白的態度，反覆陳辭，而終未得汪氏的首肯。陳璧君當時以公博不同意汪氏的辦法，竟至這樣說：「你反對，那你做你的蔣介石的官去。」那一次的談話，非但沒有獲得任何結果，反使陳氏感到很大的痛苦。

在公博回到成都以後不久，就接到了汪氏離渝赴越的消息，那時會使他陷於非常焦苦的境地，他一度擬擺脫所有的職務，上峨嵋山去韜光養晦，但他與汪氏多年共同致力革命的關係，以及私人間深厚的情誼，他都覺得無法置身事外。考慮再三，乃借赴昆明演講爲題目，也由滇入越，在河內與汪氏會面。在他臨行之前，曾留書給張羣，表示他之赴越，目的在拉住汪氏不再有進一步的發展，請張岳軍也勸阻蔣氏勿有過份的措施，以免雙方各走極端。陳氏到河內以後，請汪氏珍惜其過去的歷史，儘管他是實心爲國，但談和的結果未可知，日人的用心不可測，未來局勢的變化不可料，國內別有用心之輩，正希望蔣汪之間有裂痕，而不知虛實的民衆，對於和談也可能召致不諒的輿論。在民主國家中，提出國是主張，是光明磊落的事，無人可以疵議，但希望汪氏以從事和平運動爲止，主張既已提出

，祇有靜候國人的公決。汪氏也很以陳之意見爲然，且表示已向中樞特派來越之谷正鼎要求政府發給護照，如主張不被接受，卽隨時準備出國。

公博也卽轉道來至香港，爲暫居之計。到翌年（民國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河內突然發生了汪寅行刺事件。會仲鳴因而殞命，不久，汪又離越赴滬，周佛海、梅思平、陶希聖等也由港追蹤而去，陳公博知道事已決裂，汪政權之建立，亦將不可避免。二十八年的冬，公博赴滬力阻汪氏組府，至於聲淚俱下，而未爲所動，又黯然返滬。翌年初，高陶携走了汪與日方交涉的日本所提條件草案，離滬來港發表。公博是一向很重情感的人，深以高陶由和運之主動者忽變而爲和運之破壞者，已使他感到憤怒，且此舉將陷汪氏於狼狽之境，他深覺義難袖手，因立卽買棹赴滬。抵滬之後，默察當時的形勢，知已騎虎難下，口頭的勸阻已對事實無補，他淒然對汪氏道：「九一八事變後，你以跳火坑的精神，回國供職，現在抗戰到了艱險關頭，你又以跳火坑精神想旋乾轉坤。你旣決定犧牲一己，我祇有爲你分憂分勞。」這樣，公博就參加了汪政權，一直到他的死，他臨難前向陳璧君訣別時有一句話：「我此去有面目見汪先生於地下了！」這是公博參加汪政權的全部心境。

（附錄）

汪精衛致中央常務委員會暨國防最高會議書

茲有上中央一電，除拍發外，謹再抄呈一紙，以備鑒督。本月九日，銘調總裁蔣先生，曾力陳現

在中國之困難在如何支持戰局，日本之困難在如何結束戰局，兩者皆有困難，兩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無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法美之協助，蘇聯之不反對，德義之不作難，尤期待日本之覺悟；日本果能覺悟中國之不可屈服，東亞之不可獨霸，則和平終當到來。凡此披瀝，當日在座諸同志所共聞也。今日方聲明，實不能謂無覺悟。猶憶去歲十二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際，德大使前赴南京謁蔣先生，所述日方條件，不如此明確，且較此為苛，蔣先生體念大局，曾毅然許諾，以之為和平談判之基礎；其後日方遷延，南京陷落之後，改提條件，範圍廣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覺悟，我方自應答以聲明，以之為和平談判之基礎，而努力折衝，使具體方案得到相當解決，則結束戰事以奠定東亞相安之局，誠為不可再失之良機矣。英法美之助力，今已見其端倪，惟此等助力，僅能用於調停，俾我比較有利；決不能用于解決戰事，俾我得因參戰而獲得全勝，此為盡人所能知，無待贅言。蘇聯不能脫離英美法而單獨行動，德義見我肯從事和平談判，必欣然協助，國際情勢，大致可見。至於國內，除共產黨及惟恐中國不亡，惟恐國民政府不倒，惟恐中國國民黨不滅之少數人外，想當無不同情者。銘經過沉思熟慮之後，始敢向中央為此提議。除已函蔣先生陳述意見外，謹再披瀝以陳。伏望諸同志鑑其愚誠，俯賜贊同，幸甚，幸甚！專此，敬候公祺。汪兆銘謹啓（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十六）汪日對全面和平之幻想

汪方於民國二十八年九月所舉行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不啻是建立政權的先聲，也是政權最初

的雛型。汪的舊日親信人員，以形格勢禁，大多數留渝不及同來，即左右的兩大將，顧孟餘既拒絕參加，陳公博雖一度到滬，又重去香港。其最親信的會仲鳴，復在河內刺汪一役中誤中殞命。褚民誼雖與汪有姻婭之誼，則親而不信。所以一切對日的交涉，對內籌備的責任，都由周佛海擔當，而以陶希聖與梅思平兩人爲之輔。每週在汪之私邸，舉行一次幹部會議，以決定進行方針。

「第六次代表大會」以後，首先成立了「國民黨中央黨部」，因陋就簡，辦公地點，就在愚園路一三六弄內的各人寓所，組織亦不完備。僅有秘書廳，及組織、宣傳、社會三部，加上財務、特務兩委員會。就我記憶所及，人事支配，約如下述：

秘書長：褚民誼，副：陳春圃、羅君強。

組織部：梅思平，副：朱樸。

宣傳部：陶希聖，副：林栢生。

社會部：丁默邨，副：汪曼雲、顧繼武。

周佛海則身兼財務、特務兩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汪等於這一段時間內所以不亟亟於所謂「組府還都」，雖然爲與日方正積極交涉，以期取得更有利之條件。而最大癥結，還是爲了貫徹離渝時的最初目的，期待全面和平。汪周等抱着一項決意，如果重慶願與日本談和，汪即放棄「組府」計劃。

至對重慶的全面工作，係分三方面進行：（一）由華北的多田與王克敏，通過當時留平的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勝利後出任美國駐華大使），於其赴渝時，請其晤蔣先生直接談商。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司徒雷登會由平到滬，周佛海亦會與之晤見，據周之二月二十四日日記云：「晚晤司徒雷登，托其赴渝謁蔣先生時，表示政府即組織，但決不爲東京重慶間講和之障礙，並勸蔣先生勿因日本困難

凱數次赴港（按段運凱爲段祺瑞之姪，人稱爲段老二，生前頗得段芝泉之寵愛，與渝方當局人物頗多熟識。段在汪政權中，始終未擔任正式職務，僅三十三年中交兩行復業，小四行改組，由周派段運凱、蕭適震（即童星蕭芳芳之父）暨著者三人，出任中國實業銀行官方常務董事）與錢永銘、杜月笙接洽，轉向重慶談商。周所提出之意見，「汪之組『府』，如和談實現，立即停止，即使因不及待而組織在先，但中國仍不能不謀統一。可由蔣先生停戰，由汪先生議和，佛海負責要求日本打銷蔣氏必須下野之議；短時期內，國府遷回南京，軍委會仍在重慶」●必要時並請段赴渝傳達此意。（三）由日本軍部直接尋覓通向重慶的門路，談商全面和平。負責此項談判的，是今井武夫（後任日本駐華派遣軍總部的第二科科长，即勝利後首先赴芷江接洽投降手續者）及參謀本部之第八課課長臼井大佐，在港與自稱宋子良者會見。汪政權於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成立，而遲至三月十九日，日方還由犬養健正式通知周佛海，謂今井與臼井在港商談，已有眉目，停戰可於一週內實現。所以當時他曾主張汪政權有再延期成立的擬議。

關於上述的三項全面和平談判，其實都是出於汪方與日方的片面幻想，尤其今井等在港與自稱宋子良者的接洽，更是一幕滑稽的插曲。記得一天於閒談中佛海突然提起了日方進行的所謂和談。周謂當今井等在港與自稱宋子良的人密談之際，日人在門外從鑰匙眼中偷偷地拍到了一張照片，會將相片携滬給他看，周一看照片中人，決非宋子良，而日人卻堅信其決非冒充，周最後尙指日人之低能與幼稚，爲之嘆息。以周的推測，認爲係重慶特工人員向日方取得直接情報的一種手段。周並謂即使真是宋子良，要談如此重大的問題，份量也嫌不够。但是不問是司徒雷登、段運凱，或今井，結果都成爲

一場夢想，而周所派的代表，也不僅段運凱一人，如王宏實，如陳警洲，甚至還有些人利用周之心理，設辭以騙取一筆旅費的。汪方雖用盡了種種力量，結果戰爭仍然進行，汪政權也終於出現，在對外戰爭中，國家終於分裂，這真是近代史中一件最不幸的大事！

(十七) 高宗武陶希聖何事叛汪

在汪政權建立以前，發生了轟動一時的高（宗武）陶（希聖）出走事件，給汪氏以一個沉重的打擊。陶是改組派的老人，而且汪向予以腹心之寄。抵滬以後，汪因嫡系人物，都不在左右，對之更加倚畀。高則於汪兼外長任內，爲亞洲司司長，向以日本通見稱。近衛三原則，即由高自滬經港，再親往日本取回。汪之決心談和，以及決心離滬，高陶兩人，事前均曾向汪極力慫恿，高陶可說是汪政權之原動力，而結果在汪騎虎難下之時竟叛汪而去，所以周佛海會因此表示極大之憤慨，冒之爲陰險，稱之爲人心難測。

陳公博周佛海兩人，離滬以後，僅提出和戰意見之不同，而對蔣氏個人，則從無一語之攻擊。在周所公開發表的文件中，且始終稱蔣先生而不名，即在私室談話，亦滿口蔣先生，對日人亦且毫不避忌。但高陶對蔣的態度，比陳、周更要激烈得多。那時高是幫助周作對日交涉。陶希聖擔任「中宣部長」後，登場伊始，即積極對蔣先生攻擊，據本港創墾社印行之「周佛海日記」中所發表陶手訂之宣傳大綱，一開頭即這樣寫：「蔣以國殉共，以黨殉人，挾持軍民，誣主和者爲漢奸，以暴力相摧毀」

云云。他兩人對「和平運動」的熱心，最初表演得卻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要精采萬倍。

汪等於民國二十八年底以前，經不斷與日方接觸後，開始與日方正式談判所謂「調整中日邦交條件」，地點就在上海愚園路一一三六弄六十號，即我與羅君強的寓所所在。當時雙方出席代表，日方爲影佐、犬養健，其餘似爲晴氣、谷萩。而汪方初爲周佛海、梅思平、陶希聖及高宗武四人，陶高在當時所處地位之重要，於此可見（高陶出走後，改由林栢生與周隆庠代之），會談一開始，先由日方以油印的具體條件，向汪方提出，等待汪方逐條研究後，再提對案，舉行正式談判。高陶携港後，在各報發表的，即爲此項日方最初所提出的草案，雖然僅是草案，但以日本條件之苛刻，頗使全國震動，而予汪方以最嚴重之打擊。

說到日方片面所提出的所謂「調整中日邦交基本條件」草案，事實上並不是一件什麼奇貨。因爲會談的會場，就是我住居地方的一間大會客室，一切會場佈置等等，都由我指揮部署。當第一天開會之先，我還進去照了一張相，這是僅有的一張歷史性的留影，一向什襲珍藏。這次離滬南下，深恐貽累家人，忍痛毀去。當時會議一開始，影佐即以事前油印好的草案一大疊，在會場分發，非但正式參加者之高陶，自然應得一份，即散會以後，多餘的仍留置在會談桌上，並未携去。因爲日方明知這不過是一張估價單，憑天索價，汪方勢必着地還錢，內心上就對之並不重視。又因會場與後面的小會客室，僅有一重絲絨的門簾爲隔，聲浪可以清楚的傳入，我在小會客室中靜聽，佛海首先大聲表示日方條件如此苛刻，則一切將無從談起。影佐的答覆則是汪方可以另提對案。中間又夾雜了犬養健調停的話，第一天的會談，就匆匆散會。不料高陶竟挾之以爲邀功之具，港渝亦且視爲瑰寶，可哂也！

如前文所述，高陶抵滬以後，始終不肯住於保護周密之一一三六弄。那時上海暗殺案件，已層見

疊出，汪周等很以他們的安全爲慮，屢屢勸其遷入，高陶則一味托詞延宕，重慶特工人員之得以達成目的，汪方於其出走前的絕未發覺，此爲最大之原因。因爲高陶事前表演得既積極而又出色，又加上與汪之私人關係，所以從無人對之發生懷疑。但可以斷言高陶之出走，絕非簡單的所謂「深明大義，幡然變計」。以高陶的對於和運，均以勞苦功高之開國元勳自命，對權位志不在小，那時對日的談判雖方在開始，但政權成立後之重要人事，已擬有一個大概的輪廓。汪所內定的，是政權成立以後，陶除「中宣部」外，兼任政府方面的「宣傳部長」，而陶則不願任空洞的「宣傳部」，志在取得「實業部」，但實業部汪曾面許由梅思平担任，已無可變更。至高宗武汪認爲其資歷不够，祇能任「外交部長」，高則以爲近衛三原則且由其一手取來，且以後汪政權之外交對象，也不過着重在日本，外長一席，自非其莫屬。但兩人心中雖不滿意，而又不敢與汪面爭。「壯志」難酬，渝方特工人員乃得乘其缺望之際，一經誘勸，自然很容易取得成功。事前，周佛海對他們的不滿情緒，也有些發覺，所以曾一再以溫言相慰，但空言無補，終無法挽回叛離之決心。高陶之出走日期，大約爲民國二十九年一月三日或四日，由滬秘密搭輪來港，而汪直至五日才知道這一個消息。當高陶行前之兩三日，高尙與周佛海作一度密談，周一月一日日記云：「宗武來談，兩人相約以國家爲前提，個人成敗，不應計及，中央政府（按指汪政權）必須成立，重慶必須設法打通，兩人分工合作，異途同歸，總以全國停戰和平爲目標，努力前進。兩人發誓各自努力，各相諒解。」云云。高陶的手段，真無愧於爲一翻雲覆雨的能手！

可以斷言高陶的決心離滬，已有相當時日，其所以遲遲不走，必以出走的條件未曾成熟，即可以作爲反正之贖禮尙不够鄭重，故俟日方提出之條件一經取到，立即倉皇登程。

事前尚有一段小事，應加追述的，周佛海一到上海，立即籌備擬於汪政權成立之日，在南京創刊一張日報，當時係由羅君強與葉如晉積極進行（即後來之「中報」），陶希聖為「中宣部長」後，一再與君強商酌，欲改為「中央日報」，置於「中宣部」管轄之下，君強堅拒，至起齟齬。在高陶臨走前數日，君強且抵書陶希聖痛罵之。陶極氣憤，曾以君強之原函哭訴於汪。故當高陶離滬後，於一月八日舉行擴大幹部會議時，汪猶對陶多方袒護，而陳璧君則明白說：陶之去，實為羅君強所迫成。羅為周之親信，當場曾予周以很大的難堪。

陳公博於汪抵港之後，雖於二十八年底曾一度秘密到滬，但其目的是在阻汪懸崖勒馬，停止組「府」，以免使國家陷於分裂。汪雖頗為所動，但已騎虎難下，公博留數日，又匆匆返港，自陶希聖之不告而去，周梅均非汪之嫡系，輔弼無人，頗感惶慮，陳璧君乃親自去港，責陳以友朋之義。公博為性情中人，躊躇再四，卒恐汪之陷於孤立，毅然偕陳璧君赴滬，結果終以身殉。假如陶不走，陳亦決不參加。陶及今清夜捫心，對公博其亦有我不殺伯仁之感耶？

（十八）公館派與CC間的暗潮

天下的是是非非，正是難說！有時至蓋棺而仍不能下一定論，千古亦安從得一完人？有人以一律而掩百瑕；也有人以小疵而沒大醇。汪氏最初以對於國際情勢以及抗戰局勢判斷之錯誤，尤深懼中

共之坐大，繼之以重慶當局處置之不當，又加以日本特務機構之從中煽誘，遂使國家於對外作戰之時，陷於分崩離析之局，漸至政權對峙，同室操戈，暗殺盛行，多人殞命。汪政權之不爲國人所諒，至抗戰之終於獲得最後勝利，成王敗寇，已屬百喙莫辭。汪政權首要諸人，無可否認其中不免雜有權位之慾與意氣之爭，但也不應完全抹煞其家國之痛與禾黍之思。而在政權建立之前，即不能以孤臣孽子之心，同心同德，覆巢之下，暗中居然已醞釀起派系糾紛。

羅君強有過這樣一句話：「只要有三個中國人在一起，一定分成兩派。」而汪政權中，也的確明爭暗鬥，各自爲政，仍然是一個黨外有黨，黨內有派的傳統現象。

第一：重慶的宣傳是成功的，到今天，有人一提到漢奸政權，大家明白就是指的「汪政府」。但是汪政權中人，對「維新政府」諸人，普遍還存在着羞與爲伍的心理，以爲我們是有所爲而來，而你們是徒爲一己之利祿，甘作日敵之鷹犬。所以，當汪氏在滬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前夕，許多國民黨的老黨員，聲淚俱下的向周佛海提出了兩個要求：（一）「維新政府」中人，不許當選爲「中央委員」；（二）曾經參加過「維新政府」的國民黨黨員，即不得充任爲「代表大會」的「代表」。周佛海以形格勢禁，謂維新政府既向在日人羽翼之下，我們今天表面上要與日人合作，如其連形式上也將維新中人摒棄于新政權之外，則今後一切，勢將無從談起。故力勸大家要隱忍，要退讓，結果成爲一場不愉快而無結果的爭論。當時即有人凄然地說道：「與變相的『維持會』同流合污，將何以自解於國人？豈非『維新政府』是前漢，而我們竟成爲後漢？」終「汪政府」之局，梁鴻志雖任「監察院長」，而詩酒自娛，甘於伴食。任「司法院長」的溫宗堯，早已老朽昏庸，尸素其位。此外在「汪政府」中仍在活躍的人如任援道、陳羣、鄧祖禹之流，雖其後貴爲「部長」、爲「省長」，陳周諸人，或

虛與委蛇，仍隨時提防，目的求其不從中向日人作梗，而心理上則始終存有「非我族類」之感。

就是「汪政府」的從龍諸人中，所謂公館派與CC之間，也復壁壘森嚴，暗潮迭起。汪氏離滬赴滬，其舊日幹部，都未回來，參加「汪政府」的亦僅寥寥數人，所謂公館派，是指林栢生、陳春圃、褚民誼、陳耀祖、周隆庠、陳君慧諸人而言。事實上的所謂公館派，僅基於歷史上的淵源，而是一種心理上的形成。其中大部份在行動上並無表露，比較突出的是林栢生，與周佛海之間，也不時發生一些小磨擦。就以我為例，像本文前面所述，我與栢生有過一段相當密切的友誼，上海中華日報的創刊，我曾經盡過力，抗戰期中國軍撤退後休刊期間，因欠租涉訟，法院已命令拍賣執行，我又曾經保全過該報的房屋機器，迨汪氏之「和平運動」發軔，中華日報復刊，我又冒大不韙而助其實現。事實上栢生的對我也並不錯，在「第六次代表大會」前，他並未徵求我的同意，由港來電，保舉我為廣東代表。自他抵滬以後，也有過好幾次歡愉的晤談，但以我允周在先，不便捨周而就林，因此，終以派系觀念的作祟，其後數年之中，我與栢生始終弄得格格不入。

當佛海邀我參加之始，我就強調不再担任有關報紙方面的工作。但不幸得很，在港時即與佛海談定，「汪政權」出現之日，同時在南京創刊一張新報紙問世的葉如音，當佛海到滬以後，如音也追蹤而來，與羅君強共同負起籌備的責任，時法幣猶未貶值，如音先後領到了約十萬元的鉅款，一事未辦，即不辭而別。這事使佛海弄得萬分狼狽，因為辦報的經費，是公款而非出於佛海的私囊，開頭第一件事，就使他無法向汪氏交代，所以一時情感很衝動，意欲得如音而甘心，我力為緩頰，佛海就提出了由我續辦為條件。事實上佛海的左右，的確也沒有對報紙略有經驗的人，在此情勢之下，我只有違背我最初的本願而勉為其難，這就是其後在南京發行的「中報」。

報紙真是一件最容易招惹是非的東西，中報還在籌備期中，即已發生了無數的麻煩，起初陶希聖要求羅君強把他改爲「中央日報」，經君強堅拒之後，且貽書詆責，曾成爲一軒然大波。陶希聖走出之後，林栢生繼陶爲「中宣部長」，又向我重申前議，希望改組之後，由我出任「中央日報」社長，我轉商之於佛海，佛海倒並無一定成見，「三個人就成兩派」的羅君強，卻力持反對，以爲我們辛苦經營，何苦讓栢生坐享其成。當我向栢生婉言答覆的時候，他非但對佛海顯出了芥蒂，連對我也表示了從未有過的冷漠。

在汪政權「還都」的前夕，正在安排各「院」「部」的人事時，一天，佛海忽然問我：「你希望擔任什麼職務？」我當時說：「我願意以友誼幫忙，我過去一向從事於自由職業，閒散已慣，不希望因有職務而受到拘束。」佛海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沒有名義，也就不能做事。我的意思，你最好擔任宣傳部次長，兼中央通訊社社長，再兼中報的副社長（社長由羅君強擔任），較爲合適。況且你與栢生爲老友，他既希望過你幫他忙，更是一舉兩得，你先去與他商定了我再報告汪先生。」當我銜命去會晤栢生，道達來意之後，不料栢生竟爾率直拒絕，他說：「宣傳部次長人選已決定，爲了國際宣傳，將由湯良禮（現在印尼僑居）任政次，『維新政府』的『新聞局局長』孔憲鏗，由日人推薦爲常次，無法拒絕，人事已定。政府一切都由周先生主持，難道他竟然能不安插像你這樣的一個人？」我碰了一鼻子的灰回去，佛海聽見了又是一度衝動。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佛海的日記中有一段云：「旋謁汪先生及夫人，談一般問題，切陳不可有小組織，以召內部分裂。並坦白直陳林栢生組織小團體，排斥異己爲不當。」云云，計其日期，大約即爲此事而發。終汪政府之局，公館派與CC之間，明爭暗鬥，相處從未融洽。

幸而汪氏對周，真能推心置腹，視同股肱，周世能任勞任怨，如能兼汪身長元（名義上）身長元（名義上）的私誼而來，對汪政權也一直採取消極態度，在名義上是陳高於周（汪政權建立以後，陳初任立法院長兼上海市長，周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在實權上，則周重於陳。外交、財政、金融，以至軍事、特務，無不叢集於其一人之身。直至勝利為止，兩人如水乳交融，相處無間。此則不能不說由於汪之優容，陳之氣度，以及周之才能，始克相安於無事。

（十九）周佛海左右之十人組織

佛海本為CC系最高幹部之一，過去與汪系絕無淵源。在汪政權中，所謂公館派者，對佛海也仍然以CC目之。周平時與梅思平、岑德廣（字心叔，前清兩廣總督岑春煊之子）往返較密，過從幾無虛日。當周來滬之始，同來者僅其舊部羅君強與其內弟楊惺華（兩人迄今仍繫滬提籃橋獄中，消息不明），一信而一親。丁默邨與李士羣兩人，本為CC的中統舊人，亦被視為周系人物。但汪政權六年之中，梅思平一度會擬離周而獨樹一幟，中間屢有不洽。丁李之間，丁之資歷遠過於李，而李與土肥原之關係，則較深於丁。當汪政權建立之前，丁李為爭「警政部長」一席，勢成水火，周初則袒丁，終以丁出任「社會部長」，由周自兼「警政部長」，爭端始泯。以後周丁之間又不睦，而李忽有向周表示效忠之意，一度成為周左右紅人，有駕君強而上之之概。迨周讓以「警政部長」，又推薦為「江蘇省長」，李漸有跋扈之狀，甚且於李所主辦之「國民新聞」上，對周公開攻擊（周為該報董事長）

，使周難堪達於極點。以後李之爲日人所毒斃，雖爲羅君強與熊劍東合謀而成（經過詳後），一切則靡不種因於此，而周李之間的感情，亦從此成凶終隙末之局。

周佛海對汪氏雖事之維謹，對於小團體亦屢以不得羣衆之利，反受羣衆之害爲言。但過去於黨同伐異中浸染已久，實亦未能超然於派系之外。尤其羅君強朝夕在旁絮聒，以爲欲展其抱負，竟其事功，不能不有赤心輔佐者收指臂之效，一再進言，周卒爲之意動。在民國二十八年九、十月間，君強曾就周左右較親密者數十人，擬一名單，呈周核定十人，以擁周爲目的，結爲金蘭之誼，俾成爲周系之核心。擬於汪政權建立以後，分任爲十部次長，俾周之耳目，得分佈於各個部門。後來由周圈定易次乾（後任中央儲備銀行發行局長，旋病歿）、耿嘉基（三十三年以受日人迫害，憤而自殺）、羅君強、汪曼雲（後任農礦部暨司法行政部等次長，現爲中共拘押）、蔡洪田（後任江蘇民政廳長，現在港）、章正範（後任浙江省政府委員，中共南下，被槍殺於杭州）、周樂山（後任安徽明光區專員，爲羅君強所逼，在獄仰毒自盡）、張仲寰（後任江蘇教育廳長，現在海外）、戴策（後任中央黨部副秘書長，現留大陸）、金雄白（後任中央委員、憲政實施委員會委員、中政會法制專門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職，現留港），其後，十人出任十部次長之計劃終未實現。佛海亦深以構成份子，份量不够，於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下旬，重加改組，其新組織之名單如下：李士羣（後任警政部長、江蘇省長等職，三十三年爲日人毒死）、羅君強（後任司法行政部長、安徽省長、上海市政府秘書長等職，現繫滬獄）、汪曼雲、蔡洪田、戴英夫（後任教育部次長、上海市教育局長等職，現在滬）、金雄白、周學昌（後任南京市長）、沈爾喬（後任浙江民政廳長、代理省長等職，現在滬）、朱樸（後任交通部次長，現在港）、王敏中（後任教育部內政部次長、江蘇財政廳長等職，現在港），而以梅思平爲顧問。

其中李士羣、羅君強、汪曼雲、蔡洪田、金雄白、周學昌、朱樸爲與周之直接關係。王敏中、沈爾喬由梅思平所推薦。時周丁之間已失和，戴英夫被利用爲刺探丁方之消息者。儀式係在七十六號舉行，備極隆重，卽周佛海日記中十二月二十三日記云：「晚，赴七十六號，約集士羣、君強、曼雲、洪田、英夫、雄白、學昌、爾喬、樸之、敏中十人作懇切之談話，勉以顧全大體，以事業爲重」云云。卽指此結盟之一幕也。

（二十）鄭蘋如謀刺丁默邨顛末

在汪政權中，太多醇酒婦人之輩，而「七十六號」的特工首領丁默邨，尤其是一個色中餓鬼，他雖然支離病骨，弱不禁風，肺病早已到了第三期，但壯陽藥仍然是他爲縱慾而不離身的法寶，他當年與女伶董芷苓的繾綣，早成公開秘密，而鄭蘋如的間諜案，更是遐邇喧傳。海外書報中曾不少有記述此案的經過，可惜有些是語焉不詳，而有些則與事實相去太遠。

鄭蘋如是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首席檢察官鄭鉞之女，生母是日本人，她在上海法國學校讀書，家住法租界法國花園附近的呂班路萬宜坊。萬宜坊中有着上百家人家，其中活躍如鄭韜奮，艷麗如鄭蘋如，都是最受人注意的人物。我也有一段時期住過那裏，每天傍晚，鄭蘋如常常騎了一輛腳踏車由學校返家，必然經過我的門口，一個鵝蛋臉，配上一雙水汪汪的媚眼，秋波含笑，桃腮生春，確有動人丰韻。不知她怎樣竟加入了軍統任間諜工作？又不知怎樣竟然會與汪方的特工首領丁默邨發生了曖

味關係？

丁鄭之間的往來，已經有了好幾個月，丁默邨是個特工首領，處於那時的環境中，對事物物，樣樣提防，而唯獨對於鄭二小姐卻十分放心，數月之間，也從沒有發現她任何可疑之點。一天，默邨在滬西一個朋友家裏吃中飯，臨時打電話邀鄭蘋如來參加。飯後，默邨要到虹口去，鄭蘋如也說要到南京路去，於是，同車而行。從滬西至南京路或至虹口，靜安寺路都是必經之道。當車經靜安寺路西伯利亞皮貨店門口時，鄭蘋如忽然要向西伯利亞買一件皮大衣，勸着默邨同她一起下車幫她挑選。特工人員知道到一個沒有預先約定的地點，而停留不逾半小時，認為決沒有發生危險的可能。默邨以爲她的邀他同去，目的不外是一種需索的手段而已，於是坦然隨她下車。汽車是停在西伯利亞馬路對面的路側，該店是兩開間的門面，當他們兩人穿過馬路到達店門時，默邨看到有兩個形跡可疑的彪形大漢，腋下各挾有大紙包一個，裏面顯然是藏的武器，知道情形不對。而默邨在此緊要關頭，能持以鎮靜，毫不慌張。仍昂然直入店內，而一轉身即毫不停留，撇開了鄭蘋如，由另一扇門狂奔而出，穿過馬路，躍上自己坐來的保險汽車。兩大漢以爲默邨進店，至少要有幾分鐘的停留，突然看到他已跑過馬路上車，立刻拔槍轟擊，但爲時已晚，祇車身上中了十幾槍，彈痕斑斑，而默邨則毫髮無損，汽車也疾馳而去。

他回到七十六號以後，已清楚必然是鄭蘋如出的毛病，既然她能佈置得那樣週密，那樣從容，不露一毫破綻，知道必然是有組織的特務工作。默邨也不動聲色，毫不採取行動，以鬆懈她的警覺。事隔數天，鄭蘋如也滿以爲事非預約，對方決無懷疑之理。第三天還親自打電話給默邨慰問。默邨自然假意敷衍，依然柔情一片，還約了鄭蘋如下次的幽會日期。她爲了表示坦白，居然遵約而至。一到，

自然給默邨預先埋伏的警衛立刻把她扣留了。

在審訊中，鄭蘋如承認了爲重慶工作，而且是奉軍統之命行事。默邨爲追查有關線索，發交給原軍統四大金剛之一的林之江看守盤問。拘留的地點，也就是林之江的滬西家裏。鄭蘋如真有本事，她對林之江（林於前數年，在香港病死），眉挑目語，獻盡殷勤，一再誘林相借私逃。林事後告訴我，以鄭蘋如的煙視媚行，弄得他盪氣迴腸，曾經幾度爲之意動。而丁默邨最初也餘情未斷，頗有憐香惜玉之心，並不一定欲置之死地。一天在佛海住宅中午飯，我也在座，許多汪系要人的太太們紛紛議論，事前都會經到她羈押的地方看過，一致批評鄭蘋如生得滿身妖氣，謂此豸不殺，無異讓她們的丈夫更敢在外放胆胡爲。默邨的太太當然是醋海興波，而其餘的貴婦人們尤極盡挑撥之能事，當時我看到這樣的形勢，早知鄭蘋如之將必難倖免。

果然，幾天之後，槍殺的命令下來了。由林之江押着她到中山路旁的曠地上執行，上車時告訴她是解往南京，不久即可開釋。車抵中山路，要她下來時，她纔知道這已是她的畢命之地。但是她依然態度從容，下了車，仰着頭，向碧空痴痴地望着，嘆一口氣，對之江說：「這樣好的天氣，這樣好的地方！白日青天，紅顏薄命，竟這樣的撒手西歸！之江！我們到底有數日相聚之情，現在要同走，還來得及。要是你真是忍心，那末，開槍吧！但是我請求你，不要毀壞了我自己一向所十分珍惜的容顏！」說完，一步又一步地走向林之江，面上還露出一絲微笑。一向殺人不眨眼的林之江，對此一代紅粧，而又表演戲劇化的一幕，竟至手顫心悸，下不了毒手。他背過臉，指揮他的衛兵上去，他急忙走遠了幾丈路，槍聲起處，血濺荒郊，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就此爲國殉身。到今天，還有誰想到她呢？似乎勝利以後，卹典中且並無鄭蘋如之名！亂世性命賤于狗，真不知會糟蹋了幾多有爲的青年！

(二一) 如此這般的雙方特工戰

在我開始寫本書時，我曾經指出，汪政權的一幕，是時代的悲劇。而重慶與汪方的特工戰，非但是悲劇中之悲劇，卻又是悲劇中的滑稽劇。雙方的同室操戈，流血五步，不論基於何種目的，在文明社會中，以暗殺爲制裁或爲報復的方法，總是不光明與值得詬病的事。尤其淪陷區的民心傾向於抗戰，對於七十六號不擇手段的做法，特工人員的橫行閭閻，包庇賭窟，公然開設於南市與滬西區大規模的賭窟，有「好萊塢」等不下數十家，雖然背後有日本特務機關因籌措經費而爲之撐腰，但直接使民衆對汪政權懷着最大的反感。周佛海雖是特務委員會的主任委員，而李士羣等表面雖受命於周，同時也受命於土肥原的特務機關，且有晴氣等的日本特務人員常駐七十六號發縱指揮，形成大權旁落之狀態。周佛海在日記中一再對特工人員的無所不爲，表示痛心疾首，然而形格勢禁，無法出以斷然的手段。加上了丁默邨與李士羣之間的爭權傾軋，周佛海祇有用言語加以溫慰，以爵祿與金錢以爲羈縻。然而丁滿足了，又引起了李的反感；李高興了，又難免使丁失望。周時常調停於兩人之間，他居主任之名，而不能對特務工作加以有效的控制。汪府平時固爲此而困擾，而最後周與丁之間，彼此既各懷不快，終汪府之局，始終處於貌合神離之境。而李士羣既如上文所述，置於周之十人組織中，固曾融洽一時，卒以羅君強之專斷傲慢，更成凶終隙末之局。今佛海南京永安公墓之墓木已拱，我不必再爲他諉卸領導特工之責任。此段所述，係就事論事，僅欲指出當時的實際情形而已。

暗殺手段，在抗戰之前，本早已蔚成風氣。始作俑者，固無可寬恕，而其後的變本加厲，甚至累及無辜，不論其出之那一方面，其罪均無可道。戰前如汪精衛之遇刺於中央黨部，中委王樂平、外次唐有壬之被槍擊於寓所，已開風氣之先。迨國軍西撤，維新政權袍笏登場，重慶的軍統中統人員，愈趨活躍；日人也在七十六號之前，利用無知流氓常玉清組織「黃道會」從事暗殺。汪政權尙未建立以前，重慶與日方互以上海爲展開斷殺的中心地區，如唐紹儀由軍統派遣林之江（那時林尙未投身七十六號）冒充古董捐客而以利斧劈死。「維新政府」綏靖部長周鳳岐，則乘其送客出外被槍殺於亞爾培路寓所門口（周死後，由「次長」任援道陞任）。晶報三日刊主人余大雄（毅民）被斬斃於「維新政府」之上海大本營——虹口北四川路新亞酒店浴缸中。社會日報社長蔡鈞徒（一個加入黑社會的文化流氓，現在中共宣佈其爲共黨黨員）被梟首後，將頭顱懸掛在法租界的電竿木上。申報記者錢華，乘人力車行經跑馬廳側的龍門路時，遭三彈擊斃。那時的上海早已陰風慘慘，人心惶惶，報紙上時常有大字標題的暗殺新聞。與政治有關的人物，不論是屬於那一方面的，都有人人自危之感！

而汪方特工與渝方的實行暗殺戰，是悲劇，是滑稽劇，也是想不到的奇跡。因爲，汪方特務工作的最高主持人周佛海，儘管他以汪氏對他信任之專，一直認爲汪以國士待之，故有感恩圖報之心，但對他的故主蔣先生，在在流露眷戀崇敬之意。以處於敵對的地位，非但未嘗有所詆譏，且毫無避忌的在嘴下筆下，尊稱蔣先生而不敢名。六年之中，初則千方百計於全面和平之促成，終且輸誠効命，冒險以貫徹中樞的任何指示。他日記中會屢屢提到祇要和平能實現，他願意束身待罪。有一次我問他，我說：「你以爲抗戰的國際形勢，不利於我，日人發動了侵略戰爭，結果亦證明泥足愈陷愈深，爲了救國家於危難，拯陷區人民於水火，因此從事於這一個和平運動，但假如這判斷錯誤了，而抗戰有

日終於勝利了，你又將如何呢？」佛海當時毅然的道：「祇要抗戰真能勝利，國家前途有望，我們還有什麼遺憾？我願意含笑引頸就戮，又何必斬惜一身？」此數語不失為由衷之言。而且周助汪以後，他的岳父楊卓茂雖被關閉於息烽集中營，但予以充份優待。他的老太太被軟禁於成都，而日常費用仍由軍統供給，平時生活照片，也不時輾轉送周以安其心。以後秘密電台建立，更隨時以周老太太的近况報告。直至民國三十四年夏，周老太太病逝，當天即接到秘密電台的電告（當時滬渝間表面上電訊已中斷），而翌日滬上各報，即已遍刊訃告。

佛海既與重慶有默契、有諒解，而重慶的特工系統，也不外為中央黨部CC的中統，與軍委會黃埔系的軍統。而周在戰前南京時代，既是CC的最高十幹部之一，又是所謂藍衣社七個最高幹部之一（周畢業於日本京都帝大，回國後，即赴粵出任黃埔軍校的政治教官，以此與黃埔系有直接淵源），與重慶的兩大特務組織有深切的關係，非迫不得已，即明知為渝方特務，亦決不予以捕殺。如其二十九年四月二十日日記中云：晚約陳肖賜來談，陳為重慶任情報，因係老友，故大胆來此。又如五月二十日日記：（陳）警洲報告，在滬晤戴笠由港來滬之代表張某。又九月九日云：士羣引見陸大槐，甫由閩來之渝方特工要員也。而丁默邨則為中統創辦時的第二處處長（戴笠為第三處處長）。李士羣留俄回國後，也一直擔任着中統的中級幹部，而士羣先後投日靠汪以後，儘管一面與重慶方面，以槍還槍，大殺特殺，但與戴雨農氏之間，仍有電台聯絡，如周佛海日記九月二十日日記云：「返寓後，接士羣電稱：戴笠來電，謂不敢將余致蔣電呈蔣云云（按：指周有關全面和平之建議）。」所以在民國二十八、九兩年中，上海雖然表面上殺來殺去，而背地裏則聲氣互通。汪方特工，既要祛除日人的疑心，又要獲得重慶的諒解，被殺者並非一定是國賊，或是頑敵，而祇是行動人員的工作表演而已，此其

所以爲悲劇、爲滑稽劇、爲奇跡也！

(二二二) 追悼會竟然引開了殺戒

汪氏等抵滬以後，儘管特務工作，已有相當的實力，而且軍統中統重要人物，如林之江、王天木、胡均鶴、陳恭澍（即當時出版藍衣社內幕之作者）、萬里浪、謝叔銳等紛紛來投，事實上對於重慶方面特工人員並沒有出手還擊。到了二十八年的秋季，上海參加汪方工作、或與汪方有默契的，已有季雲卿（清幫通字輩人物，爲季士羣之老頭字）等十二人遭暗殺了。七十六號的大禮堂中，開了一個大規模的「十二烈士追悼會」，周佛海、晴氣等紛紛致辭，會場充滿了一片悲哀的氣氛。大會匆匆散會，周佛海也已回到他的辦公室，不料十二被害者的家屬五六百人，跟着一湧而進，孤兒寡婦，蔬衣如雪，全部跪在地上，嚎啕痛哭，大呼「報仇」！「報仇」！佛海最初還百端勸喻，而家屬代表在情感極度衝動之下，高聲嚷着說：「我們幫你做事，被人殺了，你們不還手，是不是我們的丈夫、我們的父親該死？你是不是還希望別的人繼續做工作？我們有力量，爲什麼不還手？」那時情形顯得有一些混亂，我站在周的旁邊，看他舌敝唇焦盡力勸慰之後，家屬並未停止喧嚷，佛海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呆呆的不發一語。僵持了一小時左右，周的情緒也有些激動了，在稍一遲疑之下，終於提起筆來，批准在七十六號拘留所中的一個滬西惡霸，立即提出鎗斃。不料由於這一個追悼會，從此引開了殺戒！當時我目擊這一幕，心裏真有說不出的難過，但在那時情況之下，誰也無力制止，就這樣糊裏糊

塗莫名其妙的開始了自相殘殺！而且被殺的都是無足輕重的小人物，如蔣伯誠、吳開先等，拘捕後不但營救釋放，而且歛爲上賓。蔣還安閒地在滬照常指揮工作；吳則索性用專機送至邊界，安然返渝。汪政權的微妙，在特務工作一點上，尤其顯出了它的特色。

我不常到七十六號去，而且與特務工作毫無關係，僅偶爾從佛海口中聽到一些消息，或者在他臥室的小寫字桌上，有時看到若干七十六號呈報的公文。所以此後如中國銀行的集體屠殺案、定時炸彈案等，雖曾轟動一時，現在記憶中已無法追述當時詳細經過。下面所寫的一鱗片爪，僅就我所知道的，寫出當時的真相。

第一次使我最震動的，是二十八年耶誕夜的滬西賭場槍擊鉅案。我清楚記得，在那年耶誕之前，重慶國民政府最高檢察署發表了第三次的通緝名單。像我渺不足道的人，居然也列名在梅思平、丁默邨、羅君強等二十餘人之中。那時我看到了報上的消息，我說不出是驚愕還是奇異，我覺得有些茫然與懺然之感！在暗殺案件層出不窮的時代，被通緝的照例是格殺勿論，我真是一個叛國者嗎？我居然被指爲國人皆曰可殺的傢伙嗎？如我這樣一個毫無作爲的人，也值得政府的通緝嗎？而我，有生以來，心裏第一次有了「人生朝露」的陰影！通緝令發表後的一兩日，就是耶誕前夕，我忽發奇想地向國際飯店十四樓的摩天廳，預定了二十個座位，抱定了「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得意須盡歡」的宗旨。但我不知那是得意還是失意？但我想在未死之前，於佳節中盡一日之歡。認爲較要好的朋友，以及來往較密的膩侶都約定了。我那時和羅君強住在一起，他看到我的忙亂，看到我像是興奮又像顛狂，而且電話中公然約人跳舞，他忍不住向我勸告了，他說：「不管你爲了什麼原因，又何必冒此生命危險？倘然爲了久蟄思動，真是腳癢了，我介紹你去一個地方，兆豐公園對過惠爾康隔壁的兆豐總會，

是賭窟，也附設有舞廳，地點在滬西，爲我們警衛力量所及之處。而且，有許多我們的自己人決定到那裏去玩，且已佈置了二十名携鎗的警衛，我堅決勸告你不去國際飯店，一定要散散心，不如到那裏。——我終於爲他說動了，立即向國際飯店退了定位。就在那時，佛海夫人從隔壁過來了，聽見我們在爭論，她問明了什麼事，她說：「與其出外去冒危險，不如坐在家裏打麻雀。」就這樣，周太太、君強、以及我與忘記了是誰的一個朋友，一起到周家去打牌。牌局繼續到凌晨四時，忽然電話鈴聲響了，傳來了驚人的消息。就是置有警衛的兆豐總會，當許多汪方的人員翩跹起舞之際，鎗聲響了，拔鎗的就是自己帶去的警衛，目標是相當重要的「和平軍」十三師師長何天風，當場中彈斃命（天風死後，由副師長丁錫山繼任，丁於勝利前反正投渝，後又投共，在戡亂初期，浦東作戰中陣亡，爲國軍梟首，在青浦等縣城門示衆）。警衛得手後，乘間逃逸，問題是起於十三師內部人員的爭權，而又受到重慶方面人員的運動。這對汪政權是一個很重大的影響，使內部人人自危。而我初由君強的勸阻，幾乎躬逢其盛，卒以周太太的慫恿打牌，臨時變卦，否則即使不死，也要飽受虛驚了。從這一次起，我懷了戒心，非不得已，決不外出。在這六年中我能倖保殘生，無不得益於這一次的教訓。

（一二三）上海爲腥風血雨所籠罩

雙方展開暗殺最猛烈的時期，是民國二十八年與二十九年，也就是汪政權在滬醞釀與轉往南京建立的那兩年。雖然那時周佛海與重慶還未真正取得密切聯繫，但不能不說在特務工作上，雙方早已有

了默契，表面上是做得勇猛殺搏，而暗地裏卻是聲應氣求。倒霉的是雙方沒有保護的低級人員，有人爲了抗戰，有人爲了和平，說穿了大多數人是爲了衣食，他們爲一方面工作，因爲是小人物又不能不拋頭露面，出外奔走，這樣很容易爲特工人員造成立功機會。

如前所述，首先取攻勢的是重慶方面，軍統與中統做得都很熱鬧，除了所謂「十二烈士」之外，如「維新政府」外長陳籛被殺於寓所，公共租界總探長陸連奎被殺於他所經營的中央旅館門口，法租界政治部的×更生（他是雙方都稱爲烈士的奇怪人物），大舞台老闆渾名阿富郎的，「三大亨」中之張嘯林，都因與日方有了關係，渝方採取了殺一儆百的手段。丁默邨接盤了上海四馬路石路口的文滙報，先後委劉炳鷗與穆時英任社長，報紙還未出版，而兩人又被人途次伺伏，乘機遭槍殺了。其他還有我已記不起名字的金融界二三人，都在街頭被狙擊殞命，全滬乃成爲一片腥風血雨之場。

現在美國的所謂報復政策，倒是汪方特工發明在前，他們的還手辦法，是一個抵一個，你殺我一個新聞界人物，我也還你一個新聞界人物。你殺我一個金融界的，我也還你一個金融界的。最慘酷一次，自然是江蘇農民銀行與中國銀行的集體槍殺與集體綁架，血洗的結果，中國銀行屈服了，七十六號派了李祖萊進去擔任副理，爲停止報復的交換條件。

同時，七十六號發表了一張通緝八十三人的離奇黑名單。大部份人是並不重要的新聞從業員。七十六號在申新各報中都潛伏着情報人員，成立了一個新聞小組，每週在七十六號開會彙報一次，租界內各報的動靜，應該是清楚的。而這一張八十三人名單，非但連一個普通的外勤記者也列入於名單之內，甚至若干已經參加汪方的人，仍然是通緝的對象。舉一個例來說：新聞報的編輯陳達哉，早已在我所主持的南京「中報」擔任秘書職務，看到了黑名單中赫然有他的名字在內，非但他感到驚愕，連

我也爲之啼笑皆非。雙方新聞界的浩劫，一直持續到太平洋戰爭日軍進入租界以後，才告停止。名單的所以會有此離奇現象，七十六號當局是情形隔膜，以耳代目，爲七十六號工作的各報情報員，夾雜有私人恩怨在內，把平時不愜意的同事，不管人家的死活，隨便開一個名字上去，既可以塞責，又可以洩憤。亂世性命賤於狗，於此益覺信然！

因爲我是報壇舊人，對於同業也就特別關心，不幸新聞界的朋友們卻死得特別多，我往往於見到報載後才爽然若失，自覺耳目較近，而竟至無能爲力，看到同業們的先後殉職，不覺興兔死狐悲之慨，內心也充滿了歉咎之情。因此我時常與佛海力爭，以爲新聞界的大多數人士，除敬業樂業之外，並不含有任何政治作用；即使言論稍趨激烈，也是憑了他們的良知，以發表其心聲。假如和運是爲了救國，我們也不能不承認抗戰更是救國，對於手無寸鐵的人，因逞一時意氣，肆加殺戮，於心何忍？佛海也頗難余說，深爲我言所動，我也曾偷偷引若干地位較重要而與余關係較深的抗日記者與佛海見面，取得默契。佛海於接見之時，很直爽的說：「你們對日本人儘管罵，但我們有我們的苦衷，對政府，希望彼此精神上能獲得諒解，不要出以過份的攻擊。」那時留在上海的報館重要人員，幾無一不會由我陪同與周見面的，這裏我不想列舉他們一向自以爲忠貞者的姓名了。但我所能爲力的，也僅如此而已。

經過了大難，會相信「生死有數」的迷信說法。譬如新聞報採訪部副主任顧執中（現在北平，被中共指爲九三學社中之右派份子，曾於開會圍攻中撞柱求死），我與他是時報舊同事，他在白爾部路民淪新聞學院門前被擊未中，後逃淪得免，而我事前確是一無所知。又如大美晚報記者程振章在辣斐德路的被殺，他是一個新進，決不應該是狙擊的對象，甚至我從未聽到過他的名字，而竟然枉送一命

。又如前申報記者張寄涯，那時在主持一家採取抗日立場的通信社，又大中通信社的吳中一（前民國日報記者，後病逝內地），事前七十六號呈報佛海，要對他們下手，我偶然在佛海書桌上看到了，暗中及時分別通知，才告無事。大美晚報總編輯張志韓（現在台灣報界任職），汪方特工已在佈置窺伺其行踪，在情報上說他時常改穿了短衣，行走於棋盤街一帶，我直接用電話警告其防衛，而他反以為我在危言聳聽，而結果也終於無事。新聞報編輯倪瀾深以及嚴謬聲太太遭拘捕後並沒有人請託，都由我自動設法保釋。

而其中有兩位送死與討死的人，當事發之時，曾經震動滬濱。一個送死的是想火中取栗的英文大美晚報的張似旭，據我所知道，他早與汪方接洽成熟，應允改變報紙立場，並且先後已收受過相當數額，而一再遷延，激起了七十六號的憤怒，張似旭也索性避不見面。結果趁他在南京路靜安寺路口的凱司令西餐館午餐的時候，在一陣亂槍下轟擊斃命。另一位是中文大美晚報的朱愷公，他是一個神經質的人，可以說他是名士派，也可以說他是狂士，喝喝酒，抽抽大烟，酒後與會淋漓，則寫幾篇憤世嫉俗的文章，以邀得讀者們的喝采，他的目的也不過如此。特別對汪政府不斷的謾罵，因為他知道上海大多數的市民是抗日的，而大美晚報的立場更是抗日的。起初，七十六號也目他為狂士，並不要置之於死地，曾經有人警告過他不必為過甚，而他在報上的公開答覆：「老子一定要罵，有本領就來打我。」他的態度，真是在討死，迫得七十六號不能不殺之以立威，於是趁他行過每日必經之天后宮橋堍時，派幾個打手，掩襲其後，就輕輕的斷送了他一條生命。他狂得可驚可愛，但是太不智了，太歲頭上動了土，又不知如何隱藏行踪，雖然人生自古誰無死，又何必定要如此毫無代價的白白送了一命？

(二四) 特工戰中申報首當其衝

申報記者金華亭非但是我的老同業、老朋友，而且從民國十三年起，我們同時分任上海兩家大報的政治新聞的採訪任務，我們都是上海報壇上的第一批專任外勤的記者，又同是北伐時期的隨軍記者。雖然我們之間，性格上並不融洽，而形迹一向相當密切。他是我的朋友，也是佛海的朋友。當民國二十七年國軍退往漢口後，佛海正代理宣傳部長職務（部長爲顧孟餘，始終未蒞任視事），那時華亭去了漢口，他去看佛海，佛海知道他還是要回到上海的，立即派他担任宣傳部駐滬特派員。他回滬以後，還與我見面，帶來了佛海的口信，希望我赴漢幫忙，去當宣傳部的新聞處長，我正因律師職務忙迫，接手的案件無法擺脫，兼以交通困難，及至想摒擋啓程，漢口又淪陷了，卒至因循未果。不料二十八年秋，佛海隨汪氏來滬了，華亭的特派員職務，與那時佛海所担任的角色，由隸屬關係一變而處於敵對的地位。佛海深恐他處境困難，由章正範等的接線，約華亭見面，同樣佛海坦率地告訴了他一些和運內幕，希望照常做他的特派員，但不要妨礙他個人部份的工作，並月餽五百元爲津貼。當時談話的經過很和諧，以後也逐月由正範將津貼送去，祇要華亭能够稍善於應付，以他與佛海的私誼，決不至召殺身之禍。尤其該報主持筆政的潘××，也與佛海爲老友，佛海曾經拉攏過他出任教育部長，彼此見過面，雖以條件不合，未成事實，但對於上海銷行最廣的申報、新聞報，在佛海心裏，則確無敵視摧殘之意。

華亭爲人非但吝嗇成性，且好放言高論，一向人緣不佳，所有汪方所接情報，都對華亭不利。在二十九年，一次我去南京，往佛海公館，佛海一見面就說：「都是你一向爲申新兩報說情，現在反而使我爲難了。汪先生認爲過去處置太寬，才弄成現在的狀態。」我聽了正在莫名其妙，佛海把汪氏的手諭拿出來給我看，那是一紙便條，我還清楚記得寫着如下的寥寥幾個字：「佛海兄：申報言論荒謬，請兄嚴厲制裁。兆銘。」我呆呆的看了一遍，問他：「你預備怎樣呢？」他說：「昨天申報潘××所撰的社論，罵得我們太過份了，汪先生既有命令，我無法再爲迴護，已去電七十六號立刻行動。」我懂得行動的含義，綁架、暗殺，也可能有更甚於此的事。我說：「我是望平街出身的人，我不能不替一班老朋友說話，我僅憑良心，並無作用。是不是能讓我再以私人資格去勸勸他們，在此期間，請你暫緩行動。」佛海說：「電報已經發出，一切已無從挽救，那祇能看他們的命運了。」我垂頭喪氣地退了出來，爲老友們無限担心。回到了我所主持的「中報」以後，我突然有了一個決定。因爲那時南京祇有兩家報紙，一是「維新政府」的，由老報人秦墨晒所主辦的「南京新報」，一是我主持的「中報」，本來在淪陷區報紙上，外電祇准用德國的「海通社」，與日本的「同盟社」，我卻不管三七二十一，自己建立了一個無線電台，上海設立了一個辦事處，把反軸心的「路透社」、「美聯社」、「哈瓦斯社」（即現在的法新社前身）一古腦兒通過無線電台拍至南京照登，雖然用的是密碼碼，但簡單得可憐，如以一字代三字，以四字代五字之類。我之所謂決定，即由自己電台上秘密通知申報加意戒備，電報由上海辦事處轉送給趙君豪（現任台灣新生報副社長）與嚴服周（和平後任申報副總編輯，現在滬）。這一個電報居然發生了效力，七十六號原意要送一個定時炸彈進去大幹一下的，因爲防範嚴密，未能得逞。僅由萬里浪在三馬路外國坟山申報外面，投了一個手榴彈，輕傷了兩名路人，作

爲交賤。

但是事情還不能就此輕易了結，七十六號既不能深入申報內部，於是等在外面，把七八個排字工人拘捕了，又把副經理王堯欽（本在港，前數年曾佐史詠廣辦小畫報，近已病逝）。經理陸以銘（現任香港平和洋行買辦）的五六個孩子與一位古稀高齡的姨母一併捉來，關在七十六號。申報總經理馬蔭良與唐世昌一再求我從中設法，我費了幾多唇舌，總算把王堯欽與工友們保釋了。獨陸以銘的家屬，始終拒絕釋放，我當面向李士羣說：「罪不及妻孥，又何苦把無辜的老太太與無知的孩子們糟塌。」士羣的答覆很妙，他說：「如果真是罪不及妻孥，爲什麼重慶要把周老太太軟禁起來？」我說：「我們爲什麼要學人家的壞樣？」士羣答得更乾脆：「我不管這一套。」我受人之托的營救，至此已到了推車撞壁的地步。不料陸以銘再托唐世昌來逼我，問我是否因爲與他不相識而袖手旁觀。其實，我與王堯欽及申報的其他工友，又何嘗相識？我受不了世昌的催問，又鼓勇再以同樣的理由向佛海說情，而佛海的答覆，還是如士羣所說；我忍不住道：「重慶把你老太太軟禁了，你作何感想？爲什麼連你也不能有推己及人的恕道？」他想了一想说：「你說得也對，那就由你出面去保吧！」說着寫了一張手令，由我親往七十六號保出後一直送回他們的家去。不料，這事竟引起了七十六號的反感，傅也文、潘達、萬里浪等，同去見佛海，說他們以性命博來的工作（因爲那時還是租界時代，他們祇能用綁票手段，尚不敢明目張胆），全由我得錢買放了。他們向佛海表示從此停止行動。佛海找我去問，也有朋友爲我證明可無愧象影，佛海相信我不至如此無恥，其實托我的人也不過是利用我的傻氣而已。一場風波，總算不了了而了。但是最後的目標，卻不幸轉注到了華亭身上。

(二五) 金華亭被殺是自取其咎

金華亭的宣傳部特派員爲周佛海所委任，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他很以此名義爲榮，平時開口閉口：「我是中央特派員」，對報館行政，也常以特派員身份盛氣干涉，因此招致了許多同事的不滿。但他與佛海的見面，以及收受津貼的事，是很少人知道，而華亭的心裏則懷着唯恐人知的鬼胎，於是平時調子越唱越高，言論也越趨越激烈，他的真意，無非要表示特派員的忠貞之氣，以祛除人家對他的懷疑。但他的一言一動，都經過潛伏在申報的情報員，加油加醬，報告了七十六號，每天所接到的，盡是他的反汪論調，汪方特工，乃決意下手翦除。

因爲我與佛海貼鄰而住，時常有事接觸，有時他外出沒有回來，我就坐在他臥室中的小寫字桌上等候。他的公事，亂堆在桌上，我於無聊中隨手翻閱，往往發現我所意想不到的事。民國二十九年的春天，我去時他方在批閱文件，一眼我看到了最上面的一件，附着華亭的照片，我知道這決不會是好事，我指着問他華亭有什麼事，他把公事交給我，原來是七十六號請求對華亭執行（暗殺）的簽呈。上面臚舉了華亭的「罪狀」，詳細敘述他出入的時間，以及寄往重慶信件的化名。他那時住在華龍路，把他居住的位置畫了一張詳圖，並黏着他的一張照片。佛海已經在簽呈批了「准予執行」四字。我一方面驚駭於特工調查的詳盡，同時爲這二十年的老友無限焦急。我向佛海說：「你與他也是老友了，他的環境有困難，情報也許出之誇張，一時以情感衝動而殺人，事過境遷，你會後悔的，我希望你

能給他一個機會。」佛海當時還很憤激，他說：「我對華亭要說的話當面說盡了，人情也做盡了，我要他做特派員，他就以這個來反對我，他受了我的錢，又做妨礙我的工作，他無情，能怪我無義？」我繼續爲他爭，我說：「以你與他十載交誼，又何忍不教而誅？如我不知道這一件事，本來與我無關，但既然知道了，良心上我不能不爲老友說話。讓我以私誼向他再進一次勸告，無論如何，請你暫時不要動手。」佛海經不起我的我再三央求，從我手中將公事取回，把原批的「准予執行」的「准予」兩字立刻改爲「暫緩」。我爲華亭鬆了一口氣。

回到我的住所，我急急打了一個電話給唐世昌（前申報夜班經理，爲杜月笙門生，戰前專爲杜聯絡新聞界者）。我坦率地告訴他有關華亭的一切，我又加上了明哲保身一類的話。最後我說：請轉告華亭，這是我對他所盡的最大與最後一次的力量了。數天之後，世昌給了出乎我意外的答覆，我諒解華亭或許有他的立場與他的隱衷。當世昌把我的話轉告他時，他起初有一些驚呆，想了一想後說：「他自己（指我）做了漢奸，居然還公然來恐嚇我！我不受恐嚇！」我聽了雖然很難過，但不敢火上加油，把華亭的話去轉告佛海。但汪方的對付華亭的事，也就此無形中擱置了下來。

一年以後，中央儲備銀行上海分行開幕了，佛海認爲他對申新兩報已盡可能地加以維護，加以寬容。因此在分行開幕的時候，兩報也應當破例爲中儲刊一張開幕廣告。佛海特別找了我，他說：你一直爲申新兩報說話，儲備銀行滬行開幕，請你去交涉刊登廣告（那時日軍尚未進入租界，各報一直拒登汪方廣告），地位的大小可以不計。我分別以電話向兩報負責人接洽，得到的答覆是商量後再給我回信。翌日馬蔭良用電話通知我，代表重慶在上海作地下活動的吳開先，已嚴令兩報不得登載，請求我的諒解。一日之間，經過電話上的數度磋商，到傍晚我再去電話時，已無人接聽，接線生推說負

責人不在。這樣，第二天開幕的中體分行，除了汪系報紙以外，其他終於隻字未登。佛海爲此感到憤怒，尤其對我以往一再爲各報說情，表示不滿。幾天之後，他給我看一張情報，說申新兩報決然拒登的主因，是由於金華亭的力持反對，他揚言誰主張接受的，他將呈報重慶當局嚴厲制裁。

幾個月的時間又平安過去了，我幾乎已忘記了這一件事。那已經是二十九年的殘冬，我正去了南京，這一天我準備搭下午四時車返滬。中午時候，我去西流灣佛海的公館，向他辭行。他正在花園中背着手俯着頭，在陽光下散步，一等我說出下午要返滬的話，他急急地說：「回上海去，你千萬要當心！」我以爲有什麼不利於我的情報。因爲那時丁默邨接盤的文滙報，以劉炳鵬與穆時英于籌備時的相繼被殺，再無人敢在上海四馬路的熱鬧地區去冒險，出版陷於停頓。默邨順水推舟，就送給了佛海，因爲我經辦的「中報」銷路已奠定基礎，所以他又要我去開辦「平報」。我啣命去滬，不到一月，報紙就出版了，但無日不在驚濤駭浪中渡日。我問他是不是有什麼消息，他說：「不，金華亭今日黎明時給打死了。」我一愕，問他在那裏出事的，他說：「在上海愛多亞路大華舞廳門口。」接着他嘆了一聲，又繼續說：「他究竟是我的老友，我因此又覺得很難過。現在的暗殺政策，是一個對一個，你是新聞界最顯著的目標，而且又具有最適宜的身份，我真爲你擔憂，所以要你特別留神。」接着他又問我坐的是什麼汽車，我告訴他是普通的「別克」車，他說：「那趕緊去買一輛保險車吧！」（裝有避彈玻璃與鋼版的）需要錢，可以問我拿。」我聞到了華亭的噩耗，倒真有如他所說的難過，我惋惜地說：「華亭太糊塗了，這個時候，還去跳舞？」佛海答得聲音特別輕，他說：「那是我們派人引他出來的。」我在他那裏吃了午飯後，下午照常回到了上海。

到「平報」去時，已經在午夜，華亭的事，還盤旋在我腦際。我取了一份小報看，記得是盧一方

寫的華亭出事經過。原來上一天華美晚報的主人朱作同邀華亭到他家裏吃年夜飯，飯後慫恿他去大華跳舞，到午夜之後，朱作同說有事先走。華亭興緻勃然，一直跳到四點打烊前纔挾了舞女阿二頭下樓。剛到門口，就被預伏的人，出槍連發兩槍擊斃。華亭原也帶有自衛手鎗，倉卒中竟來不及拔鎗還擊。當我看完了這一段消息，腦海中我立刻浮起了一項懷疑。因為朱作同與七十六號早有往來，李士羣給過他不少錢，要他投靠過來，作同一再在推延。我去南京之前，已知道士羣正在迫他表明態度，作同可能利令智昏，出賣了朋友，而且這可能性很大。第二天我特地去了七十六號，一見士羣，我立刻說：「華亭的事，你做得不錯，朱作同那裏你化了多少錢？」他問我「誰對你說的？」我說是「周先生」，他搖着手要我千萬不可告訴別人。這樣我完全證實了我的懷疑，我認為朱作同太卑鄙可惡了！爲了錢，竟然出賣朋友。我又打電話給唐世昌要他暗中通知與朱作同來往的朋友，加意防範，不要糊裏糊塗再爲華亭之續。這事傳到了中統耳中，一個月以後，朱作同也被人擊斃了，終算爲金華亭報了仇。我所能無愧於老友者也止此而已！

(二六) 我逃過了五次危險關頭

和平以後，中統方面的人告訴我，華亭死後，他們本來的確以我爲報復的目標，後來因由我口中證實了是由於朱作同的出賣，才改變而對他下手。無意中因此一言，卻救了我自己的性命。

但是汪政權六年之中，殺機四伏，我也先後逢到過五次危險，而卒能安全無恙，未傷毫髮。這是

奇蹟，也是徵伴！

汪政權是廿九年三月三十日在南京建立。南京軍警林立，是認爲最安全的所在，我代佛海辦的「中報」，是在城南的朱雀路，雖然是自己蓋的房子，但是毫無防暴設備。也就在汪政權建立後的第七日，突然從門口飛來一彈，總算手下留情，炸力不大，微損了營業部的牆壁，輕傷了一名車夫，這大約僅是示威懲性質。事發時，我剛到頤和路羅君強家去，離開報社不久，到達那裏的時候，就接到了報社來的電話，我與君強一同匆忙趕回去，已經軍警雲集，形勢緊張，因爲這是南京的第一件事，也是汪政府六年中南京唯一的事，我竟然既未受驚，更未遇險。第二天報上還寫了一篇「迎彈辭」，吊兒郎當的寫了「無情一彈，受驚若寵」一類的風涼話，而結果這一件案子也始終未曾破獲。

我主辦的上海「平報」，地處四馬路路口的繁盛地區（卽和平後由吳紹澍接收而改爲正言報），是一間普通市房，那裏行人絡繹，車輛輻輳，本是不容易戒備的所在，又有劉呐鷗、穆時英被殺在前，當我單身去接辦的時候，朋友們都很爲我的安全就慮，我自己也懷有戒心，所以我一到那裏，立刻把面向馬路的窗口，裝上了鐵絲網，牆裏加砌了鋼版，每一個門口，也添加鐵柵，而且雇用三十六名武裝保鏢，作爲警衛。館內職工的出入，都需經過檢查。當平報開辦的第一年中，我以社長兼任了總編輯與總經理，幾乎整整一年，寢於斯，食於斯，工作於斯，非有必要，決不輕出一步。要到別的地方去，也決不預約，且有保車，與隨行武裝警衛人員。暗殺最厲害的時候，身上還穿了鋼絲背心。也幸而有這樣的戒備，雖然民國二十九年一年中，兩次在門口被人投擲炸彈，僅傷了幾個路人，略受虛驚，而全報人員未受絲毫損失。

那年的小除夕，我妻子因爲我不能回家，帶了所有的兒女，到報館來吃年飯團聚一次。飯後，我

催着她回去，她還有些不高興，我說：此是險地，我是沒有辦法，你何必要使一家同歸於盡？她纔勉強的帶了孩子們離開了。她們走後還不到十分鐘，樓下機器房忽然起火，機器房就在樓梯邊，木梯是全報唯一的通道，火一起，頓時濃烟密布，雜有令人暈眩嘔吐的藥味。我們都在三樓，已經無法衝下去奪門而出了，我與同人已準備一起化為灰燼。幸而機器房的工友們努力撲救，未成大患。事後查出就是三十六名保鏢中的一人，帶進了裝滿化學品的玻璃瓶，裏面雜有磷質等，塞在報紙堆中，一去瓶塞與空氣接觸後，立刻因氧化作用而爆炸發火。那時危機四伏，防不勝防，而且報館同事中有兩人有為重慶作特務嫌疑，我會坦白地與他們講過一些我的立場，一位採訪記者原洗凡自動離職了，而另一位編輯芮信容則堅決否認，後來七十六號破獲了一處特工機關，查出了他親筆所寫的情報，把我逐日的動態，詳細報告，於是由七十六號把他羈押檢查，最後還是由我去保他出來。

最危險的一次是二十九年的中秋，因為我終年住在報館，晚上搞編輯工作，一直到天色微明第一張報紙印出，經過我親自過目後方纔就寢，寫字桌旁邊的一只長沙發就是我的床鋪。每日十時左右就得起身，繼續處理營業部的業務，非必要時決不外出一步。但什麼都可以在裏面做，天熱，裏面沒有衛生設備，要沐浴，就不能不到外面去，而家又回不得。恰巧一位來自秦州的舊日同學，遷滬避亂，孑然一身，在法租界巨竈達路賃了一宅幽靜的小洋房，從家鄉帶來了一名男僕，他與政治絕無關係，而且因染有烟霞癖，終朝偃臥，與外界也無接觸。他來看我的時候，知道了我的困難，邀我隨時到他那裏去，為沐浴之需。當時他交给了我門上的鑰匙。我也認為地點與環境較為理想，以後每隔幾天，等午夜宵禁以後，路絕行人之際，乘車到他那裏，車停得遠遠的，連司機也不知我到那一家去。我一下車，車就開走，自以為十分安全可靠。

二十九年的中秋前，他約我中秋晚上到他那裏去聯床共話，同渡良宵。我嘴上雖然說到時再說，而心裏則的確已決定了去休息一晚。中秋的前一天，我去看羅君強，方才坐定，蘇州的長途電話來了。周佛海十人組織中的蔡洪田與張仲寰，正分任江蘇民政教育兩廳的廳長，那時的「省長」是高冠吾，而「省府」所在地的拙政園，頗擅亭台花木之勝，爲蘇州名勝之一。「省府」預定盛開筵席，賞月飛觴。洪田要我與君強同去盤桓，盡一日之歡。君強說有事不能離滬，我也說他不去我也不去，電話收綫了。我正將離去，不料接着又來了仲寰的電話，他說一切爲我們準備好了，不去太使他們掃興。君強勸我不如我一個人去一次，我反正無可無不可，電話中就這樣決定了。當天回到報社，料理了一些未了之事，第二天搭早車到了蘇州。因此我對巨籟達路朋友家的約，自然再無法分身。蘇州那晚的場面是够熱鬧的，名園賞月，裙屐翩跹，大家興緻很好。正在鬧酒的時候，忽然上海有長途電話來找我，一接聽是君強，他說：「有一些要緊事，希望我明天早車回滬，車站上派人接我，直接先到他家裏，千萬不要到別的地方去。雖然我感到有些驚奇，但電話中不便詳問，我就說：『好吧，我一定明天早車回來。』」

第二天，我如約回滬，一下車，他派了副官率領了二三十名警衛把我圍住了登車直駛愚園路，我覺得氣氛有些不尋常，問問君強的副官，他也莫名其妙。抵君強家時，他已等候着我。一開口就問我，是不是常到巨籟達路一家姓王的家裏去？我想不出他怎麼會知道的，隨身他取出一張草圖，那正是我那個朋友的住所，四周的形勢，房屋的方位，連我去睡的一間客房，都畫得清清楚楚。他告訴我：「昨天士羣四處找你找不到，問到我那裏，才知道你已去了蘇州。他告訴我：他潛伏在重慶特務機構中的反間諜人員，前天突然奉到了命令，當晚要去巨籟達路打一個人。他與其他三人持槍出發，要等

這人一下車，立刻襲擊。守候了半夜，卻始終沒有發現。他當時不知目標是誰，第二天（中秋）又奉令繼續再去，他拿到了地圖與照片，才知道是你（指我），因為時間充份，所以到七十六號去報告，要通知你那夜萬不能去。因此士羣急得四處找你。「我聽了這一夕話，一時目定口呆，到今天我還敢說我這個舊同學決不會出賣我，他的男僕連我的姓名也不知道，其他也別無可疑之處。重慶方面的特工，何以竟會知道得那樣詳盡？幸而我去了蘇州，才徼倖逃過了這一關。如果不是朋友的一再以電話相邀，此日恐怕我的屍骨早寒了。」

（二七）日軍閥徘徊於和戰之間

從汪氏由河內抵滬，一度赴日與平沼內閣及前首相近衛，及當時的軍部首腦板垣陸相晤談之下，使他知道日本軍部和興亞院的真正意旨，在使汪氏建立一個與「滿洲」相似的傀儡政權，假手以代行日本軍閥的侵略政策。汪氏無可諱言在政治上有慾望，在私人間有恩怨，但到底還不是甘心於把國家斷送的人。汪氏由日返滬以後，表面上盤馬彎弓，為籌建政權而積極活動，然內心則已感到極度痛苦。那時國際形勢還未改善，在抗戰艱苦階段中，國際通道連僅有的滇緬公路也被英國封鎖，他清楚明瞭國軍的實力，認為戰既不可，和又不能，實已陷於進退維谷之境。中間又加上高陶的叛離，內部人事的磨擦，所以他那時肝火也就特別旺盛，時常對左右大聲斥罵，尤其對褚民誼更不稍假辭色。而他希望能實現全面和平，以挽救國家於萬一，此時顯得更真誠更殷切了。

汪氏左右的兩大將，陳公博對政權的建立，自始即不感興趣，他之從汪，基於兩人之間的感情，以及以東方道義精神為基礎。除幹部會議中，有時發言外，一切實際責任，均落於周佛海一人之身。我目擊佛海自民國二十八年夏以迄二十九年春「還都」前的一段時期中的辛勞憂傷，且不時抱病，內心也與汪氏同樣痛苦。唯一可給周以安慰的，僅是汪氏對他的推心置腹，而周之對汪，也確有感恩知己之意。

許多無法解決的問題都放在面前，而且極綜錯複雜之至。首先是日本的態度，提出所謂「三原則」的近衛文磨，在汪氏由越赴滬以後，早已辭去了首相的職位，繼任的平沼、米內等內閣，對汪政權之建立，態度上很淡漠。日本軍部與外務當局的意見，也不一致。日本軍閥們雖然仍然以「膺懲暴支」為口號，議會政黨等也附和強硬政策，但又不能不承認侵略戰爭，雖然軍事上節節勝利，而佔領的地區愈廣，防守愈困難，兵力愈感不敷；也不能不承認這一場戰爭，成為泥足之勢。日本政府的態度是混亂的，但希望和平，則是一致的。日本軍閥一面從事戰爭，並且成立了職權龐大的興亞院，以後民間的政黨也合併成為「大政翼贊會」，推波助瀾，為虎添翼，充份表現出侵略的猙獰面目。但是一方面外相松岡洋右且親自到香港與重慶進行秘密和平談判。侵華大本營的一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也派了今井武夫在香港與自稱宋子良的談得興高采烈。與後來國共戰爭的談談打打，打打談談，前後有異曲同工之處。

汪氏的心理更是矛盾的、複雜的，他親自赴日接觸的結果，已認識了日本內部的混亂，也體味出日本軍人並無悔禍之心。而同時他仍在認為抗戰的繼續，軍事實力上難操勝算，徒然給共黨造成坐大的機會。他在二十八年七月九日，作了一次「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的廣播中，曾

經沉痛地暴露出他的心境。他說：

「（上略）十三年間，孫先生在廣州手定國民政府建國大綱，那時候對於中日關係，是照着上述方針進行的（按指孫先生所主張之大亞洲主義而言）。十四年間，孫先生逝世，我繼承遺志，主持國民政府，對於上述方針，不敢少變。十七年間，便不然了，濟南事件爲中日關係惡轉的起頭，中國此時只宜竭力忍耐，竭力解釋，使中日關係由惡轉而復歸於好轉。不幸當時國民政府計不出此，遂使中日關係由惡轉而更惡轉，由此一直至九一八事變發生。」

「我說這話，並非有意責難當時主持國民政府的人，我是一個國民黨員，是一個與國民政府有關係的人，對於這種錯誤，我當然應該分擔責任。不過我在當時是一個亡命者，是一個被國民政府通緝而飄流海外的人。及至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我回到南京，担任行政院院長，其後又兼外交部部長。我提倡「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來矯正當時「反對直接交涉」的論調，……但是我必須反對一種論調。這種論調，就是當時所謂主戰派，試問一個剛剛圖謀強盛的中國，來與已經強盛的日本爲敵，戰的結果會怎樣？這是不是以國家及民族爲兒戲嗎？」

「我當初以爲蔣介石先生與我同心的，我看了二十年十二月蔣辭國民政府主席職後一篇告誡國人的文字，認爲蔣與我同心，所以誠心誠意來與蔣合作。然而四年之間，我已漸漸的覺得不對了。及至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我於大病之後，又受了傷，身體上支持不住。二十五年一年之內，我遠適異國，直至西安事變發生，方才趕了回來，則情形更加大變了。我當時祇能認定勤共事業決不可中止，因爲共產黨是只知道有第三國際，不知有中國的。他受了第三國際的秘密命令，將階級鬥爭的招牌收起，將抗日招牌掛起，利用中國幾千年來的民族意識，挑動了中日戰爭，這種大當

斷斷乎上不得的，我當時的言論方針，注意此點。自從盧溝橋事變發生以後，我對於中日戰爭，固然無法阻止，然而沒有一刻不想着轉圜，對於共產黨的陰謀，也沒有一刻不想着抵制他、揭破他。直至最後最後，方纔於十二月十八日離開重慶，二十九日發表和平建議。」（下略）

這一篇廣播辭，上面僅摘錄其中的一小段，雖然汪氏旨在爲他自己的主和辯解，但字裏行間，洩露出他內心對於未來局面的看法。第一、他對抗戰結果的看法是悲觀的，他認定一個剛剛圖謀強盛的中國，不能與已經強盛的日本爲敵。雖然誰也無法逆料日本軍閥以後竟然敢與英美爲敵而掀起太平洋戰爭，自掘其墳墓；又誰也不會預知美國有驚人的原子彈發明，迫使日本軍閥投降。但他對戰局的看法，以後事實告訴我們，最後畢竟是錯誤了。最後的倖勝，這是天佑中國！第二、汪氏的離渝東下，發動和平，還是繼續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他希望重慶以軍事抵抗，而由他來出面交涉，外間盛傳的所謂蔣汪雙簧，兩人之間，事實上雖無默契，而一切表演，卻真像循這一條途徑而前進。周佛海時常很得意的說：中國於抗戰中將永遠立於不敗之地，抗戰如其失敗，有汪先生的和平政府在；和平如其失敗，有蔣先生的抗戰政府在。譬之賭大小，重慶押大，而南京押小，不管開出來的爲大爲小，總有一方面是押中的，而押中的也必然是中國。第三、汪的主張和平，對於共產黨的謀略倒是看得準極了。他是與共黨打過數度交道的人，也因此他能洞察共產黨的居心與手段，抗戰的不論爲勝爲敗，替共產黨造機會也是必然的。而他終於不幸而言中，抗戰真是給共產黨造成了機會。今天痛定思痛，也不能不認汪氏對共黨確有其見解。所以汪政權揭發的三大政綱爲「和平、反共、建國。」他認爲非和平即不能反共，非反共即無以建國。汪氏一行於二十八年夏季抵達上海以後，歷九個月的時間，一延再延，而不立即建立政權，雖然原因很多，所遲以有待、所努力不懈的最大的任務，還是期

待着全面和平的實現。

(二一八) 青島會談後三政權合流

汪政權遲遲不克建立的另一個原因，是如何處置淪陷區的兩個既成的政權。

當汪等去滬之時，變相的地方維持會，北方有「臨時政府」，南方有「維新政府」，早就建立。在汪氏等心目中，本打算新政權一旦實現，此等政權中人，自應悉予摒棄，而一般參加「和運」的人士，尤不甘於同流合污。但是南北兩政權各有其有力的背景，有著名特務土肥原及華北日本軍部等爲之撐腰，非但無排除之望，而且強迫着汪政權與之合流。中間經汪周等的奔走交涉，終無法達成這一個起碼願望。淪陷區政權合併問題之解決，且爲汪政權能否樹立之先聲。而汪等抵滬後居住的愚園路一帶，且還在「維新政府」的勢力範圍以內。當汪氏召開的所謂「第六次代表大會」以後，爲應付當前環境，汪氏終於在民國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不得不對臨時維持兩政權及其首腦人物王克敏梁鴻志發表聲明，爲應付之謀。聲明係由周佛海與梅思平主稿，最後經汪氏改定，文字上雖寫得冠冕堂皇，而辭氣之間，頗多微辭，明眼人不難一望而知。當時周梅等主稿之際，頗有躊躇難以下筆之苦，特將原文照錄如下：

「自蘆溝橋事變以來，國民政府因軍事失敗，失敗後放棄北平南京等處，政綱解組，民無所依。王叔魯（克敏）、梁衆異（鴻志）諸先生等挺身亂離之際，相繼組成政權，以與日本爲和平

之周旋，使人民於流離顛沛之餘，得所喘息。苦心孤詣，世所共見。當時國民政府因主張繼續抗戰，對此舉動，自不免認爲抵觸。惟時至今日，和平運動，已爲刻不容緩之圖。最近中國國民黨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以『和平反共建國』昭示國人，並鄭重聲明：『本黨願以至誠聯合全國有志之士，不分派別，共同担负收拾時局之責任。』本黨爲完成此重大使命計，對於既成政權，消除成見，更謀羣策羣力，共濟艱難，實爲事理所當然。而既成政權，如王叔魯先生等，從前會服官國民政府，投艱遺大，休戚相關。如梁衆異先生等，從前雖處於超然在野地位，然以段芝泉先生對於中華民國之勳勞，及對於國民政府之愛護，知必能繼其遺志，使國家民族得以轉危爲安。兆銘承大會授權『延請國內賢智之士，參加中央政治委員會』，旬日以來，迭與王梁諸先生披瀝誠意，對於收拾時局具體辦法，已得切實之了解與熱烈贊同，深信從此必能相與致力於和平之實現，憲政之實施，此所引爲欣慰者也。（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這聲明一發表，事實上三政權之合流，已成事實，所欠缺的僅是形式上的手續。

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一日，汪氏率領了周佛海、梅思平、褚民誼、林柏生、岑德廣、羅君強等由滬搭奉天丸赴青島，與「臨時」「維新」兩政權舉行會議。一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時開第一次談話會，汪方出席的除汪精衛本人外，有周佛海、褚民誼、梅思平、林柏生、劉郁芬。「臨時政府」方面有王克敏、齊燮元、王揖唐（朱深因事臨時返回北平）。「維新政府」方面有梁鴻志、溫宗堯、陳羣、任援道。日方有影佐禎昭、犬養健、谷壽夫、清水董三等。蒙古方面雖不參加會議，但德王也派李守信趕來會晤。翌日，第二次會談，決定了「中央政治會議」、「中央政治委員會」、「中央政府機構」、「華北政務委員會條例」，及「中政會」開會地點及日期，預定二月中旬在上海開「中政會」。三

月中旬建立新政權。一切本屬形式，會議至是日中午即匆匆散會，「維新政府」雖決定歸併於汪政府，而「臨時政府」則仍然維持戰前華北政務委員會的形式，依舊是華北特殊化與獨立化。殷汝耕的「冀東政府」以外，日本人的蓄心把中國弄成四分五裂，於此又得一明證。

(二九) 吳佩孚汪精衛魚雁不絕

七七事變以後，華中、華北，先後淪陷，「臨時」「維新」兩政權相繼出現。自汪政權建立，「維新」取消，「臨時」則沿戰前華北特殊化的往例，成立了「華北政務委員會」，王克敏、王揖唐先後任首長。雖與汪政權分庭抗禮，直接受命於華北之日軍，但在形式上不能不謂為汪政權治下之地方政權。本書既以追述汪政權之經過，關於華北部份，論理不應獨付缺如。而我雖於三十年會以他事道出北平，且曾與王揖唐一度晤談，但對華北政權起迄的經過，道途遙遠，幾乎一無所知。在開始寫作本書中，且曾不斷訪問留居此間當日曾參加華北政權的朋好，而規後餘生，胥已不能有系統地為我述其梗概。關於華北部份的材料，祇有俟筆債稍暇，俟他日再為訪述。

當華北華中淪陷之初，日軍閥亟亟於扶掖地方政權。華北屬意於吳佩孚，而華中則寄望於唐紹儀。風聲稍露，唐即為渝方特工，用利斧斃之於寓所。吳佩孚寄居北平什景花園，土肥原等日軍渠魁，朝夕出入於其門，一度會盛傳有立即登場之說。吳且曾由日軍陪同公開招待記者，表示親善，更使人相信其漸趨於成熟階段。而吳之終未入彀，傳者謂其倔強性成，與日軍所商之條件不洽，至成僵局，

其言是否可信，未敢懸揣。但吳於是時，與日方交往甚密，不問其爲作虛與委蛇之謀，或竟有久蓄思動之意，而吳之並未向日方斷然拒絕，則爲無可置疑之事實。

汪精衛於二十七年冬，離渝赴越，即電致吳氏，聲述和平主張，即得覆電，表示贊同。旋汪去滬，一面繼續求全面和平之實現，一面着手爲建立政權之籌備。乃專派趙叔雍專程赴平，携其親筆函交換意見。我在撰寫本書時，與叔雍幾朝夕相見，不時間談當年舊事，而從未及此一段經過。迨本港「聯合評論」刊載耘農先生「汲古書屋談薈」中發表汪吳於二十八年五月至十月中汪政權建立前往來函牘三通。始再詢之叔雍，謂確有其事。叔雍告我，當年啣命赴平，謁吳於什景花園，室內仍有八大處之存在，威儀無減，室中且懸有呂純陽降壇詩屏軸。吳出與叔雍寒暄並互道思念仰慕之忱後，概括吳之意見，和平固與汪氏不謀而合，合作亦有其可能，但宜由汪氏主黨，而由其主軍，殊不甘偏促於一隅云云。叔雍面呈書函後，即南返覆命。在吳氏覆汪氏函中，亦表示對和戰之局，謂史無久戰之理，宜矜恤同胞，戛然而止。對汪氏個人，自謂彼此有鍼芥之合，鶴鳴九皋，我道不孤之語，蓋未可全以客套視之也。三函誠爲歷史上珍貴之文獻，特爲轉而補錄於後，以實我書。

汪精衛致吳佩孚書

「子玉先生助鑑：去歲冬間，曾致電左右，略陳悃悃，惟辭意未盡，而耿耿之誠，幸蒙鑒察。旋奉覆電，意味深長，循讀之餘，彌深嚮慕。中日兩國爲敵則兩敗俱傷，爲友則共同發達，其理自明。不幸數十年糾紛膠結，鬱結至於今日，遂敗壞決裂一至於此。欲謀收拾，且引之入於正軌，其事誠難，然又不可以已，且捨此實無他道也。國民黨人當此厄運，撫躬自責，不敢有一息之安，而旋乾轉坤

，則非海內仁人志士之心力以共謀之，不能有濟。我公功在民國，蒿目顛危，誠知心惻然有動於中也。銘自去臘之末，發表豔電，棲遲河內，未嘗別有謀劃。蓋以此身曾參與重慶政府，雖諫不從，言不聽，而去國之際，深維孟子三宿而後出晝之義，不憚再三呼籲，以期重慶當局之最後覺悟。今此望已絕，不得不易地奔走，期與海內豪俊，共謀挽救。現在國難日深，而國際危難，又日趨緊迫，非恢復和平，無以內除共禍，外應世界大勢；非組織統一有力自由獨立之政府，無以奠定和平。公老成謀國，如有所示，極願承教。銘一得之愚，亦當作蕪蕪之獻。但求有益於國，任何艱險，皆所不計。區區之懷，特託趙叔雍先生趨前面承，尙祈鑒察，是所厚幸！專此，敬請助安！汪兆銘謹啓。」

「再者抵此間後，始聞公於二月間曾有賜電，道途阻隔，至今未獲拜誦，至深歉仄，謹此陳謝，並乞鑒原爲荷！兆銘又及。」

吳佩孚覆汪精衛書

「精衛先生執事：叔雍先生至，拜展手書，讀竟愴感不置。中日輔車相依，爲友爲敵，利害本自昭然。兩國當枋皆一時賢雋，智慮周遠，詎謂見不及此？徒因乘隙抵禦，積漸已久。吾國自甲午櫛師，庚子喋血，迄於九一八事變，隱忍依違，專以不滋生事端爲無上自全之策，敷衍因循，正如癰瘍附身，終歸一潰。而又內外情勢複雜，因風縱火，更有促使熾燃者。平情而論，國民黨不過適逢其會，儻亦國運有以致之，不必盡在人也。公怵惕危亡於喧扈抗戰之中，逕議寢兵，翰音登天，宙合皆曉，復眷眷於風雨同舟之誼，瘖口曉音，翼反衆迷，終且險患親嘗，高振六關，嚶求海內仁人志士，共計匡維。爲國忠貞，至堪敬佩！並承謙衷見訪，履綦遠勞，翹企風猷，彌增感奮。竊謂中華民國四萬萬

民衆，實爲主體。民意趨歸，果以抗戰爲然，則任何犧牲，均可弗計。若民衆厭戰，相戰之國復有感於窮兵黷武之非，卽宜矜恤同胞，戛然而止。有史以來，從無久戰不和之理。以德皇威廉第二之睥睨一時，鑒於大勢傾頹，至不惜敝屣尊榮，爲民請命。誠知民爲邦本，和與戰同一爲民，則應戰應和，自不能不以民意之向背爲準繩也。弟分屬軍人，昔亦誤以武力爲萬能，經體察國情，默觀世界大勢，乃於太公所謂全勝不鬥，大兵無創，微通鬼神者，一以政治之原理，權衡其際，益憬然經國之略，初不盡恃藉於疆場之決勝也。故自蘆溝橋變起，兀坐故都，本所信念，日以啓導和平爲事；和平要領，則以保全國土恢復主權爲唯一之主張。區區此志，竊幸與公尙有鍼芥之合，九臯鶴鳴，敢云吾道不孤矣！尊論謂非組織統一有力自由獨立之政府，無以奠立和平，確爲扼要之言，與鄙見亦正相符。蓋不如是，不但無以奠立和平，且無以見諒國人，並無以改國際之觀聽，願共本斯義，力圖邁進。友邦誠能具充分理解，悉予贊同，中日真正之親善，固可依次以舉，而彼所揭櫫於世界之聖戰意義，並可卽爲事實之證明。近德意於西班牙撤兵，復歸其政權於弗朗哥，歐洲疑雲，因之頓消，此誠友邦之極則，尤望公切爲正告也。弟委質國家，誓與國家同其命運，苟能山河無恙，自計已足，幸叨不棄，更當進附賢者，竭畢衷忱。如能教益頻施，資爲鍼圭，更所欣盼而不容自己也。修牋奉答，未罄萬一，統希惠照，維爲國珍重千萬！敬頌勳祺！吳佩孚拜啓。」

汪精衛再致吳佩孚書

「子玉先生助鑒（陳）中孚兄來，獲誦九月二日大教，敬承一切，並稔福履綏和爲頌！竊念銘之與公，爲國爲民，心事相同，而立場不無稍異。數月以來，雖屢通函札，而胸懷容有未敢盡吐者。願

國難日深，事勢日急，茹而不言，將來必有失人之悔。素仰公忠鯁正直，能受盡言，故終以一吐爲快。十五六年間，公嘗與國民革命軍爲旗鼓之周旋，勝負兵家之常，而公對國民政府始終抗節，天下共見。今者一旦以參加國民政府之說造於公前，誠有冒昧之嫌，此銘前此格格不吐之所由也。繼而念及國民政府統一中國，於今已十餘年矣！蘆溝橋事變以來，軍事挫敗，和平運動，隨之以起，不惟國民黨人力持恢復國民政府，以收拾時局；卽國民黨以外之人，平日不滿於國民黨，不滿於國民政府，不滿於青天白日旗者，至今日而擁護之熱，不下於國民黨人，其故何哉？蓋對內爲一事，對外又爲一事。甲午戰敗，乙未議和，未聞易政府換龍旗也。庚子戰敗，辛丑議和，亦未聞易政府換龍旗也。上次歐戰，德國戰敗議和，亦僅威廉二世退位而止，易帝制爲共和，待德人民之自決，而國旗之換，則遠在國社黨得政之後。蓋對外戰敗之結果，至於易政府、換國旗，則內政干涉，國將不國，不可不懼也。爲今之計，國民政府急須恢復，以當收拾時局之大任。林主席地位，在法律明文規定「不負責實際責任」，故軍事當局宜引咎辭職，行政機關宜改組，而主席地位不宜更易，以省糾紛，而利進行。至於國民政府之職權及名稱，以及種種制度，如有更改之必要，於國民大會中議定之。如此則對內對外不相混淆，國權民意兩得顧全矣！由是言之，今日國民黨人主張恢復國民政府，其爲國民政府謀，忠也；非國民黨人亦主張恢復國民政府，其爲國民政府謀，俠也；一忠一俠，其立場雖異，而爲國爲民之心事則同。銘竊願公以一忠字對民國，以一俠字對國民政府，則公之風節必照映宇宙，而旋乾轉坤之功業，亦必成於公手。銘之與公，並未謀面接杯酒之歡，而於公之人格，夙所傾仰，故敢以率直之辭，買其誠悃，惟垂察之，幸甚幸甚！專此，敬請助安，尙祈鑒照不宣！汪兆銘謹啓。」

「再啓者：昨晤陶星餘先生，暢談一切，因託帶此函，藉塵清聽，尙祈亮答爲荷！兆銘又啓。」

(三十) 爲民族英雄乎爲漢奸乎

假如汪精衛等一批人，真是僅僅爲了一己的利祿，則汪政權之建立，儘可以隨時袍笏登場，大可不必一延再延。其所以遲以有待者，除了上文所述期望全面和平，與解決淪陷區的既成政權以外，與日本之間的交涉，發生了重重困難，在若干基本問題上，雙方的意見，竟至南轅北轍，有着很大的距離。

汪氏等由越南東下抵滬以前，初以爲日本既陷於泥足，應該認識了中華民族的決不可以武力屈服，日本的軍閥們也可能有了悔禍之心，在近衛三原則下，既聲明撤兵與不要求賠償，而雙方對於反共的立場又復一致，大原則確立了，其他的枝節問題，不難迎刃而解。但一經實際上接觸，誰知竟大謬不然。在這一時期，汪氏等心境是沉重的、沮喪的、與焦慮的。他們想到：假如抗戰不能勝利，而和平又無成就，不但國家將陷於萬劫不復，連自己也將成爲民族的千古罪人。在周佛海日記中，一再表示了這一點，如二十九年五月十三日，他在漢口的日本陸海外聯合招宴中演說：「重慶各人自命爲民族英雄，而目余等爲漢奸，余等則亦自以爲民族英雄。蓋是否民族英雄，純視能否救國爲定。余等確信惟和平足以救國，故敢以民族英雄自命。但究竟以民族英雄而終，抑以漢奸而終，實繫於能否救國。如余以民族英雄而終，則中日之永久和平可定；如以漢奸而終，則中日糾紛永不能解決。」又九月二日在北平日本華北最高司令官多田席上演說有云：「一部份中國人欲殺余，一部份日本人亦欲

殺余，均有證據，此正余之立場。中國人欲殺余，證明余非抗日主義者；日本人欲殺余，證明余非漢奸。使兩國能互信互尊互惠，乃爲余之理想」云云。汪周等一批人的心理，確是矛盾的、惶惑的，他們想不惜蒙一時之惡名，救國家於將墮，成爲民族英雄；但環顧現狀，瞻望將來，有以漢奸而卒之可能。我清楚記得民國二十九年的農曆正月初八日，我去看佛海，剛巧那天什麼賓客也沒有，他獨坐在書室中正在呆呆地出神，他見到我就說：「你來得正好，我們隨便談談吧！」我說：「我正是專誠來和你談一件事的，我決意不幹了！」他一愕，接着說：「有什麼不如意的事，使你消極？」我說：「幾個月來，事實證明了日本人的蠻橫狡猾，決無悔禍之心；幾個月來的事實，也證明了許多和運同志利慾薰心，甘爲虎俛，我不敢說自惜羽毛，但我不甘同歸於盡。」佛海是一個極富情感的人，而我又是一個情感極易衝動的人，他聽到我提出了那樣率直得近乎譏諷與謾罵的話，他拉住了我的手，眼中流下兩行清淚，嗚咽着說：「正因爲如此，彼此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又那樣少，死，也讓我們死在一起。」我料不到他的答覆是那樣地沉痛，那樣地毫無諱飾，「士爲知己者死」的一句成語襲上我的心頭，我見他那樣地悲苦與激動，我放棄了我去看他的本意，不忍再過份的刺傷他。我與他緊緊地握着手，我也覺得喉頭有些哽咽，淒然地點了點頭，於相對無言中結束了那次的談話。我在本書的第一節中，開宗明義就說：汪政權的建立，是我自己的悲劇，朋友們的悲劇，也是時代的悲劇，而最後，這一幕悲劇，也終於成爲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悲劇。但，這豈是汪周等之始願；又豈是汪周等之始料所及？

汪氏想針對日本人軍事上泥足的心理，在日本佔領區的槍刺之下，建立政權，而存着近乎幻想的奢望。與日本之間，所謂調整兩國邦交，本希望確立平等互惠原則。在政權方面，規復戰前國民政府

的舊制，即國民黨、三民主義、國民政府、五權政制，以及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所以這政權的建立，不曰創建，而曰「還都」。但是他想得過於天真，日軍於屢勝之餘，充滿驕滿之氣，一心將以關內佔領之區，盡成「滿洲帝國」之續，以實現其大陸一元夢。如日人真肯對中國平等互惠，將正如蔣先生因陶德曼調停而說的話一樣，「如此，日本人爲什麼要打呢？」

前文已經說過，汪氏等抵滬以後，發表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携三原則的首相近衛已經下台。繼任的平沼與米內內閣，對汪政權之建立，既並不熱心，而軍人一方面希望汪政權成爲「滿洲國」第二的傀儡政權，同時又深恐汪政權一旦建成，破壞了與重慶的和談機會。所以在討論調整兩國邦交的實質問題時，堅不讓步。甚至對於一手製造的政權形式上承認問題，也三反四覆，一變再變，汪方提出新政權既爲原有法統的延續，日本不必再發表承認宣言，祇須派大使呈遞國書已足。而日方的加藤公使，則謂可派特派大使，不派全權大使，也不呈遞國書。而周佛海以爲若如此，則寧可不組織。既而汪方決定於政權創立之際，發表宣言，而影佐的意思，汪方發表宣言，日方不便阻止，但日本不發表宣言響應，既不表示同意，亦不否認。最後於二月十五日由影佐、清水、峯場，直接謁汪，決定汪日雙方同時發表宣言，但不發表條件，惟保證條件不出近衛聲明以外。但至月底，日方忽又變卦，仍主張擬派大使而不遞國書，直至汪政權建立前的半月，汪方讓步，日本先派特派大使，以爲事實上之承認，再派全權駐在大使，以爲法理上之承認。總之日方認爲汪方諸人，並不能一味俯首聽命，對政權之建立，並不放心，因此處處表示無扶植其成立之誠意，枝節橫生，花樣百出。日本有自悔於一時鹵莽中選錯了對象之意，而汪方亦有貿然從事至進退維谷之心。原定最遲三月二十日「還都」的，先延至二十六日，又延至三十日，始克實現。而其間爭執最烈的則爲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這一個軒

然大波。

(三一) 非驢非馬的青天白日旗

從國軍自京滬撤退，日方亟亟於傀儡政權之製造，形式上雖不同於「一二八」時期以漢奸胡立夫爲首的所謂「閩北地方維持會」，而代之以莫名其妙的叫做什麼上海市「大道市政府」。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鞏，在南方想慫恿唐紹儀，在北方脅誘吳佩孚，但對吳佩孚既功敗垂成，唐紹儀又被刺殞命，於是北方以王克敏爲首成立了「臨時政府」，南方以梁鴻志爲首成立了「維新政府」，雙方雖互不統屬，但旗幟則是相同的，除了上海兩租界以外，所有華北華中的淪陷地區，已被迫懸掛了北洋政府時代的五色旗。居民藏有青天白日旗的，日本即認爲有抗日嫌疑，可以立召鉅禍。

汪精衛之一生，儘管有許多可以批評之處，但他對於中山先生的崇敬，在任何環境下，不易其志。他以為青天白日旗是中山先生所手定的國旗，在他所領導下的政權，也一定必須以青天白日旗爲國旗。所以當他於二十八年夏由越南的河內抵滬，不久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抗戰後第一次在淪陷地區升起的國旗，就是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本港創藝社出版的「周佛海日記」附加的註解中，指爲周佛海、梅思平曾經想以青天白日旗和五色旗混合起來，改爲另一个新的旗幟，誠不知其何所據而云然？

汪周等對於懸掛青天白日旗是堅決的，而日本方面反對新政權懸掛青天白日旗，也同樣是堅決的

己的後方所懸掛的，正與前方攻擊的目標相同。如此敵我不分，勢將影響軍心。汪方以既然是繼承從前的法統，國旗決不能更易。在上海與影佐、佐藤等交涉，始終不獲結果。周佛海在青島會談之後，親自赴日，與日本軍部以去就爭，始獲得了非驢非馬的折衷辦法。據他由日返國後告訴我此事談商的經過；周佛海雖是留日帝大經濟系畢業生，能够講一口流利的日語，但他與日本正式談判，向來用國語，再由舌人譯爲日語，那一次赴日，他的繙譯是彭盛木（曾任上海同文書院教授，且娶一日女爲妻，與佛海素無淵源。佛海抵滬後，始由上海洪幫領袖徐朗西所介紹錄用，後來知道他是軍統派往汪方的潛伏份子，於民國三十二年間病死。以後周即改以黃遠爲繙譯），那次他與日本陸相會晤（我已不能真切記憶那時是東條英機還是荒木貞夫），主要談的就是國旗問題，當兩人爭執得最激昂的時候，佛海等不及舌人的繙譯，逕以日語相辯駁，兩人搞得面紅耳赤，佛海曾至表示如國旗問題不獲解決，則汪方即全部解散，將不問後果如何。更說明意大利方面態度，如國旗變更，意國將不予承認。經過幾度的交涉，日方提出了在原有青天白日旗上，加縫一條黃色的橫布，佛海更以爲國旗的形式，不容有絲毫改變，而日本軍部則以爲爲了避免作戰時的誤認目標起見，必須在形式上有明顯的分別，最後提出了暫時於青天白日旗之上，另加黃色三角形飄帶，上書汪政權的政綱「和平、反共、建國」，也不與國旗縫在一起，等情勢稍有改變，便於隨時取消，再回復原來的形態。但佛海仍然要求汪政權政府前所懸掛的旗幟，三角飄帶不在青天白日旗之上，而另以兩小竹竿交叉此三角飄帶，地位則置於青天白日旗之下，以示附加的飄帶，並不是固定的形式，這問題纔算獲得一解決。但至最後汪政權建立之日，這非驢非馬的旗幟在街頭出現，中國人固覺得痛心疾首，而日本軍人則認爲作戰三年，死傷纍纍，而打來打去，青天白日旗，依然飄揚招展。當汪政權建立之日，京滬兩地，日本軍人險至發生暴

動，如不是日駐軍盡力彈壓，可能釀成大禍。

汪政權的一延再延，已使汪政權的從龍羣臣，發生疑慮，連周佛海也無法確指新政權的能否實現。周佛海所提出的一旦新政權建立，最低限度，日本的派遣軍總部，即應遷出南京以外，而連這一條件，也終爲日方所拒。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的晚上，我往佛海家中小坐，約十時左右，佛海醉醺醺地由外歸來，神情方面顯得有些激動，他劈頭第一句話就說：「政府還都的日期確定了，是本月三十日，汪先生定十七日飛京，我也已定十八日啓程，二十日舉行中央政治會議，三十日政府成立。」說完了，莫名其妙地又搖搖頭。我說：「那麼與日方的交涉，一切已獲得圓滿解決？」佛海作了一個苦笑，他說：「我們與日本合作，好像男女在談戀愛，我們東來一到他勢力範圍的上海，就好像女人已跟隨男人進入了旅舍的臥室，男人正在其欲逐逐不能自制的時候……」他說到這裏，伸出右手，把中指翹然一舉，以表示所說「其欲逐逐」的含義。頓了一頓，他又繼續說：「這時女人應該把握時機，提出愛情保證品的時候，而我們竟含羞帶愧，半就半推地自動的寬衣解帶了。羅襦旣解，樊籬盡撤，這還有什麼可說！」在滿室女客們吃吃笑聲中，他黯然地踱進了自己的臥室，我也悄悄地離開了那裏。

這一幕歷史的悲劇，終於無可避免了！

(三二) 同舟胡越淒其一紙名單

從汪氏於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十二月十八日離開重慶，經過了一年三個月的時間，一面積極籌

備建立政權，一面向日本作種種交涉，同時又期待於全面和平之實現，終於在不利情勢之下，在南京草草登場。日期是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零年）的三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日，剛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爲國捐軀的下一日；也是世人所熟知的萬愚節的前兩天，這意味着是一個歷史上不幸事件的延續呢？還是受人愚弄的先聲？是巧合？還是故意？總之，這一天，卻決不像是一個黃道吉日！

在此之前，汪氏率領了陳公博周佛海等一行，於三月十九日往紫金山謁陵，先向中山先生祭告，作爲政權建立的序幕。那天正好漫天風雨，景色淒苦。汪氏步入靈堂，舉頭向中山先生的石像一望，禁不住兩行熱淚，簌簌直流。等到領導恭讀遺囑時，全場變成一片嗚咽之聲，這前奏曲，竟是淒涼的哀樂，是不祥的預兆！汪氏即使真是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而想對國家有所貢獻，從此也將莫挽其精衛填海之恨了！

謁靈的第二天，真正的「還都」前奏曲——中央政治會議在南京中山路的國際聯歡社舉行了，出席的人員，汪方與「維新政府」大致與青島會議時相同，又加上了所謂「社會上負有重望之人士」，北方的臨時政府出席的有王揖唐、齊燮元、殷同等人。會議自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三天畢事，這本來是一個形式，一切早於事前商定。因此議程中的政綱、政府組織、「還都」日期等，都順利通過，而此會最主要的一項，則是各院部會的人選問題。茲就記憶所及，列表如下：

汪政權登場人物表

主席

林森

代理主席

汪兆銘

文官長

徐蘇中

參軍長

唐 蟒

行政院院長

汪兆銘（兼）

副院長

褚民誼（後由周佛海繼）

秘書長

陳春圃

參事廳廳長

陳君慧

法制局局長

陳允文

印鑄局局長

李釋戡

立法院院長

陳公博

考試院院長

王揖唐

副院長

江亢虎

監察院院長

梁鴻志

副院長

顧忠深

審計部部長

夏奇峯

司法院院長

副院長

行政院內政部部长

次長

次長

外交部部長

次長

次長

財政部部长

次長

次長

軍政部部长

次長

次長

海軍部部长

次長

次長

教育部部長

溫宗堯

朱履齋

陳羣

李文濱

張秉輝

褚民誼(兼)

徐良

周隆岸

周佛海(兼)

陳之碩

嚴家熾

鮑文樾

陳維遠

×××

汪兆銘(兼)

凌霄

姜西園

趙正平

次長

次長

工商部部长

次長

次長

宣傳部部长

次長

次長

鐵道部部长

次長

次長

交通部部長

次長

次長

司法行政部部长

次長

次長

社會部部长

樊仲雲

戴英夫

梅思平

蔡培

湯澄波

林栢生

湯良禮

孔憲鏗

傅式說

趙叔雍

周化人

諸青來

李祖虞

朱樸

李聖五

汪翰章

薛典會

丁默邨

次長

次長

農礦部部長

次長

次長

警政部部长

次長

次長

水利委員會委員長

賑務委員會委員長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邊疆委員會委員長

衛生署署長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副委員長

副委員長

委員兼辦公廳主任

委員兼第一廳廳長

顧繼武

彭年

趙毓崧

汪曼雲

何庭流

周佛海(兼)

李士羣

鄧祖禹

楊壽眉

岑德廣

陳濟成

羅君強

陸潤之

汪兆銘(兼)

陳公博(兼)

周佛海(兼)

楊揆一

臧卓(原任陳欽若病故)

委員兼第二廳廳長

鄒敬芳

委員兼第三廳廳長

何炳賢

軍事參議院院長

任援道（兼）

參謀總長

楊揆一（兼）

軍訓部部長

蕭叔宣

次長

臧卓（兼）

次長

鄭大章

政治部部長

陳公博（兼）

航空署長

陳昌祖

開封綏靖主任

劉郁芬

武漢綏靖主任

葉蓬

上海警備司令

陳公博（兼）

以上所列的組織系統以及部次長人選，事隔二十年，記憶不真，頗有模糊彷彿之處，雖然我在初步列表以後，問過許多當年舊侶，其中獲得了不少補充與更正，但我仍然相信還會有錯誤與遺漏的。尤其次長之為政務抑為常務，更屬無從確記。

汪政權各院部長人選，事前的支配，煞費躊躇，理想中的人，有些不願參加，有些是負氣拒絕，而此攘彼爭，你搶我奪者，則實繁有徒。汪氏倒不失為一個有丰度的領袖，一切的安排，一以委之周佛海，等佛海把整個名單請他核定時，幾乎全無更動。佛海曾以汪政權之由其一手組成，引為自豪自

喜，而對汪氏也愈增其感恩知己之心。但在擬議的當時，使佛海常陷於幾面不討好的狼狽之境，他想使汪政權的名單，搜羅一些像樣子、有肝胆而真能做事的人；但力爭的與自薦的又決不是他所理想中的人物。汪氏離渝以後，他追蹤而往，是孑然一身。以後跟着而來，與他私人關係較深的，也祇有一個舊部羅君強，一個內弟楊惺華。羅君強桀驁不馴，常爲周賈怨。他一開始即與陶希聖磨擦，即其一例。而楊惺華又年事太輕（那時還不到三十歲），不堪重用，祇能爲他做一些私人事務工作。梅思平雖然與他私誼甚好，但在滬九個月中，處處已顯出有獨樹一幟的企圖。陶希聖本與佛海私誼甚篤，中途叛離。那時使他很懷念到留渝的一班舊友，他常向我說：假如陳布雷、許孝炎、陳方等可以互寄心腹的朋友能來共同合作，則「和平運動」可能多一些成就，而汪政權或能真會有些表現，即在他私人方面，更可以得到許多助力。他於以後六年中，對此會不斷努力，而他的殷望之終於成爲泡影，那祇是勝利來得太快了！

（三三）千迴百轉中的人事安排

對於上述的登場人物名單，這裏不能不有所補充說明。首先，重慶的國民政府主席是林森，爲什麼汪政權也片面的逕以林氏爲主席。中間有着兩個原因：表面上汪政權的建立，號稱還都，而不是另起爐灶，所以名稱、政制、主義、國旗、首都，均要一仍其舊，爲對外裝點門面計，連主席也依然不加更動。而內在的苦衷，則汪政權建立以後，仍希望全面和平的能夠實現，重慶與南京合併，則元首

問題虛席以待，不至成爲未來的障礙。汪氏本身，亦欲表示其並無欲爲領袖的慾望。故主席問題確定以後，且會由汪氏出面，去電重慶，向林氏促駕，結果當然如石沉大海，毫無反應。

其次的問題，就是「維新政府」的人事安排，汪政權中人的希望，即使不能完全把他們排除，也想減至最少數，但「維新政府」自有日人撐腰，形格勢禁，於是把無足輕重的監察、司法兩院位置「維新」的巨頭，劃清界限，等於各立門戶。在行政院各部長中，祇陳羣一人任內政部長，陳老八（陳字人鶴，行八）外表似乎吊兒郎當的一副玩世不恭樣子，其實工心計、有手腕，與佛海等也敷衍得很好，汪政權中人也深怕他向日人面前搗鬼，破例任爲「內長」，正所以示羈縻也。任援道則以握有華中軍隊的實力，得爲軍事參議院長，以後又調任爲海軍部長，資歷而外，善於應付，雅擅辭令，尤爲其特長。其他次長中，除內政部由陳羣推薦，自然爲「維新」舊人外，其餘鄧祖禹以與周佛海李士羣的人事關係而得任警政部次長；孔憲鏗原爲「維新」宣傳局長，以日人堅持而爲宣傳部次長。但如此安排，已屬煞費苦心。另一維新舊人而在「行政院下」爲首長者，則爲楊壽眉（卽楊翰西）。

五「院」之中，記得「立法院」最初不設「副院長」，（其後繆斌南下歸汪，曾任此職。）王揖唐爲「臨時政府」要角，給他一個「考試院院長」位置，表示華北政權，同樣隸屬於汪政權之下，但王揖唐始終並未到任，「副院長」江亢虎後由代理而至真除。

另有一點值得一提的，行政院各部長中，除汪方人員外（包括汪之嫡系與所謂CC在內），趙正平傅式說兩人爲無黨無派人士。而國社與青年兩黨，居然也大唱雙簧，玩兩面手法，初國社黨由諸青來、陸鼎揆兩人爲代表；青年黨以張英華、趙毓崧兩人爲代表，且謂均得各該黨之承認而以黨代表身份參加。青年黨首領會琦，且會親往南京，爲汪氏私邸之上客。兩黨中伍憲子、毛以亨等人，均曾赴寧

觀看風色。在汪政權建立之前，兩黨且各發宣言，表示擁護。佛海初擬以司法行政部長一席與國社黨之陸鼎揆，會陸病卒（曾一度擬請羅家衡出任，羅又不就），乃改以諸青來出任交通部長，交通部長一席原已答應給青年黨之趙毓崧，轉給諸青來後，得趙之同意，以農礦部長一席相酬，汪政權之建立，除國民黨外，於是乃包括：「臨時」、「維新」、「國社黨」、「青年黨」以及無黨無派之人士，可謂形式，魚龍混雜。

參加汪氏「和平運動」諸人，皆認汪政權中，以財政、實業兩部為肥缺。汪等抵滬以後，即面允以「財政部長」屬之周佛海，以佛海當時之權勢，自無人敢與之爭衡，因此亦無人敢加以覬覦。「實業部長」則為第二優缺，雖早已內定為梅思平，但陶希聖曾以薄「教育部長」而不為，明言欲為「實業部長」，汪又不許，乃成為其出走原因之一。又一人則為潘××，亦以任「實業部長」為參加汪政權之條件。而汪氏既以梅思平為最先參加之一人，周又力為之支援，乃終得不為他人所搶走。但在政權建立的前夕，終以人事支配關係，將「實業部」分為「工商」、「農礦」兩部，而交通部亦分成「交通」、「鐵道」兩部，以鑿足一般人的飛昇之願。

又一趣聞是「海軍部長」一席，汪氏本已決定為褚民誼。而陳公博周佛海兩人，以褚過去唱大花面，打太極拳，拉馬車，踢毬子，放風箏，以大官而有此行徑，已顯得滑稽，如再由他出任「海軍部長」，更將為世人所騰笑，陳周向汪再三力爭，始改任為「外交部長」。但那時外交對像，也僅日本一國，事實上一切對日交涉，均由周佛海負其實際責任，褚不過簽劃諾而已。

從「七十六號」開始，以迄汪政權的顛覆，丁默邨與李士羣兩人之間，久成水火，尤其在「還都」以前，互向佛海面前攻訐，對於警政部長一席，都志在必得，使佛海朝夕調處其間，難作左右袒，

佛海本已內定以丁默邨爲「警政部長」，而以士羣爲政務次長，士羣堅拒。最後特設社會部予默邨，佛海則自兼「警政」，而由士羣以「政次」攬其實權，其事始寢。佛海在「還都」前認爲內部有兩件事使他傷透腦筋，其日記有云：「前有高陶之出走；後有李丁之爭執。面子丟盡，氣亦受够！」會致其無限憤慨之意，也可以說明當時丁李傾軋情形之激烈。

當時從龍諸人，在新政權中，都唯恐官階不大，但有一個冷衙門是例外，就是「行政院」的「邊疆委員會」。汪政權中人，就有過一句笑話，說汪政權的邊疆，卽爲南京的城門，蓋諷其號令不出城外也。雖然話是說得過份了一些，但是也大足以反映當時日軍的專橫情形。所以當「邊疆委員會」委員長決定人選時，先定「上海市黨部主任委員」蔡洪田，而蔡不屑就；再屬意於汪曼雲，而汪又寧願爲其他一部的次長，而不當「特任」的「委員長」。正當懸缺未定之際，一次在上海愚園路一一三六號汪邸開幹部會議時，對於未來新政權的人事，也有所討論。周佛海的心理，以其嫡系部下「十人組織」，初步一律分任爲各部次長，表面上並不偏袒大用，而實際上能收到明瞭各部真實情形的效果。佛海在民十八出任民衆訓練部長與江蘇教育廳長之前，久任總司令部政治訓練處處長，而羅君強是他那時的主任秘書。那天的幹部會議中，佛海提出以君強任「軍委會政治部次長」，俾駕輕就熟，爲公博之助。公博當場笑着說：「君強那麼壞的脾氣，我不能要他，你爲他另謀高就吧！」高宗武與陶希聖雖中途離汪而去，但汪氏夫婦對高陶仍不盡有眷念與曲諒之意，尤其認爲陶之所以出走，實由於君強一函所激成，汪夫人餘怒未息，那天卻站起來說：「誰也不能與君強共事，『邊疆委員會』人選未定，不如讓君強去，『邊疆委員會』與各部無關聯，就讓君強去關門做皇帝吧！」就憑陳璧君這幾句話，決定了君強以後的出處。人棄我取，君強聽到了這個消息，卻沾沾自喜，以爲雖無事可做，官階

到底是「特任」，以後他的得爲「司法行政部長」、爲「安徽省長」，也無不由此而來。宦海浮沉，其其中豈真有前定數？

汪政權的「中央政府」院部人選雖然確定了，原「維新」舊人，幾乎都處于伴食之列，而日政府對於佔領區的地方官吏，則堅持必須逐步更動。所以當汪政權創立之時，除「廣東省長」派出陳耀祖（陳後遇刺殞命，由陳春圃、褚民誼先後繼任）以外，其他如「江蘇省長」陳則民（以後繼任的有高冠吾、李士羣、陳羣、任援道諸人），浙江省長汪瑞闈（以後繼任的有梅思平、傅式說、項致莊、丁默邨諸人），「安徽省長」倪道煊（以後繼任的有羅君強、林栢生諸人），「湖北省長」楊揆一（以後由葉蓬繼任），「南京市長」高冠吾（以後由蔡培、周學昌等繼任），「上海市長」傅筱庵（以後由陳公博、周佛海繼任），「漢口市長」石星川，「廣州市長」彭東原，全部都爲「維新」舊人，甚至日人所寵信的「蘇浙皖三省統稅局長」邵式軍，周佛海初雖欲全力去之，而且終未成爲事實，日本的仍然想統治中國，無處不暴露其不可理喻之野心。今天雖已時移勢易，而對二十年前不可與爲友的舊事，還是值得讓每個中國人重溫一下。汪政權在此數年中，因不斷與日人力爭不屈，情勢也逐漸改善，如江西派出了鄧祖禹任「省長」（後由黃自強繼任），以華北一部份土地劃出而成立淮海省，由郝鵬任「省長」（後由郝鵬舉繼任）。蘇北也設立了行營，統一指揮，由臧卓出任行營主任，以後改爲蘇北綏靖主任，由孫良誠繼任，這都是後話。

(三四) 揭開了歷史悲劇的序幕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倒是一個溫暖晴朗的天氣，醞釀了一年三個月的汪政權終於成立了。原來的國民政府在淪陷中給日軍搗毀得像故國山河一樣的支離破碎，汪氏的「國民政府」，遷到了戰前考試院的舊址。

那天的清晨，警察已督促南京的市民們重新掛起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只是上面加了一條三角黃布飄帶，寫着「和平、反共、建國」六個大字。市民們有一些欣喜，因為五色旗又匿跡了，中山先生所手定與革命先烈們以鮮血換來的國旗，又見飄揚在中國自己的土地上。但市民們也有一些辛酸，這一條黃布飄帶，是沾污了中華民國，沾污了中華民族！

所有汪政權的登場人物，衣冠趨踰，分乘着簇新的汽車，馳向新的「國民政府」！門前是一條橫亘着的火車軌道，越過軌道，遠遠就望到大旗杆上一面青天白日旗在臨風招展，上面並沒有黃布飄帶，是換了一個方式，改變用兩根小竹竿交叉在國旗的下面。意思僅在告訴人，旗上的黃飄帶不是固定的形式，將來隨時會撕去的。

禮堂裏已擠得滿滿的，彼此相見也只是交換着點一下頭，每個人全沒有熱烈高興的神氣，全場是一片冷靜。汪氏出現了，許多居高位的武官是軍裝，文官是藍袍黑褂，唯有汪氏穿着一套晨禮服，仍然如當年的丰采，但顯得開始有些蒼老，有些憔悴了。他，面上全沒有一絲笑容，嚴肅地悄然走上主席台，眼光向四面掃射了一下，微微聞到嘆息之聲。在「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國歌高奏聲中

，他俯下了頭，面上現出了勉強的一笑。汪氏的演說，一向是充滿煽動性，生動而有力。記得我第一次聽到他的演說，那是民十六他脫離了武漢政府來到上海，地點在善鐘路七十七號，他的講題是「分共以後」。事前我爲他想，他參加了左傾的武漢政府，又會與陳獨秀發表過聯合宣言，這篇演說，他將怎樣自圓其說？而他的演講，一開始就說：「我們爲什麼要容共呢？那是遵奉總理的遺教；那末，我們爲什麼又要分共呢？這是尊重總理的精神！」寥寥幾句話，先把自己的立場站穩了。他總是對的，並且說得無懈可擊，我佩服他的辯才與機智。三十餘年來，這幾句話，永遠留在我心裏。而汪政權建立那一天他的演講，似乎並沒有使我留下特別的印像，他聲音很低，講話無力，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大失敗的一次。我只約略記得他的大意：①大亞洲主義是中山先生北上過日時所提出的最後主張；②歷史上決無百年不和之戰；③收拾山河，拯救蒼生。典禮在他講完以後，匆匆地結束了。在禮堂門口，全體合攝了一張照片，就完成了歷史上悲劇的序幕。

這樣一個重要的節日，連充任最重要配角的周佛海，在他的日記中，也只寥寥記了兩行：「七時半起。旋赴國民政府舉行還都典禮及各院部會長官就職典禮，在隆重嚴肅空氣中完成。」而且「隆重嚴肅」字樣，還是文人筆下的辭藻。

一切外交上常例的各國使節的祝賀形式也沒有，日本也並沒有像周佛海所力爭的派出了常駐大使。連日本駐華最高司令官西尾等也到了翌日上午，才往汪政府作形式上的週旋。石頭城畔，是一片何等淒涼的景色！

爲這一個節日作點綴的倒有兩件事。

同日，重慶國民政府又發表了一百零幾人的通緝名單，自汪精衛起，包括汪政權的院部會長副院

長以及所有次長在內，一網無遺。最感奇怪的，我並不在汪政權中担任任何重要職務，自從林相生拒絕了我任宣傳部次長以後，我倒有失馬塞翁的欣喜，佛海屢屢示意我表示我的願望，而我一直聲明願意不拘名義，以友誼關係從旁幫忙。雖然他終於安插我為中政會法制專門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是梅思平），那是一個無足輕重而僅有名義的職位。汪政權六年之間，我真是從未去出席過一次。何以重慶把我的名字也列入其內？而且前後四次通緝令中，我居然已經是第二次獲得了這個「不虞之譽」。反正是緝而不通，我也再度有了受驚若寵之感。

那天，南京城裏，是够熱鬧的，雖然也照例有「維新」時代「大民會」策動的民衆慶祝遊行之類的玩意，每個政權的創建，也必然會有這一套，人民在被統治之下，也一定會乖乖兒兒的聽從支配，高呼擁護，這一類戲在我過去半生中是習見了的。但那一天的遊行行列，確真是並不熱鬧。熱鬧的倒是日本軍人到處對青天白日旗當攻擊目標，有些有毆打懸旗居戶的暴行事件發生。在鼓樓與新街口等處，擠滿了汹汹的日兵，更有釀成暴動之勢。原因有兩個：日本軍人以爲三年來作戰傷亡纍纍，是要把青天白日旗打倒，現在相反地在侵華軍事大本營的南京，滿街滿巷，一夕之間，又復公然出現。在日本兵士的心理，不甘於有青天白日旗，殊不知中國的人民更不甘於國旗上再多出一條不倫不類的黃布條。因此，在懸旗的時候，許多人自動地把黃布條取消了。於是日本軍人有了藉口，城裏到處亂烘烘地可以隨時發生大禍。汪政權的軍警與日軍部方面會同極力彈壓，總算安然過去，滿城小小的武劇，也成爲這個節日中最熱鬧的點綴。

汪政權之建立，重慶是認爲通敵叛國，而日本又以爲非但是一個不受指揮的組織，反而是處處予以掣肘的一個累贅。雖然那時淪陷區的民衆，寄以若干希望，減少一些被蹂躪的實惠，但是這政權的

命運，在兩面不討好中，其未來的結果，是註定爲先天性的。

(三五) 汪精衛兩行酸淚立階前

汪政權之建立，既以日本前首相近衛文麿之三原則爲依據，所謂善鄰友好、共同防共與經濟提携，似乎表示得很明朗，而且日本更聲明不要求賠償，以及停戰之後限期撤兵。但一旦汪方與日方真正到了折衝的時候，方纔發覺滿不是這一回事。日本希望拔出泥足而渴望和平是事實，但近衛三原則，不過是和平攻勢中的香餌而已。但汪政權既經成立，無論在任何情況之下，必須先與日本弄好關係。

汪氏等一行於二十八年夏秋間先後抵滬以後，即不斷與日方接觸，非正式交換意見，汪日雙方以周佛海與影佐禎昭爲交涉的對手。正式開始談判，則已在二十八年的歲杪，地點是愚園路一一三六弄六十號，也即是我與羅君強的共同住處。出席談判的人員等，我已在前文敘過。起初還是談的原則問題，到二十九年的新年，日方以油印的文稿，提出了整套的「調整中日間基本關係」草案，內容的苛惡，是可想而知的。當與周佛海梅思平共同出席的高宗武與陶希聖取得了日方的提案後，汪氏正擬召集幹部會議討論對案時，於二十九年的一月四日派人召集高陶出席，才發覺了高陶已人去樓空，挾了日方提案高飛遠走，而且不久日方提案全文，在香港各報公開發表，條件內容既與善鄰友好相去甚遠，於是舉世大譁。但是高陶拿去的是日方的原稿，汪方連否認的餘地也沒有。周佛海日記中，認爲受盡氣的是丁（默邨）李（士羣）之爭，而丟盡臉的爲高陶之走，也可見當時嚴重之一斑。

文件的發表，是揭開了日本並無悔禍之心的真面目。而周佛海即利用這一個機會，並且觸到了日

本的痛處，對影佐說：如其要讓全世界相信高陶携走的文件是出諸虛構，日本與我方合作確具誠意，祇有雙方以未來的事實來證明。那末，條件方面，日本應該大大的讓步。影佐聽了雖很以為然，而日本政府與軍部方面，對汪方卻並不肯絲毫放鬆。

日本方面那時的情形怎樣呢？據重光葵所著「昭和之動亂」一書中所記，可以反映出日軍當時的眞正動態。

事實有回溯之必要：對日抗戰始於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即蘆溝橋事變是。至八月十三日淞滬開戰，於是一發不可收拾。其間僅四個月的時間，於同年十二月十三日首都南京陷落。翌年十二月二十日政府復由漢口遷往重慶。前後一年四個月，日軍勢如破竹，已將中國的華北華中心臟地區全部佔領。日軍固然感到傷亡慘重，後果堪虞，但同時軍事上的勝利，也一時衝昏了日本軍人們的頭腦。那時華北由杉山繼寺內任司令官，華中由畑俊六接松井之任，華南更由古莊攻略廣州。至民國二十七年年底，日軍北進至山西，中抵漢口，南下廣州，全部海口，遭到封鎖，這是汪氏基於戰事上失利的悲觀而脫離重慶的主因。日本朝野也志得意滿，因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調停和平失敗，中國政府堅持不屈，近衛內閣且公然於二十七年一月十六日發表了「不以蔣政權為交涉對像」的聲明。而這一年中，也使近衛對戰爭發覺了有無限危機，為挽回過去的錯誤，於是發表了「三原則」，目的原是希望誘使重慶談和，而意外地發展為汪氏脫出了重慶。從汪之離渝，以迄其政權之建立，日本內閣已四易其人，由近衛而樞府的平沼，再由平沼而有陸軍的阿部，再由阿部而海軍的米內，可知日本的如何陷於手忙腳亂的境地。汪之脫離重慶，由滬赴日，經板垣陸相介見當時的首相平沼，而平沼竟會感到不知為何而來的驚異，更可見軍部控制了內閣，內閣成為軍部的傀儡。

第二次近衛內閣的實現，已在汪政權建立之後。近衛基於在他第一次任內所爆發之中日戰爭，有及早予以結束的責任感。但是軍部的「中國派」，還是一意孤行，積極進行「中國佔領政策」，創設興亞院，作統治中國的幻想，希望汪政權成爲僞滿之續。興亞院在中國佔領區成爲最高的統治機構，並且在北平設有「北支開發會社」，在上海設有「中支振興會社」，軍事侵略與經濟侵略雙管齊下。

汪政權成立之後，日本派出了前首相阿部信行大將爲特派大使至南京，進行「中日間基本關係」之交涉，汪政權要求以平等、自由爲原則，更進而廢除中日間的一切不平等條約。而日本則堅持完全相反的佔領政策，要求承認日軍廣泛的權益，差不多有半年的時間在爭執中，而在日軍槍刺之下，讓步的必然是汪政權。那時我看到過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等的絕望、痛苦與憤怒的情形。而所謂「中日基本協定」也終於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四日在南京簽署，日本正式承認汪政權，互派「大使」，聲明「尊重」中國主權，而汪政權也發表了「中日滿共同宣言」。並以影佐禎昭少將爲最高軍事顧問，以日本前財相青木一男爲最高經濟顧問。

到今天，我承認汪氏有意氣，看錯了局勢，走錯了路，但我仍然相信汪氏決不是一個甘心賣國的人，因爲我目擊了汪氏於簽訂「協定書」時令人酸鼻的悲痛情形。

協定書的簽字地點即在汪政府的所在地，汪以「行政院長」的身份，代表政權在協定書上簽字。那天，他穿了一套禮服，當日方大使阿部行將抵達以前，他站立在禮堂前的階石上，面部本來已充滿了淒惋之色，他呆呆地站着，遠望繚繞在紫金山上面的白雲，忍不住兩行清淚，從目眶中沿着雙頰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雙手抓住了自己的頭髮，用力的拔，用力的拉，俯下頭，鼻子裏不斷發出了「恨！恨！」之聲，淚水漬滿了面部，他的悲傷，是僅次於搥胸頓足。所有在四週的人員，也

爲汪氏的悲苦，激起了國家之痛，與身世之悲，許多人的眼眶都紅了。那時，歡迎大使的軍樂起奏了，阿部已經緩緩地進來，立在汪氏旁邊任翻譯的周蔭庠，低聲向汪氏說：「先生，阿部大使來了。」說着，一面從上衣袋中取出小梳，爲汪氏整理着一頭亂髮，一面用手帕爲汪氏抹乾了面部的淚痕。汪氏像甯然從夢中醒來，面上重新露出了一絲苦笑，迎接阿部，同入禮堂，完成了簽署手續。這一幕動人的場面，十九年來，一直還在我夢境中出現。

(三六) 六年中的財政經濟概貌

經濟是政治的命脈，汪政權自然也不會例外。汪氏等一行脫離重慶到達河內之時，當時既未有作建立政權的打算，手頭當然不會有充裕的經濟。更以汪氏的地位，收受日本的餽贈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河內一段時期，汪氏發表艷電以後，如無行刺誤中會仲鳴事件發生，本已決計啓程赴法。當中樞派谷正鼎赴越疏通之際，汪不但要求發給出國護照，而且希望補助旅費，汪氏斤斤於此萋萋之旅費，正所以說明其經濟情形支細之一斑。

在河內還只須顧及私人生活。而自陳璧君周佛海梅思平等一行先後來港以後，展開政治活動，經費來源，係由若干銀行家或出於同情，或基於友誼，暗中資助。去滬以後，則仰給於關餘。所謂關餘，自清道光二十二年，以我關稅收入，作爲賠償英國軍費之擔保後，嗣即陸續爲外債暨賠款之保證。所有國家關稅收入，由稅務司存入滙豐銀行，儘先償還各國外債或賠款之本息，如有多餘，始撥歸政

府收用。自抗戰軍興，國軍西撤，經日軍之要求，關餘改存於日本的橫濱正金銀行。民國二十六年以後的關餘，政府即無法動用。汪等抵滬以後，所需經費，即以此爲挹注。但是數額有限，且日軍也時常出以延阻。

當汪政權建立之日，蘇浙皖三省當兵燹殘破之餘，又兼日軍的澈底搜括，已有民窮財盡之概。那時市面上所流通的是三種貨幣：①法幣，事實上至二十八年，已貶值很多。②軍用票，日軍在淪陷區發行，雖與日元等價使用，但不能倒滙至日本國內，而且無限制發行，後來票上竟至不列號數。總數發出究有多少，除日本軍部外，無人能統計其總額。③華興券，維新政權建立後，創辦了華興銀行，以維新首長梁鴻志爲總裁，表面稱爲商業銀行，事實上等於「維新政權」的「國家銀行」，日軍且賦予發行鈔票之權。

至於財政收入，汪政權成立以後，雖「維新」「臨時」兩「政府」已偃旗息鼓，「維新」重要人員爲汪政權所吸收，「臨時」則依戰前何梅協定後華北特殊化的成例，改稱「華北政務委員會」，事實上——以徐州爲界，劃疆而治，徒有隸屬之名，不受汪政權之直接管轄。湖北方面，日本軍人亦有割據之局，形成一片支離破碎。最初周佛海所編列的財政預算，收入部份爲華北關稅二百萬元（仍以法幣爲標準），江海關與華南關稅合計爲六百五十萬元，統稅五百五十萬元，鹽稅二百萬元，華北鹽稅五十萬元，武漢各項稅收可解繳一百五十萬元，合共一千八百萬元。

而支出預算，以「維新政府」之支出爲基礎，則祇八百萬元，汪政權建立後，機構增多，追加一百五十萬元，另事業費五百萬元，軍事費五百萬元，國民黨黨費六十萬元，預備費五十萬元，合計爲二千五百十萬元。收支兩抵，不敷約七百餘萬元。作爲一個政府，這數目委實已小得可憐。

事實上，關稅既因國軍後撤，情形混亂，船舶之入口大為減少，收入亦因之隨而劇降。至太平洋戰爭爆發，關稅已等於零。鹽務初為日本軍人所把持，後日本成立興亞院以後，設立「華中振興會社」，下轄經濟侵略的各種國營公司，鹽務方面亦為華中鹽公司所把持。我國鹽產，以長蘆為最多，而又在華北地區，解交之稅款，年僅五十萬元，餘餘而已。華中方面，海州場歸日人以華中鹽公司直接經營，松江與淮南兩場產鹽不多，實際僅有一餘姚場。統稅則始終操於日本所委任所控制之邵式軍之手。汪政權成立，財政部下三大署：「鹽務署」長阮毓祺（勝利後病死蘇北）。「關務署」長張素民（現在港），均為周佛海所自行物色，惟邵式軍則為日人直接關係，雖出任汪政權之「稅務署」長，暗中仍受日人之指揮。終汪政權之局，周佛海處心積慮，以去之為快，終未能如願。故其所收入之稅款，半飽私囊，半供日本軍用，交「財部」的不過是形式上的敷衍。又一大宗收入之鴉片稅，日人又以前清郵傳部尚書盛宣懷之姪盛文頤（字幼盒，滬人呼為盛老三而不名）創宏濟善堂經營其事，而以日浪人李劍甫負責實際之全部責任。汪政權對之幾於不能問訊。直至太平洋戰後，始收回自辦，另立「禁烟總監部」，而由陳公博兼任總監。汪政權財政情形之複雜，就上面所述，已可知周佛海之如何難於措手足於其間了。

所以，汪政權一旦建立，在未會開始收稅以前，支出即一無着落。那時代表日方聯絡經濟的是犬養健（即戰前日本二二六事件中被少壯派軍人所殺前首相犬養毅之子。戰後吉田茂內閣中曾出任司法大臣），由於他的接洽，向正金銀行借款四千萬元，始得勉強難關。汪政權之成立為三月三十日，而於開張前一日即三月二十九日，汪政權財部之印信，首先即用於與正金銀行上海支店經理岸波簽署之借款條約上。佛海謂為實非佳兆，事非出于迷信，蓋誠有感而發也。

(三七) 法幣與中儲券兩度折換

汪政權前後六年之中，預算既捉襟見肘，又當戰時幣制不斷貶值，而始終能平穩渡過，其間向日本借款者似有兩次，而不敷之數，則另以所得稅、營業稅、印花稅以及田賦等爲之抵補。

我所知於汪政權之財經部份者，如此其少，而有三事則不能不就我直接所留之印象，於此作一概括的闡述。所謂三事，即「中儲券」與法幣之折算，金證券之發行，以及紗花之收購是也。茲先述「中儲券」與法幣之兌換與折算經過如次：

當周佛海担任「財長」以後，日本派遣前財相青木一男爲汪政權的最高經濟顧問（青木後回國出任大東亞相），以代表犬養健之任務。首先計劃設立「中央儲備銀行」，作爲汪政權之「國家銀行」，佛海則以「財政部長」而兼任總裁，以錢大槐爲副總裁（錢爲江蘇太倉人，字書城，本爲金城銀行大連分行經理，雖出於日人之推薦，但佛海以其爲周作民之代表，始予以大用。勝利後繫上海提籃橋獄，初判死刑，上訴減處無期徒刑。共軍南下，凡判處無期徒刑以上之汪政權人員，均未釋出，一律轉入於中共之手。前數年，錢爲共黨所槍斃）。

佛海在「中央儲備銀行」籌備期間，屢以日本軍用票在淪陷區之無限制發出，無準備，亦無稽考，一旦戰爭結束，將貽民間無窮之害，更使國家蒙受無可計算之損失，深以爲慮。故首先提出俟「中儲」成立以後，新貨幣發行，日本應負責將軍用票與華興券掃數收回。這一項建議，對日軍來說，無

異是與虎謀皮，而佛海則出之以堅持，而且以此爲「中儲」是否成立之條件。前後經過約一年的交涉，日方終於讓步，接受了佛海的條件，這是汪政權對日本經濟作戰的一項重大勝利。

佛海更認爲紙幣的發行，無論如何應該對人民負責，換一句話說，即不能不有相當之準備。所以當「中儲」成立之後，首先依照市價，大量收買黃金與英美外匯。同時並以原國民政府發行之法幣，亦爲庫存準備之一。因之，在「中儲券」發行之初，市面上倒並未發生什麼波動。

最主要的問題，是國民政府原在淪陷區所流通的法幣，如何定出一個公允的兌換率。無可諱言，戰事經過了三年的時間（「中央儲備銀行」的成立，已在民國二十九年的秋冬之間，而收兌法幣更在翌年春夏之交），法幣已經貶值，如兌換率定得太高，則汪政權無力負荷實際之差額；定得太低，又將使民間蒙受重大之損失。日方最初提出爲五十作一，即五十元法幣，兌換「中儲券」一元，而周佛海所訂出的兌換率原爲平兌，後退而爲兩作一，即兩元法幣，兌「中儲券」一元。其間經過了劇烈的爭持，日方始於無可奈何中以兩作一定案。但在正式實行的前夕，市面上已有了收兌的風聞，黑市會到過十七元法幣換一元中儲券的價格，但這祇是一兩日的情形。

在「中央儲備銀行」前後五年中，曾經發行過大量的鈔票（華北另有「聯合準備銀行」發行之「聯準券」），行使於蘇浙皖鄂贛粵區域，從中儲券之發行，日軍用票與華興券也同時由「財部」與「中儲」收兌，相信仍留存於民間者已爲數很微。但是，「中儲」既始終沒有宣佈過有沒有準備，或者有多少準備，民間大部份也以爲「中儲券」與軍票相同，心理上肯定「中儲券」是並沒有準備的。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日，首次傳出了日本投降，戰事結束的消息。旬日之後，總司令何應欽所派遣的冷欣等一批受降先遣人員，飛抵南京，也帶來了若干關金與法幣。南京商會由

於勝利所給予的欣奮，定出了二百作一的比價，在市面流通。因為數量不多，市面固未受影響，接收人員隨身帶來的關金法幣，也遠遠不敷應用。八月十四日，軍委會已正式電委周佛海為京滬行動總指揮，那時「中儲」雖已停止營業，但中央仍責令負責維持市面，以及在青黃不接之際，仍以「中儲券」供給中央所派遣的軍政人員以一切需要，周佛海與錢大櫓也每日仍到「中儲」辦公。接收人員，祇憑一紙便條，「中儲」即照數付款。在這二二月間，「中儲券」增發的數字是可驚的。直至九月三十日周佛海由戴笠陪同乘機赴滬，錢大櫓將「中儲」庫存等移交後赴上海南市軍統局看守所東身待罪，始正式告一結束。中央銀行總裁陳行也已受命來滬，主持金融。並由他正式宣佈中儲券與法幣之比值，即以南京的不成文規定，定為二百作一。無人知道這比額是怎樣一個計算方法，當然也無人敢予問訊。誰對「中儲券」出來說話，誰即被視為有「漢奸」、或祖護「漢奸」之嫌。

以後，在上海提籃橋的監房中，錢大櫓於初審被判處了死刑，我去慰問他。他神色顯得有些沮喪，但態度還很鎮定。他告訴我，在汪政權中他沒有做過別的事，判處極刑的罪狀，就是「中央儲備銀行」的「副總裁」，個人生死倒沒有什麼，但政府似乎夾涉了一些意氣，遺憾的是健庵（陳行字）是金融界的舊人，對中儲券的比值，不該作出這樣不合理的決定，這是我不能瞑目的一點。說着，他在身邊掏出了「中儲」移交的賬目，他一行一行指給我看，中儲券的發行總額是多少（包括勝利後接收人員取用的數額在內），庫存黃金若干噸，白銀若干噸，英美瑞士的外匯與美元英鎊及瑞士法郎以及法幣是多少。他說：把房產、股票以及其他貨物等財產一切都不算，即依照宣佈兩百作一的當日重慶黃金白銀及外匯的牌價，我詳細地精確地計算過，中儲券的發行準備與其發行額，應該是二十八對一。兩百作一未免過份了，損失的是人民，而人民是無辜的。當時，我會經將數字完全抄錄下來，而這

次南來，我什麼都沒有攜帶，在現在寫回憶錄時，深恨不能列出這寶貴的資料。但許多曾經參加過「中備」接收工作的人，都還健在人間，他們應該相信我舉出錢大樞口中的這個比值是正確的、合理的。而二十八比一的數字，也深深的記在我心裏。十餘年後，一切早已事過境遷，我還在寫這筆舊賬，其實也已是多餘的了。

(三八) 汪日經濟鬥爭又一回合

汪政權的處境，正如重光葵於其出獄後所著的回憶錄「昭和之動亂」中所說：日本的對華侵略戰爭，擴大為全面戰爭的時候，照甲午中日戰爭及甲辰日俄戰爭之例，在東京宮城設立了大本營，以陸軍部和海軍部為組成機構的中心。從此一般政治，都要依從統帥部的意旨，而軍部也完全被侵華軍閥勢力所支配。汪政權的財經處境，自然一切更受其牽制。

軍部當時，已準備好佔領中國政策的具體方案，將中國全境使之「滿洲化」。對華問題已脫離了外務省，在軍部勢力之下組織興亞院，由興亞院來支配中國問題。這方案在內閣會議中，曾發生激烈爭辯，沒有軍部支持的宇垣外相，因反對而辭職，由有田八郎繼任，興亞院也終於成立。

興亞院一共分為兩部：第一部管理政治；第二部處理經濟。並在北平、青島、上海、漢口、廈門、廣州分設聯絡部。廈門青島的聯絡部歸屬海軍，北平、漢口及廣州的聯絡部歸屬陸軍，上海則屬於陸海各半的勢力。為了作澈底的經濟侵略，在北平設有「北支開發會社」，上海有「中支振興會社」

，下面有形形式式的所謂中日合辦的國策公司，對於主要物資的生產與運銷，加以全部的掌握。

關於日本軍部預算的配額，自二二六事件以來，內閣本已大量放寬，而自成立大本營之後，又變為戰時體制，對軍部預算，成為無限制供應。陸海兩軍互相競爭要素，大藏省既不敢拒絕，而又無力支付，只有以濫發紙幣來彌補，遂使日本國內經濟發生動搖，物資缺乏，物價暴漲。唯一挹注之方，只有在中國佔領區裏壓榨。一切戰略物資與原料，都是日軍搜括的目的，除了日本財閥所經營的三井三菱等大公司負起這任務外，軍部也索性直接徵購，例如江蘇境內的蘇松一帶產米區，就被全部劃入軍米區域，由軍部直接收購，中國人的民食，只限於貧瘠的長江以北一隅。

汪政權對於這方面非但感到痛苦，而且感到棘手，反抗是無此力量，而依從又絕不甘心。表面上日本要尊重汪政權為一個「獨立」「自主」的「政府」，汪政權也只有利用這一點予以掣肘。譬如說：在「中支振興會社」下的各個國策公司，照例董事長由華人担任，儘管他並沒有實權，但形式上必須經過他的劃諾，所有「國策公司」的董事長，幾乎都是周佛海梅思平等的親信，因此可由周梅等指示如何採取消極的牽制行動。汪政權的六年之中，也無日不在與日方鈎心鬥角。

日本的國力，在戰爭中既有着驚人的消耗，到戰爭末期，早已呈現羅掘俱窮之象，至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以紡織馳名的日本，由於太平洋戰爭，美國那時已取得了制空權與制海權，幾乎完全遮斷了日本在南洋取得物資運輸的航路，甚至紗布也感到了匱乏。興亞院提出了在淪陷區全面收購紗布的要求，而且堅持這一個要求。

本來，如紗布，如食米，如麵粉等早已在上海成立了各種的統制會，隸屬於「全國商業統制委員會」之下，主任委員原為上海三老之一的聞蘭亭，那時已經辭職，由復業後之交通銀行董事長唐壽民

押解去滬，以出任汪政權職務爲恢復自由的條件。唐又爲周佛海之密友。當日本要求收購紗布，周唐計議對策，覺得斷然反對，反而激成日本的老羞成怒，不如改以延阻爲緩兵之計。於是由周唐分別交涉，提出了兩點：（一）日本與汪政權不但爲與國，而且爲盟國（太平洋戰爭發生後，汪政權會通電宣佈參戰，其作用與經過，容後再詳），應該處於公平原則之下。日本在中國境內設有大规模的紗廠，如內外棉等（即勝利後接收合併而成的中紡），手裏有多於華人幾倍的紗布，爲了表示中日之間的公平，也讓中國人看到日商的擁護日本政府的政策，收購應該由日商入手，次及華商。如日商的紗布已經够用，則華商的應該留歸中國平民的日常需要。（二）戰時需要的是物資，日本既與英美等宣戰，則黃金已等於廢物，收購紗布，如以「中儲券」支付，將更使通貨膨脹，而使汪政權的財經趨於崩潰，因此，向華商收購紗布，必須以黃金爲支付，而日本也必需於收購前將黃金由日本運來。這兩點對策是相當毒辣的，不敢說日本不明瞭汪政權的真意，事實上當時日本政局的處境之艱難也與經濟處境相同。他感覺到無力長期支持全面戰爭，尤其與英美在太平洋節節敗退中作殊死鬥時，迫切需要拔出在華深陷泥淖中的雙足。但是重慶堅決拒絕了百計探誘的全面和平，如再與他一手所支持的汪政權爲此而鬧翻，不但將成爲國際上的大笑話，日政府也將無以對國內人民作交待。周佛海正針對着日本這一個弱點，因此敢於毅然決然地提出，毅然決然地堅持。經過數月劍拔弩張的交涉，日本也終於勉強就範，一切照着佛海的意見辦理。

說到這裏，使我現在想來，還覺得汪政權真是一個奇怪的組織。他一方面對重慶作抗戰與和平的兩個不同政策鬥爭；一方面又與日本作權力上經濟上的鬥爭。同時汪政權既與日本攜手，而其主人

物，如陳公博周佛海等又與重慶直接間接有默契、有聯絡，甚至奉行重慶的命令。而另一方面，又組織了清鄉部隊，與中共在軍事上作鬥爭，這真是一幕戲劇，而我又要說：可惜結局是一幕悲劇！

(三九) 紗布收購後的三項去路

在紗布實行收購之前，由汪政權冠冕堂皇地發佈了明令；在紗布實行收購之時，也真是先由日商方面入手。等日商辦理完畢，所有華商所存儲的纜全部開始登記，登記終了以後，算出應該折合的黃金數量，又通知日本整批運送來華。日本真也乖乖地由飛機一批一批地運抵上海，送交「中央儲備銀行」存儲。被收購的紗布車送至指定倉庫的時候，商統會就發給廠商領取黃金憑條。滿十兩的直接向「中儲」具領（上海一帶，黃金以十兩為一條，不似香港的以五兩為一條，但上海的十兩，祇合香港八兩三錢三分），其不成條之零數，則委託全滬銀樓辦理。

日本與汪政權在這次經濟鬥爭中，日本最後竟然是全軍覆沒。紗布收購集中倉庫以後，汪方又提出了另一個要求，理由是既然紗布全部收購去了，今後人民穿的將是什麼，處於「政府」的立場，應該給人民以最後購買的機會。理由很正當，日本想不出別的說辭反對，於是商統會公告，每人依收購價配給布料一丈三尺（即成人縫製一件長袍的尺度），於是從華商手中收購的紗布，一部份分散而仍然歸入於中國人民之手。這聰明的做法，也是汪政權獲得淪陷區人民諒解原因之一。

另一個有關紗布的插曲，也值得在這裏一敘。當時公開在租界裏做杜月笙代表的徐采丞（年前在

港以神經衰弱自殺身死），等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開入租界，他非但沒有遭到意外，而且立刻取得駐滬日軍最高司令部「登部隊」陸軍部長川本的信任，委他做了囑托（日語，即顧問之意），更通過了我的關係，與周佛海取得聯繫。日本人注重中國人的資歷與既成勢力，認為杜月笙在上海有潛勢力，而采丞是他的代表，因此也對其重視，采丞的得以活動，大約就基於這個理由。那時，重慶有一個專門爭取淪陷區物資的龐大商業機關，叫做「通濟隆」，由孔祥熙、顧祝同、戴笠、杜月笙等為董事。采丞在浦東設有一秘密電台與重慶通報，重慶交給了他一個使命，要他儘量把藥品、橡膠、紗布等抗戰區缺少的重要物資內運，以供戰時急需。而采丞也竟然說服了川本，由「登部隊」付出四億「中儲券」作資本，成立了民華公司，與通濟隆為交易之對手，目的以上述物資，換取抗戰區的礦砂鴉片等物。民華公司表面是以日本軍部為背景的大商業機構，佔據了上海四馬路建設大樓全層的房屋，以上海的名流們出任該公司的董事，就記憶所及的名單，其中有葉恭綽、聞蘭亭、林康侯、袁履登、唐壽民、吳震修、葉扶霄、朱博泉、周作民、吳蘊齋、汪曼雲、段宏綱等人。我則以周佛海的代表資格，任為該公司的常務董事。而且據采丞告訴我，全部名單經電告重慶軍委會核准備案。

收購華商紗布，經過汪政權的阻延，實行時期已在民國三十四年，即和平那年的初春，民華公司有四億元資本在手，果然也採辦了藥品橡膠等其他物資，陸續由京滬路轉津浦路，從界首方面內運，紗布則竟然由日軍部出面向「商統會」交涉，民華公司以現金及暫欠方式，取得了一部份運往抗戰區。本來原則上民華與通濟隆是物物交換，但是民華一批又一批地起運了，直至勝利為止，通濟隆卻並不會有過任何物資運往淪陷區。這雖然完全是事實，但由我會經參加過汪政權的人來說，我祇能譏諷者作為「信不信由你」這一類的故事來看了。

除了上述配給與內運以外，其餘留存在上海倉庫中的紗布，直至勝利以後，全部由政府接收，供給軍隊與市民的需要。日本白送了一大批黃金，結果連一疋一縷都未曾運走。我不知道這是日本人的愚蠢，還是被稱為漢奸者們手腕的巧妙？

此外可以附帶一談的，就是前面所說的金證券問題。到民國三十四年的春天，「中儲券」已有通貨膨脹的現象。而且這現象在急劇惡化中，周佛海又以「大東亞戰爭」應先以穩定後方金融的老調，要求日本再運國庫中的金塊金條，作為收回一部份「中儲券」之用。日本初時當然予以拒絕，但佛海以去就爭，說除此以外他已無力維持，今後也不再負汪政權統治區域的任何財經後果的責任，並且一度表示消極，不去「財部」與「中儲」辦公，日本方面由駐華大使暨軍部參謀長來與訪談，佛海竟一律擋駕。而最後，日本作了又一次的讓步，讓佛海得如願以償。

「中儲」於取得日本運來之黃金後，立刻宣佈發行金證券。辦法是以當日掛牌價格，任由人民以「中儲券」現金交給「中儲」，兩個月後，不問以幣制貶值關係，黃金漲至任何高價，中儲仍以購買日約定之黃金，交付金證券的持有人。這一個辦法的宣佈，「中儲券」又回復了穩定，上跳的幅度減低，購買金證券者也相當踴躍。前後共發行了七八期，最後一期應該是三十四年十月底到期兌換，但以日本投降，和平實現，「中儲」行且提前發給，了結了對民間的一項債務。

(四十) 汪周間僅有的一次誤會

汪政權中雖龍蛇混雜，派系紛歧，但汪氏對周佛海確能推心置腹，有股肱之寄；周對汪亦恭順不

貳，有國士之心，在周之日記中，且不時流露感恩知己之意。雖其間公館派與CC時有不愉快之小磨擦，而裂痕始終未嘗表面化，終汪之身，與周亦呈水乳交融之象，雖周佛海之左右，有十人小組，而誓言中首列以擁汪爲目的。六年之中，我與佛海朝夕相見，間聞對汪夫人陳璧君有不滿之辭，而對汪氏本人，則從無一語批評。汪之寬容，與周之守份，蓋兩得之也。

佛海與公博，昔雖處於絕不相同之兩個系統，但論私誼則爲舊交。當民十陳獨秀發起中共時，陳周爲出席在滬舉行之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之代表，其經過會分別著於公博之「寒風集」，與佛海之「往矣集」。當民二十八年夏秋之間，汪氏等一行，分道由越港抵滬，公博來滬勸阻汪氏組府不成，即離滬返港。此時改組派與CC間有門戶之見，佛海時常說：「假如公博在此，以他的深明大體，多一個可以商量之人，多一可向汪先生進言之人，一切事情或不至棘手至此！」佛海的思念公博，想與公博携手，真是出於一片真心。以後高陶叛汪離滬，公博於民二十九年三月十一日毅然再度由港去滬。佛海在是日之日記中有云：「本日公博到滬，相見之下，悲喜交集。……」實在是出之心坎中的話。其後六年之中，汪政權遇有大事，公博、佛海、與梅思平、岑德廣等，必事前交換意見，取得協議，然後報告於汪氏。公博的退讓與佛海的爽直，是兩人免去隔閡的主要原因。而直至勝利後，即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忽以一時誤會，在南京雙方派兵佈防，嚴陣以待，幾至用武。幸而懸崖勒馬，卒未釀成大禍，此事經過，容後再詳。

佛海對汪的戰戰兢兢，見之於他二十九年一月九日之日記：「返寓後約思平、默邨來商我輩之態度，因外間謂我輩爲新CC，把持一切，故決定一切慎重，以免外間有此謠傳。對於君強之幼稚言行，加以制止。」寥寥數語，可見佛海對汪之一斑。

但汪氏以多病之軀（除嚴重之糖尿病外，在中央黨部遇刺之槍彈，尙留體內，漸漸發覺已影響健康），加以建立政權後，百不如意，他本是易於衝動的人，一經左右的浸潤，肝陽上升，卽不能自制，汪周之間，因此曾經有過一段波折。

如前所記，當汪政權之建立，除容納一部份「維新政府」人物外，其他各省市地方首長，日人希望保留一個短時期，暫勿更動。這自然是汪政權所絕不願意的事，所以祇經過了兩三個月的時間，汪氏卽提出首先將江蘇省政府改組，舊「省長」陳則民免職，而代之以原爲「維新」的「南京市長」高冠吾。當時汪氏要佛海擬一張各廳長的人選名單，佛海沒有好好的考慮，而以十人組織中的蔡洪田任「民政廳長」，張仲寰任「教育廳長」，更以顧祝同與陳果夫主蘇期間的往日同僚董修甲任爲「財政廳長」。（民國十八年佛海以中央民訓部長兼任江蘇教育廳長，時董修甲爲建設廳長）。名單送呈汪氏，雖於行政院會議中照案通過，但汪氏對周一經他人的挑撥，亦認爲其攬權位置私人，於是心懷不快。

至三十年春，汪政權舉辦清鄉，成立「清鄉委員會」，以李士羣出任秘書長，駐紮蘇州，擬首先在蘇省境內實行清鄉計劃。李士羣雖爲周佛海十人小組之一，但此次的獲得兼任新職，非但經過與羅君強劇烈鬥爭，而且是出於汪氏的直接委任。二年中周對他的「一手扶植」，李既以與丁默邨之間的磨擦，認爲周不能對他完全偏袒而有所不滿，再以與羅君強間意見日深，權力上的衝突日烈，以爲周之對羅，好過周之對他。何況，所有汪政權的特工組織，時已完全掌握在士羣的一人之手，不時要索鉅大的經費，以爲擴充他實力之需，周又往往難滿其意。士羣時常公開對別人說：「我對周先生沒有什麼不滿意，只要錢給得痛快些就好了。」士羣是一個年輕而充滿野心的人，那時已頗想離周而自成一系。

。在當時環境中，惟一的途徑，必須與汪氏發生直接關係，同時也必先取得汪氏之信任。所以李自己也仿周之所爲，暗中組織了一個十人團體，據我不完全的記憶，其中人物，爲唐生明（唐生智之弟，年前由港返大陸投共）、汪曼雲、黃敬齋、萬里浪、胡均鶴、潘達、葉耀先、唐惠民、楊傑等人。以後周李之間的形成水火，李羅之間的勢不兩立，最後士羣之被毒死，其間的曲折，殊非一言片語可盡。而事態的發展，起因都是爲了羅李二人權力之爭，這是中國任何政壇上成爲必有之可悲現象！而爲此蘇省府人事的安插，竟引起了汪周之間的誤會，而且是僅有一次的誤會。

（四一）周系十人組織暗潮初起

事有湊巧，士羣鬥勝了羅君強，奉了汪氏之命，欣然去就任清鄉秘書長，一到蘇州，急急於想在工作上對汪有所表現，而清鄉委員會非僅機構龐大，職權方面也在在與「省府」衝突。士羣爲了取得工作上的便利，更因爲「民政廳長」蔡洪田同是周系十人組織之一，因此約洪田兼任清鄉委員會的江蘇區「專員」，那時清鄉委員會秘書長辦公處，已成爲事實上的「江蘇省政府」，而「專員」則是變相的「民政廳長」，士羣以爲洪田必樂於兼任。不料士羣一經勸駕，而洪田竟然毫不考慮的加以拒絕，弄得士羣太下不了台了。

洪田是一個頭腦比較冷靜的人，從北伐成功一直到抗戰爲止，任上海市黨部委員達十餘年之久。國軍撤退以後，市黨部主要人物潘公展、吳開先、吳紹澍等先後轉往後方，洪田以代理書記長名義與

汪曼雲潛伏租界，從事地下工作，那時李士羣還是土肥原特務機關下的一個小組織，士羣有時還想與中央取得聯繫，曾經幾度要與洪田、曼雲晤面，洪田都退在幕後，而由曼雲和李虛與委蛇。以後市黨部因內部的人事磨擦，蔡洪田、汪曼雲等留滬的市黨部委員幹事，全部附汪。而數年之間，士羣騰踴一時，地位已遠在洪田之上，但洪田是有一些高傲的人，他既不願搞清鄉，更不願屈爲李士羣的部屬。這一來，引起了士羣的不懌，可能士羣在汪氏面前對洪田先已有所嫌擊。

平心而論，洪田倒還不是孳孳爲利的人，他很想爲桑梓之鄉做出幾件事，以減少鐵蹄下人民的痛苦（洪田是江蘇南匯人），事有湊巧，江都縣長潘宏器，那時已逾花甲之年，胸前一部飄拂的白鬚，外貌很像是年高德劭的樣子，而他之所以能出任江都縣長，因爲他兒子娶的是陳璧君的侍婢，完全倚仗的是這一重裙帶關係。戰後，淪陷區於疲敝之餘，建築用的水木材料缺乏而昂貴，潘宏器以縣太爺之尊，竟拆除揚州李鴻章之舊宅，目的是因爲中間的楠木廳所值不貲。事聞於洪田，派專員赴江都攝成照片，已準備提請「省政府」會議，對潘宏器免職查辦。消息傳到了潘宏器耳裏，他知道證據確鑿，萬難抵賴。適南京舉辦「縣長訓練班」，潘宏器已接到通知爲本屆受訓學員。他起程赴京之前，先到了蘇州謁見洪田，要求爲他彌縫，洪田卻不假以辭色，斷然拒絕，他在洪田那裏撞了一鼻子的灰。他知道「民政廳」的科長王春元是洪田的同鄉而又是幼年同學，洪田對他言聽計從。潘於是偷偷地約了王春元在酒樓中再度商量消弭之計，王春元是一個見錢眼開的傢伙，當時兩人有沒有金錢上的要約，雖不敢肯定，但王春元之答應幫忙，則完全是事實。事後王春元代潘向洪田說項，又被洪田拒絕。潘宏器在絕望中到了南京，他以汪公館丫姑爺的家長的身份，晉謁汪氏，當汪氏問到江蘇吏治情形，潘宏器說：「地方上倒還沒有什麼，就是『民政廳長』要錢厲害，難於應付。」他反而把拆屋的事說

成涉汪鞠彙印藉口。這是不言而喻的。汪氏在滬時，汪氏在滬時，汪氏在滬時。於是，不加考慮，打了一個電報給李士羣，令將洪田扣押查辦。

一個午夜，我在上海家中已經睡了，因為第二天洪田要到南京去出席糧食會議，我也需要料理我的銀行業務，我們約好同車赴京，洪田就在蘇州上車與我會合同行，因此那天睡得特別早。正在朦朧的時候，床頭的電話鈴聲忽然大鳴，一聽是佛海的聲音，他說：「士羣有電話給我，說汪先生有手令要他扣押洪田，不知爲了何事，你今晚如來不及去看士羣，明天早車士羣要回蘇州去，你去蘇州與士羣談一談，我以全權交托你斡旋此事。」聽了電話以後，我想不出爲什麼形勢嚴重得要由汪氏親自下手令。這一晚，以我與洪田的私交，自然也就輾轉不能成寐。

翌日上午七時，我趕往北站，士羣已坐在一間包房中，我說明受佛海之托，希望不使事件擴大。士羣說：「今晨又接到汪先生的訓令，是爲了關涉向揚州縣長索賄的事。汪先生的命令我雖不敢違抗，但弟兄的情誼，我也一定迴護，假如洪田也當我是弟兄的話，我決不使他爲難。」我說洪田即將在蘇州上車，我們三個人當面談吧！

車抵蘇州，我與士羣下車，洪田過來招呼，就在月台上我先告訴了洪田此事的經過，士羣接着說：「洪田兄，我希望你不要去南京了，留在蘇州，在我勢力範圍之內，我可以保護你。」不料洪田的答覆，硬得出人意外，他說：「假如我有此事，在蘇州也逃不了責任；假如我沒有此事，到任何地方去我也不怕。」說着，就拉了我上車，這一來，更使士羣過份難堪了，我還在埋怨他，他說：「士羣想趁機使我屈服，我決不示弱。」於是，問題也就成爲僵局。

抵達南京以後，傍晚耿續之在天竺路的家裏宴請許多朋友，我與洪田都去了。入坐方定，「首都

警察廳長「蘇成德」、「南京特工區區長」馬嘯天相偕而來，起初我以為他們也是賓客，不料，他們向洪田作了耳語之後，三人就一起匆匆的走了。我知道是出了事，趕出去已不見影踪。我往四處追尋，以後在馬嘯天家裏看到了洪田。馬嘯天說是依着士羣蘇州的來電辦理，一切無能為力。第二天，洪田被押解赴蘇，在士羣家裏軟禁了達一月之久。幸汪氏不為已甚，士羣也算已顯過顏色，最後洪田丟了廳長的飯碗，得以恢復自由。他的科長王春元則羈押在南京地方法院，也以缺乏證據而無罪釋放。汪政權六年之中，汪周之間的不愉快，這是僅有的一次；而周李之間，感情卻從此永難恢復。

（四二）三個人分成兩派的習性

羅君強時常說：中國人的習性，有三個人在一起，就會分成兩派，而他自己就犯準了這個毛病。在汪政權時代的周佛海左右，自以君強與他的關係為最深，而且也最得其寵信。他們是湖南同鄉，還帶着些世誼，君強在上海大夏大學未及畢業，就一直跟着佛海做事。佛海任總司令部政治訓練處處長時，他就是主任秘書。以後他的得任浙江省海寧縣縣長、南昌行營秘書、行政院秘書等職務，直接間接，都由於佛海的提携與噓拂。至汪政權時期，君強尤其鋒銳畢露，由最早的「邊疆委員會委員長」，而「司法行政部部長」，而「安徽省長」，以至最後的「上海市政府秘書長」。其他如「中央黨部副秘書長」、「稅警總團副團長」等，兼職更不計其數，可謂煊赫一時。他借佛海以自重，也想包辦佛海的一切。任何人想與佛海見面，一定要通過他的聯繫，否則他就會中傷破壞。當時佛海倒是真想

其黨一些人才，死死守住一些專。而以君強狂妄、悻悻、偏狃，無形中不知着佛海得罪了多少人。佛海不是不知道他，其奈關係太深，過去信任又太專，雖有時對之厲聲叱責，而卒之倚畀如故。他認爲君強固然有許多缺點，但是能幹、廉潔，與對他忠實。君強的辦事卻很能幹，做一樣像一樣，而且交托他一件事，總能表面上做得有聲有色。至廉潔與忠實，也只能說佛海尚不失爲一君子，所以很容易可欺以其方了。在君強最得意的時候，不免有些忘形，且以佛海與他，自比於清室中興的曾左。但勝利以後，同押於南京老虎橋監獄時，時移勢易，卽一反平時之恭順，竟至對佛海口出惡聲，而且終至相見不交一語，這真是世態炎涼中最可怕的一例。

最早佛海的確並無想搞十人小組之事，當二十八年秋君強由港抵滬以後，初寓呂班路呂班公寓。是年八月杪，佛海由虹口江灣路三號遷往愚園路一一三六弄五十九號，指定君強與我同住比鄰之六十號。君強那時，卽日日向佛海進言，組織十人小組，以增加佛海之力量，佛海卒爲之意動。實則君強是欲利用團體的力量，在佛海前增高其發言的地位。故二十八年先有羅君強、易次乾、耿嘉基、汪曼雲、蔡洪田、張仲賓、周樂山、戴策、章正範、金雄白等十人結爲金蘭之誼。至翌年，君強認爲原有組織份子的力量不够，又主張改組。他擬議的對像是梅思平、李士羣與周學昌三人。但十人組織事實上爲佛海之嫡系部屬，佛海不欲使思平列入，改請他爲顧問。而以其連襟王敏中參加。李士羣則以手中握有特工機構，是一個實力派，君強初意可以利用聯爲臂助。至學昌則西安事變時，已任陝西教育廳長，資歷較深。故將第一次之小團體放棄，又另行改組，其名單爲羅君強、李士羣、周學昌、朱樸、汪曼雲、蔡洪田、戴英夫、沈爾喬、王敏中與金雄白。

君強雖是慫恿發起十人組織的人，也是他第一個破壞十人組織的人，任何政壇的怪狀，本來只有

利害，而無道義，上述的十人組織，彼此之間，本絕對沒有什麼情感可言。雖然士羣素有野心，無日不想獨樹一幟。他經君強的拉攏，而欣然答應，在羽毛未豐之時，不過借佛海之實力，以達到其發展之目的。汪曼雲則與士羣交誼較好，形跡較密。戴英夫原爲了默邨的一派。朱樸與梅思平的交情，與佛海正在伯仲之間。至王敏中與沈爾喬則完全是思平一派。以這樣不同的目的，不同的性格，複雜的關係，與不相容的利害，其結果固然可想而知，不特不能爲佛海之助，且成爲佛海之累。

照原來的計劃，第一個十人小組組成之後，在職務上分任十部的次長，以爲佛海的耳目。在策略上，汪政權中有任何動態，由佛海召集十人組織徵詢意見，以定對策。而結果除了最初實行過幾次外，以後也無形中冷淡了下來。終汪政府之局，士羣以親周始，而以反周終，且卒爲羅君強熊劍東合謀毒死。汪曼雲因爲既担任了「清鄉委員會」的「副秘書長」，爲士羣的副手，見周時也往往爲士羣代爲解釋，形成誤會。蔡洪田則以個性的落落寡合，尤討厭君強的飛揚拔扈，至受了一度軟禁之後，尤其顯得消極。戴英夫的加入十人組織，原意要在他口中知道了默邨的動態，而更因他每有優缺空出，必向佛海絮聒要求，引起了佛海的反感。朱樸則後來鬱鬱不得志，卒離京赴平閒居。沈爾喬與王敏中，也始終不會因十人組織而與佛海的感情能更進一步。僅沈爾喬自梅思平辭去浙江省長後，一度以「民政廳長」代理「省長」。敏中則由「教育部」「內政部」次長而得到「江蘇財政廳長」的好缺。能始終參與佛海一部份機密的，僅有羅君強、周學昌與金雄白三人而已。以這樣的締盟，自然是同床異夢，貌合神離。又加着君強的專恣，因此非但未收團結之效，先啓彼此傾軋之端。再舉一個例來說：當第一個十人組織成立時，既預定於汪政權建立之日，各得一「次長」職位。而有一次十人組織在我與君強的寓所中商量汪政權建立後人事支配問題時，某人可當某部次長，都先有了一個擬議，獨獨沒

有定出周樂山担任什麼職務。樂山當時問了一聲：「我做什麼呢？」君強面色很難看，厲聲說：你最多能當一個「教育部司長」。這樣弄得樂山太下不了台，別的弟兄當次長，而他祇能當司長。幾天以後，剛好由重慶在滬地下工作者的勸誘，樂山在報上發表反汪宣言，悄然搭輪來港。但一到香港，也就無人理睬。他寫信給我又露了悔意，我向佛海一再解釋，得到了佛海的同意，又讓他回滬。他與君強是大夏大學的同班同學，又是十人結義弟兄，而最後君強當「安徽省長」時，樂山出任明光區專員，結果君強爲要表示他的「公正廉潔」，竟活生生地把樂山逼死。

(四三) 稅警團成爲內訌導火線

周佛海左右的十人組織，始終僅有形式，而且同床異夢，絲毫未曾發生過任何作用，以後甚至連聚商的形式也不再有了。在佛海的心理上，是未受其益，先受其累。其所以造成這樣的結果，羅君強應該負其全責，他既想包辦佛海的一切，他更想操縱這一個組織。其他的八個人都還無所謂，惟有李士羣則與羅君強是同樣抱有野心的人物，自不甘受君強的擺佈。最初士羣的加入，係由君強一手拉攏，那時士羣還不過是特工總部的副主任（主任是丁默邨），而且還處處受制於默邨，雙方磨擦得正不得開交。「警政部」他是「政務次長」，「部長」由佛海自兼，並不能讓他爲所欲爲。士羣正苦羽毛未豐，不能不找一個有力靠山。除了汪氏，佛海是最具實力的人物，君強一說，自然就水到渠成。

最初，君強幾乎沒一天晚上不到七十六號去，與士羣有時密談到深夜，有時以雀戰來作爲消遣，

雙方之間，表面上融洽無間，曾經有過一個時期，君強還拉着我同去。我所聽到的談話內容，不是各人炫耀過去的經歷，就是商量如何爲擴張勢力、排除異己的策略，而想排擠的目標便是丁默邨。君強此時真是出了全力向士羣表示好感，他先向十人組織個別疏通，在一次集會中，君強代表組織向佛海提出，要他培植幹部，把「警政部長」的位置讓給士羣。當着那麼多人的面，佛海怎麼好意思說不讓。不久，「行政院」會議中，佛海以無暇兼顧爲辭，聲請辭去「警政部長」兼職，並推薦士羣繼任。汪氏對佛海任何建議，一向言聽計從，這一個提案也就照例被順利通過。君強對士羣的這一份人情是賣足了，士羣也感到一時躊躇滿志。羅李之間，也僅僅在這一段很短的時間中，雙方都表現得十分親熱。

可是好景不常，不久情形就變，可能是士羣爲了見好於佛海，向佛海獻議，援宋子文長財部時創辦稅警的舊例，成立稅警團。他對佛海的說辭，以爲佛海在政治上有着無比的潛勢力，但沒有一個可以直接指揮的部隊。假如玩政治而不能掌握武力，無異築層樓於沙土之上。而且，上海是汪政權統治下的一個最重要地區，而又向無重兵駐防，要扼守這一個通向海口並控制南京的咽喉，需要有一支訓練優良與武器精良的軍隊。論佛海當時的地位，他不可能自己擁有正式軍隊，正好宋子文替他開了一個先例，大可援用。佛海對此舉，固然爲之心動，委任士羣來主持這一個計劃。但關鍵所在，不在汪氏而在日人，要實行這一個計劃，首先必須取得日軍的諒解。支持佛海的日本軍人，有汪政權的軍事最高顧問影佐禎昭，有駐滬日軍最高司令部「登部隊」的陸軍部長川本，以及佛海的密友岡田西次大佐。佛海向日軍交涉要成立稅警團的理由，固然爲了鹽政的緝私問題，那時太平洋戰爭還未爆發，上海僅有公共租界（實際權力完全操在英人之手）與法租界。英國在鄧荀克港大撤退之後，正在戒懼德

軍越過英倫海峽對英倫本島登陸作戰。法國又已經全境淪亡，在德國羽翼下貝當元帥領導的維琪政府，正不遑自保。英法都無力東顧，日本人又久想進駐租界，以攫取儲存在租界中的豐厚物資。佛海就針對了日本人這一個心理，他向日軍提出的理由是，租界必須收回，而租界究爲中國的領土，應該由汪政權出面交涉，交涉而英法不肯就範，則以武力進駐，成立稅警團最大的作用，就是作爲收回租界的武力。所以稅警團有成立的必要，而駐地應該在上海。日本人到底是容易欺騙的，更何況佛海更有入爲之與援，立刻得到了日軍方面的同意，而且答應供給較其他「和平軍」更新式更犀利的武器，人數也可以擴充到三萬人以上，等於三個正規師的兵額。

士羣的內心，則稅警團表面上是佛海的武力，既然由他來主持，實際上就成爲他自己的武力，於是派出了「第十師師長」謝文達負責籌備，地址也已選定了上海南市陸家浜原由教會所辦的清心女中爲團本部，在短短一月餘的時間中，一切已將次就緒。正在士羣再度躊躇滿志的時候，忽然遭到了一個無情的打擊，打擊他的人就是稱兄道弟如膠似漆的羅君強。

君強看清了士羣的心理，事實上，他也同樣覬覦着這一支實力，於是向佛海進言，以爲不宜以如此重要的任務，交給關係不深瞭解不夠的李士羣，一旦太阿倒持，勢將形成尾大不掉之局。佛海初意還不想使士羣過於難堪，遲疑不決，而經不起君強的一再喋喋，終於通知士羣把稅警團的籌備責任，移交給君強。士羣儘管心中萬分不願，但那時的力量遠遠不能與佛海抗爭，祇有俯首聽命。忙亂多時，結果成爲一場春夢！畫虎不成，士羣是恨透了佛海，也恨透了君強。

佛海自己兼了稅警團團長，君強擔任了副團長職務。除了向各地陸續招募新兵外，日軍更以中條山作戰中俘虜而來的一批國軍精銳，移交給佛海，作爲基本隊伍，並供給了最精良的配備。復在南京

丁家橋「中央黨部」附近，成立了稅警團幹部訓練班，營長以上，一律須先受訓。我被拉去作了三個月的政治教官，講授租界沿革、洋涇浜章程以及有關租界內各種必要知識。如此轟轟烈烈的幹去，更使士羣爲之痛定思痛，而成爲最後火拼的導火線。

那時佛海又突然加委了熊劍東爲副團長（熊於勝利後經政府收編，後在江北與共軍作戰陣亡）。劍東原是國軍江蘇常熟一帶的游擊隊首領，作戰勇悍，又是一個日本通，後被俘向士羣投誠，而士羣又不能加以重用，兩人之間，本已時多齟齬。於是君強乘機把他拉了過來，推薦給佛海，就委任他爲稅警團的副團長。這一下使士羣更如火上添油，從此各走極端，士羣也終於招來了殺身之禍。

周佛海對李士羣數年之中的盡力培植，而且把「警政部長」的位置相讓，卻抵不過一次稅警團籌備工作的予奪。兩人之間，從此劃出了一道很深的鴻溝，尤其士羣對羅君強恨之次骨。不過那時士羣頭角初露，尙不敢對佛海公然反抗，僅在背後時常發洩他的滿腹牢騷。

士羣知道佛海左右，有君強在，論疏不問親之理，他終將不能成爲佛海下面的第一紅人。一方面他仍與佛海在表面上敷衍，而暗中卻直接在密謀博取汪氏的歡心，尤其對陳璧君曲盡其聯絡的能事。一次陳璧君赴粵，士羣即選取一批最新式犀利的槍械，呈獻她作爲她的衛隊佩帶之用。士羣的決心脫離周系而改入汪系，時機已漸趨成熟。但佛海爲人比較率真，對於士羣的暗中進行竟毫無覺察。

(四四) 關於清鄉的一幕爭奪戰

記得那是民國三十一年初夏的一個晚上，我到南京頤和路一號羅君強家裏去，會客室中正坐滿了

許多人，現在我只記得有周學昌在。一進門，就聽到君強大聲的談笑，那天他顯得興緻似乎特別好。他看見我進去，又放出了器小易盈的一副狂態，他對我說：「你來得正好，你是不是來向我道喜？」我卻如丈二和尚，完全摸不着頭腦，只呆呆地望着他。君強又說：「汪先生今天要我談話，決定成立『清鄉督辦公署』，我就是第一任的清鄉督辦。今後，我既是羅委員長（指他的邊疆委員會職務），又是羅督辦了。哈哈……哈哈……」他的這一分得意，大有忘形之概！忽然，他又接着說：「我們正在起草督辦公署的條例，你是法學家，來幫忙參加一些意見吧！」我一向討厭他的迷於權位之思，唯唯地只隨口敷衍了幾句，就托辭引去。

日軍佔領東南地區以後，其力量只能勉強保持幾個重點，至面與線，都是游擊隊活躍的地區。日軍爲了本身的安全，故向汪氏提出建議，實行清鄉辦法，汪氏也正想把淪陷區軍隊的行動權掌握在自己手裏，尤其就心蘇北的共軍已在坐大，此舉正合他的意思，於是欣然予以接受。因爲君強在辦理稅警，又是佛海的心腹，所以把這一項任命，內定落在君強身上。而君強又一向好大喜功，認爲清鄉可以表現他的能力，增高他的權勢。無怪其如此地興高采烈了！以後我回到了上海，並沒有去問訊清鄉的事。我只約略知道君強在全力進行，內部人事的安排，各方面兵力的佈置，都經詳細規劃。在君強計劃中的清鄉機構，將是一個相當龐大的組織。

不久，我被派出席在廣州中山紀念堂舉行的東亞新聞記者大會。我由滬搭機赴穗，住在愛羣酒店，整天忙於開會、演講與酬酢，對這一件不相干的事，已幾乎完全忘記了。就在會期的最後二天，我突然接到了君強的來電，電文很簡單，僅有「要事待商，會畢即返」八個大字。我一時想不出有什麼大事發生。本來預定大會閉幕後，還有赴翠亨村瞻仰中山先生故居等許多節目，我担任着代表團團長

的職務，按理需要參加的，但爲君強來電的關係，我一等大會閉幕，就匆匆地搭機返滬，而且覆電告訴了君強的歸期。事情也真不湊巧，飛機由廣州降落台北，在機場午餐以後，再度起飛時，飛行還不到五分鐘，發覺機件損壞，機身搖搖欲墮，幸而那時離機場還近，趕緊折回緊急降落，幸未出事。但是台北沒有所需要的零件，要由東京運去，我們停留在台北兩天之久。等我抵達上海時，君強已經去了南京。他留着信要我一到上海，當日搭車赴京，我也來不及稍息征塵，又冒着酷暑連夜趕去。

當君強見到我時，面色很沉重，把我在赴穗期內的一段發展詳細告訴了我，最後要我表明態度，而且希望共籌對策。他的口吻並不像友誼的商酌，很有些咄咄逼人之勢。我當時有些難過，也有些氣憤，但我仍然壓抑住我的衝動，還希望能夠從中調解。

事情是這樣的：當二十九年君強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攘奪了李士羣所發動所籌備的稅警團以後，面子上既予士羣以極大的難堪，實力上也給士羣以無情的打擊，士羣是怎樣也咽不下這口氣的。君子報仇三年，雖然從此起與君強之間，早已形迹疏遠，不相往返，但到底還沒有發展到真正火拼的階段。清鄉的事，剛好給士羣以一個反擊最有利的機會。

那時士羣已經贏得了汪氏夫婦的信任。從汪氏那裏，他也知道了清鄉這一回事，於是向汪氏進言，認爲清鄉是汪政權建立後首次的也是最大的一次軍事行動，地區遍及汪政權統治下之蘇浙皖三省全境，軍力將牽涉所有的「和平軍」，茲事體大，不宜大權旁落，過份信任別人。他建議改「清鄉督辦公署」爲「清鄉委員會」，由汪氏親自主持其事。士羣的話也的確言之成理，汪氏果然爲他所說動。而士羣進言的初意，目的僅在破壞君強，尙不敢存取而代之意。

不料汪氏既對士羣既已存有好感，又經陳璧君的暗中相助，汪氏竟通知了君強，停止「清鄉督辦

公署」於籌備，明令成立「清鄉委員會」，自兼委員長，以陳公博、唐佛海分任副委員長，而以李士羣担任秘書長，並且將秘書長辦公處設在那時江蘇省會的蘇州，就近規劃指揮封鎖游擊區以及進擊游擊區的軍事行動。汪氏自然無暇兼顧，士羣的實際權力，乃超過了「江蘇省長」，而且又成爲士羣以後兼任「江蘇省長」的資本。士羣這一手的反擊，與當年稅警團的爭奪，有異曲同工之妙，一下手就把君強打擊得一敗塗地。君強來電的所謂要事，原來僅僅是如此這般而已。

(四五) 我處身在內訌的夾縫中

士羣那時還不過三十六七歲的年紀，年少氣盛，於志得意滿之餘，犯了一個最大的錯誤，他如僅以羅君強爲磨擦的對像，或者還不至於有以後的結局，他以爲時機成熟，更進而對陳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都展開正面攻擊，樹敵既多，而卒召來了殺身之禍！

原來那時上海的報紙，一共有七家，即：日軍直接經營的「新申報」；由日海軍管制的新聞報（社長李思浩）與申報（社長陳彬龢）；汪系的「中華日報」（社長林栢生兼）；周系的「平報」（社長金雄白）；興亞建國系的「新中國報」（社長袁殊）（事實上是共黨地下份子潛伏的機構，如社長袁殊，經理翁永清，總編輯魯風，以及後爲「解放日報」社長的憚逸羣等，無一非中共人員），以及李士羣系的「國民新聞」等。國民新聞由士羣兼社長，而以胡蘭成（前爲林系人物，曾任汪政權「宣傳部次長」，後附李，現在日本）黃敬齋爲副社長。胡蘭成又兼主該報的筆政。而上述七家報紙中，

周佛海卻兼任了「平報」「新中國報」與「國民新聞」三報的董事長。

也竟然就在周佛海所担任董事長的「國民新聞」上，以社論毫不諱飾地猛烈攻擊了周佛海與梅思平等如何生活腐化，如何措施不當。這無異擱了周佛海一記。在社論發表後的第二天，士羣還用長途電話給在南京的周佛海，說他在蘇州，文章是胡蘭成寫的，事前他未曾過目，要求佛海諒解。（而胡蘭成則告訴別人，社論是陶希聖所留下的學生鞠清遠寫的，不過經他看過而發排。）佛海當時在言語上並沒有追究到責任問題，僅僅輕輕悄悄地說，既然在報章上發現了攻擊我的文字，我當然無顏再担任董事長了。事態弄得很尷尬，但還並沒有達到惡化的程度。而君強則認為士羣已背叛了十人組織，背叛了佛海，他移花接木地把清鄉的目標移到「國民新聞」的事件上去。希望十人組織中人對士羣起而攻。他要我提前回來的目的，就是要幫他一起幹士羣。

我聽了君強的長篇經過以後，我也看到他的劍拔弩張之狀，我相信兩虎相鬥，最後必有一傷。我不忍見自相殘殺的事情出現。因此我沒有正面答覆他要我表明態度的話，我嘆了一口氣說：「想不到這半月之中，還有那麼多的不幸事件發生。士羣的公開抨擊周先生，使親痛仇快，無論如何是錯誤的。但是我卻發生了一個感想，覺得這是一個不祥的預兆，「政府」成立不過二年，而一切現象，何以酷似南明與洪楊的兩個時代？大人先生們動不動高張盛筵，窮奢極欲，又往往召名伶演劇，繼續至數晝夜，這樣的粉飾太平，醇酒婦人，與馬士英、阮大鍼輩在南京迎立福王之後，有什麼不同？現在更索性發展到洪楊定鼎金陵以後，立刻展開了同室操戈的內訌，我不忍再見楊秀清與韋昌輝的事重演於今日！國難至此，我認為還是息事寧人，大家來調停和解吧！」我的這一席話，自然不能為君強所接受，而且還疑我是偏袒着士羣。

我在南京留了三天，又搭車回滬。車次蘇州，我正坐着看報，忽然有人向我肩上一拍，我回頭一看，卻是士羣，他向我招招手，要我到他的包房中去。他與汪曼雲正一起由蘇州上車赴滬（汪曼雲那時任「清鄉事務局」局長兼清鄉委員會副秘書長，爲士羣之助）。我隨着他進入包房。方才坐定，士羣板起面孔說：「好！我接到情報，你從廣州一回來，就連日在君強家裏閉門密商，將合而謀我，莫怪我不念弟兄之情，我要不客氣的先對付你了。」我聳了一下肩膀說：「假如如此事，做了也就無須隱瞞。但是我卻可憐一個從事於特務工作的領袖，對近在咫尺的情報，尙且如此其誤謬！」士羣又說：「假如你認爲我的情報不確的話，那末，我倒願意聽聽你對此事的態度與立場。」我說：「我先願意問問你，當年我們的十人組織，爲的是什麼？我相信你不會否認：組織十弟兄的眞意，在擁周原則之下，則我們是弟兄；不擁周，就回復到通常朋友的關係；假如有人反周，將是組織上的敵人了。你與君強鬥，不應當以槍口移向周先生。沒有他，你以一個重慶時代的中尉，何以能於數年之間，身登『部長』寶座？如此的不分恩怨，至少已使朋友寒心！這是我的態度，但我既沒有對付你的力量，也不想捲入箕豆相煎的漩渦，能勸則勸，不能勸就置身事外，這不是我向你示弱，這是我自己應有的立場。」士羣想不到我說的話會如此其硬直，他反而放下了示威的態度，又拍了我一下肩膀說：「好！你沒有被我嚇倒，你倒不失爲一個好漢。我並不想與周先生開火，只要他今後在金錢上放鬆些，我將仍如以前一樣的擁護他。」我說：「但國民新聞的社論，無論如何是錯誤的。」士羣說：「事前我真沒有看到，事後又已向周先生解釋，我不負這個責任。」我說：「我佩服你身爲社長，倒推得一乾二淨。」火車已經抵達了上海北站，我們也在彼此苦笑中結束了這一次的談話。雖然這事並未影響到我的本身，但羅李雙方之間，都以爲我是左袒着對方，我很煩惱，煩惱處身於內訌的夾縫之中。

(四六) 李士羣是怎樣被毒死的

以後，我就懶得再過問羅李之間的爭端。但我從間接方面知道，雙方演變得已到了短兵相接的程度。羅君強以稅警團做武力，李士羣以七十六號的特工爲工具，各有欲得而甘心之勢。士羣的左右，自然慫恿士羣於鬥爭中獲取勝利，脫離佛海的控制，君強的牽制，獨樹一幟。唐生明、黃敬齋等都會發出最激烈的反周言論。君強則引熊劍東與袁殊爲心腹、爲謀士。這兩人都是由士羣那裏改投到君強方面的。我每次到上海霞飛路可的牛奶棚對面君強家裏去的時候，看到牆內花園四週，放了步哨。我們在室內談話時，門口就站着兩名武裝衛士。這嚴重的形勢，從日本人進入租界，上海暗殺事件停止以後，是從來所未有的。我知道君強是在防備士羣的突襲，恐懼士羣會隨時派人去暗殺他。

有一天，我到居爾典路佛海家裏去，忽然佛海與我提到了士羣與君強間的問題，我就見聞所及的情形說了一說，而我的結論則認爲如此演變下去，徒然給外人好笑。佛海對士羣倒並沒有怎樣的成見。我說：「即使你並不偏袒任何一方，但因爲你與君強的關係較深，你不表明態度，已經可以使士羣懷疑到你在暗中支持君強。我希望你能制止事態的惡化，讓雙方平心靜氣地先把理智恢復。」佛海恨恨的道：「君強一貫幼稚的行動，怎樣說也改他不過來，你替我去罵他，叫他不要再胡鬧下去。」我笑笑說：「君強現在的氣燄，我還敢去罵他嗎？」於是佛海取出了信紙，一口氣寫了八大張，要我送給君強，信裏對君強責備得很嚴厲。當我送給君強時，我發覺他一面讀，一面臉上一陣陣地泛出了奇

第二天我又到了佛海家裏，佛海拉着我到他的臥室中去，他說：「君強什麼都不好，但對我到底是忠實的。」說着拿出君強的回信給我看，佛海在信上已經用紅筆劃出了最主要的一段，我記得信上的大意是「……我受你一手提拔，終身願供驅策。所做一切，也只是爲你，假如你對我印象不好，我將全無生趣，假如有一天你不要我了，我願意自殺！……」佛海似乎很爲這幾句話所感動。當然我也不便再表示意見，不過，我心裏在暗笑。

事情經過了已經一年，風波終未平靜。三十二年的夏天，我由滬赴京，行前的晚上，我與耿續之同到了士羣家裏，他正在打牌，看見我去停了下來，很輕鬆的與我談了一陣。怎樣也想不到這一次無異在與他訣別。我抵京的第三天，清早我還睡在銀行的臥室中時，一位行裏的同事來喚醒我，告訴我報紙上登出了李士羣暴病身亡的消息。我與士羣數年來相處還不壞，在情感上使我非常悲悼！但是我萬想不到他竟然會是給毒死的。

以後黃敬齋告訴我的經過是這樣的：士羣在我離滬的第二天，虹口的一個日本憲兵隊長岡村中佐請到他家晚飯。那時七十六號與日憲之間，也有着不少派系上的磨擦，日憲與士羣之間，相處也並不很好，如對警衛隊長吳四寶的被逼下毒斃命，就是一例。雖然那個憲兵隊長與熊劍東有着很深的關係，卻並沒有引起士羣的懷疑，尤其因爲彼此常有不愉快的事件發生，士羣更不能不去敷衍。晚飯並沒有別的賓客，也並沒有談到什麼重要問題，表面上僅是聯絡感情的杯酒言歡，兩人且不斷在以啤酒舉杯勸飲，又食着同一碟中的菜餚。宴會已將終了，廚房裏送出了一碟牛肉餅，憲兵隊長特別鄭重介紹，這是他妻子親自做的，希望士羣能試試他妻子的烹飪手段。士羣食盡了這一碟牛肉餅，才告辭回去。

第二天又回到了蘇州。當晚士羣還要出席一次宴會，把衣服都穿好以後，忽然感到頭暈，用體溫表一量，已發生了高熱。等扶他到床上時，竟大量不停地流汗，遍體淋漓，病勢顯得很嚴重，趕緊請當地日本駐軍師團的軍醫來診治，說是中了一種細菌毒，搖着頭表示出絕望的意思。士羣的汗水就像雨水那樣地從體內滲出，黃敬齋的太太金光楣與士羣的太太葉吉卿，在旁服侍，轉瞬買來的幾打乾毛巾，一條一條的爲他揩拭得濕透。這時士羣自己也知道中毒，他說：「我是一個特工人員，竟然不能覺察到這一點，以後尙有何面目主持特務工作！」屢次要家人給他一枝手槍護他自殺，家人除了勸慰也別無他法。後來又請了平時爲他治病的儲麟蓀醫生爲他診治，竟然不知患的是一種什麼病症，無從下藥，只有灌注鹽水爲治療之計。一天餘時間的輾轉床褥，直至體內的水份排洩盡了，才一瞑不視，整個軀體縮得又小又癯，變成一個孩子模樣了。

據事後的推測，這事是熊劍東與日本憲兵隊長的合謀。進食的毒物，是在最後的牛肉餅中，而所下的是一種細菌，服食後二十四小時以後毒菌進入血管，才會發作，一發作即無藥可救，將體內水份大量排洩，直至死亡爲止。因爲實施的是日本憲兵隊長，自然沒有人敢追究此事。

勝利以後，羅君強在南京高等法院受審時，供認李士羣是他主謀毒死的，他說：「翦除汪政權的特工首領，是他從事地下工作表現之一。」我很懷疑他的供辭，因爲我深信佛海確沒有置士羣於死地之意。君強不經佛海的同意，是否敢貿然出此？是不是君強在法庭上的供辭，意在邀功，以求末減？

(四七) 隔室中傳來的一陣哭聲

八一三全面抗戰以後，雖然國軍節節由淞滬先退南京，再退漢口，最後退至重慶。但對東南心臟地區的上海，並沒有完全放棄。在太平洋戰爭以前，藉着公共租界與法租界的掩護，地下工作人員還在積極活動，有關政治、經濟、金融、文化等一切，仍然在暗中指揮控制。雖然地方軍政人員已全部隨軍後撤，黨務方面，潘公展童行白等也先後轉至後方。但重慶在上海有着一個統一委員會，詳細的名單，不得而知，就所知道的有杜月笙、徐寄廬、蔣伯誠、吳開先等人在內。每當上海有一個問題發生時，就近集商處理。對外出面的是蔣伯誠與吳開先。尤其吳開先雖然行踪極端秘密，但時常以電話向有關方面聯絡，還與若干較為接近的人預約見面，因此也引起了日軍方面的極大注意，對蔣吳兩人，乃佈置了廣大與嚴密的偵查網。結果，兩人都先後爲日憲所逮捕，而最後都經周佛海全力奔走營救，蔣伯誠因病在纏綿床褥之中，終得恢復自由；吳開先迭經兇險之後，竟能專機送往抗戰區的邊界，安返重慶。蔣吳爲潛伏於淪陷區的最重要之人物，日人久欲得而甘心，百計偵察，始得成擒，卒又縱之而去，其捉放經過，會引起淪陷區的街談巷議，也使抗戰區震驚疑愕。其曲折的內幕，局外人自不易明瞭其真相。事隔十餘年，蔣伯誠既已病歿上海，吳開先迄猶閒居台灣。這兩件鉅案中，至少可以說明汪政權中人，還不是如世人所想像的那樣惟知媚敵，而叫着「和平」的人，還不至於對抗戰抱着真正的敵對態度。同時，我也感到日本人在戰爭時期，狂妄得意之中，處處顯出其愚昧與無知。

吳開先是江蘇省青浦縣人，上海大學出身，那裏是共黨最早的溫床，因此吳開先也很早就加入了C.Y。北伐以前，國民黨的上海市黨部還在陶爾斐斯路時代，當時的委員有吳稚暉、鈕永建、葉楚傖、邵力子、柳亞子等人，吳開先僅是交通科的一名幹事。國民革命軍底定京滬之後，在實行清黨以前，青浦籍的一名共黨主要份子高爾柏出任了青浦的首任縣長。吳開先也回到了家鄉，佐之任縣政府秘書，他曾經「轟轟烈烈」地以共黨手法，率領了羣衆，用打倒土豪劣紳爲名，把認爲土劣的，上門打得落花流水，使地方秩序，一時陷於極度混亂。清黨開始，吳氏轉變了，在上海民國日報上登載了一篇反共文章，又回到市黨部，擔任很長一段時期的組織部秘書。自民十六到二十六年抗戰爲止，十年之間，市黨部內部糾紛疊起，重要人員，此起彼仆，冷欣、冷雋、陳德徵等先後離去，惟有吳開先自幹事而秘書，而組織部長，步步高陞。一面得到CC陳立夫的賞識，又曾經一度擔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一面又能拉攏上海的地方勢力，與杜月笙有水乳交融之狀。他先後兼任了上海市社會局長、教育局長等職務。上海先後發生的幾起大工潮，如法租界水電工潮，如英美烟公司工潮等，他都能與杜月笙合作，有過左右全滬的出色表演，手法所及，能使資方知所感激，也使勞方帖然就範。聲勢之盛，滬人且稱他爲上海的黨皇帝，這是何等的威風！

在東南淪陷之後，因爲他熟悉情形，繼續潛伏在上海租界內工作，各報社時常接到他打來的電話，指示登載新聞的應取態度，譬如「中央儲備銀行上海分行」開幕時，申報與新聞報，本已決定接受刊登此項廣告，但吳去電話以嚴厲的口吻制止，始未實現。

那時他住在極爲冷僻的法租界麥尼尼路的一所幽靜的小洋房中，深居簡出，非最有關係的人，不會知道他的居處，也不可能探索到他的行踪。但是由於他的百密一疏，終於俯首入甕。原來爲他供差

遣的一名男僕，原是市黨部的多年工友，人家都叫他「癩痢頭」的，熟識他的人多，又有一顆明顯的癩頭做特徵，日本憲兵就以此爲綫索，派人跟踪，於短時期內，就很容易證實了吳開先潛匿的處所，終於一舉成擒了。吳被捕後，由日憲寄押在「七十六號」偵訊。那事大約發生在民國三十一年春間，正確的日期，我已記不真切了。

吳開先被捕的消息，報紙上固然並未發表，連我耳目較近的人，竟也一無所知。那時周佛海還住在愚園路一一三六弄五十九號（以後在居爾典路自營新屋，和平前也一度遷住過畢助路），一天，我去看周，一進屋，看到會客室的門緊閉着，門外立着萬里浪，手裏還握着一枝轉輪手槍，情形顯得有些異常。萬里浪本是軍統的重要份子，投降「七十六號」以後，在李士羣手下担任行動隊長之一，以驍勇兇惡著稱，民國二十九與三十兩年中，寧渝雙方展開特工戰時，汪方所做的暗殺事件，以吳四寶、林之江、夏仲明、潘達與萬里浪五人表現得最爲出色（萬里浪於和平後，又轉爲軍統工作，對拘捕汪政權中人異常賣力，免死狗烹，不久，萬亦爲軍統拘押槍斃）。以一個行動大隊長來握槍守衛，而且萬里浪平時非召見，是不到佛海那裏去的，他的突然出現，可知一定有着嚴重的問題。我問立在梯邊的佛海的副官，他說：「部長在會客。」我問：「是誰？」他搖了一下頭。我爲好奇心所驅使，就走進隔室去坐候，鄰室的門緊閉着，只隱約聽到一陣輕微的對話聲，完全分不出談話的內容。突然，又傳來了一陣哭聲，起初還是嗚咽，後來竟轉爲嚎啕，我只聽出一個是佛海的聲音。接着又唧唧噥噥了半天，鄰室的門開了，看見吳開先在前，周佛海在後，從客室中出來，兩個人的眼圈還是紅紅的，佛海一直送他到門口，用哽咽的聲音說：「放心！我會盡我一切可能的力量。」佛海目送萬里浪押着他上汽車疾馳而去。我不必再問佛海，目擊的一切，已告訴我吳開先是被捕了。

(四八) 吳開先被捕與回渝內幕

吳開先羈押在「七十六號」，因為他是重慶派在上海最重要人物之一，又是日本憲兵直接拘捕的要犯，關防特別嚴密，除了審訊人員以外，一概不准接見。最早被派審訊吳開先的是陳恭澍（陳本爲軍統派在上海的特工區區長，後向七十六號投誠，爲立功計，曾著有「藍衣社內幕」一書，揭穿軍統內幕。和平後又爲軍統工作，逮捕汪政權人員結束後，陳亦瑯墮入獄，羈押於上海提籃橋獄，後軍統又責其戴罪圖功，予以保釋，共軍南下前來港，現仍留此）。「七十六號」對於吳開先，與其說是審訊，毋寧說是說服，主要還是希望他爲汪政權工作。在那時的特工戰中，除非行使暗殺，一槍打死。如被拘捕，只要一聲投降，非但立時出獄，而且可以立致高官。如民國二十九年江蘇省黨部重要人員掌牧民、石順淵、周孝伯、馬元放等被張北生出賣，在上海跑馬廳畔旅社中打牌時捕獲，以後都受到優待，而且先後擔任了相當重要的職務。馬元放雖始終不屈，也由周佛海百計縱之歸渝，受到重慶當局的重視，而且被選爲中委。吳開先於受鞫中的態度，最初還是相當強硬，當陳恭澍審問他時，他左一聲陳區長，右一聲陳區長，區長是陳恭澍在軍統中的職位，吳開先這樣叫他是意在諷諷，弄得陳恭澍啼笑不得。他被羈禁在「七十六號」二門內右側拘留所的二樓，一次會要吞金自殺，另一次當提訊下樓時，他想跳樓，監犯求死，當然並不容易，開先也真能表演。投汪的舊日市黨部同事，很多人，都爲他奔走營救，中間尤以原市黨部委員汪曼雲與蔡洪田兩人出力尤多。曼雲屢次要求李士羣讓他與

吳開先談一次，而格於日人的監視嚴，無法通融。最後，士羣下了一個條子，表面上是派汪曼雲去審問，才算得見了，彼此都有家國之痛，兩人一見面又是一場抱頭大哭。但是以曼雲的力量，除一見以外，其他已無能爲力。李士羣也屢次親自提到辦公室中談過幾次，且以最客氣的態度相待。上有周佛海的關照，下有汪曼雲、蔡洪田的請托，因此吳開先除失去自由而外，並沒有受到其他不合理的待遇。

日本人對吳開先的態度，是非降即死，佛海爲此，感到非常棘手。他屢屢向我談到這一個問題，我說：「解鈴繫鈴」，沒有日軍的諒解，一切都是徒然，他爲重慶工作，而你雖是主持「中央特務委員會」的人，但拘捕他的不是「特委會」下的「特工總部」（即七十六號的真名），而是日本憲兵，必須先有一個正大的理由去說動日憲，才能保全開先。佛海當然比我更明白關鍵所在，但一時想不出打動日憲的說辭，他無限徬徨，爲了緩和嚴重的氣氛，也爲了遠離日人的監視（七十六號內有日軍顧問，而且有一部份日憲常駐），因以李士羣大部份時間在蘇州辦公爲理由，把吳開先移解到蘇州特工站拘禁，說是爲了便於隨時提訊。從此吳開先得到了進一步的優待，事實上也渡過了最危險的時期。飲食是每餐由汪曼雲的太太烹製送去的，夏季的冷席與風扇也由曼雲爲他預備。吳開先的態度也比較緩和多了。他表示如邀開釋，不擬担任汪政府的職務，但可以在黨務方面盡一些力。經過了一段時期，終於佛海想到了營救他的藉口，他針對日本人希望全面和平的心理，而且經過司徒雷登等的向重慶當局進言的失敗，又鬧了在香港與假冒的宋子良談判的笑話。於是佛海向那時汪政權的最高顧問也是最有名的人物影佐禎昭說：「既然日本想和平，就不宜與重慶在軍事以外，過份敵對。吳開先是重慶派在上海比較重要的人物，殺之徒激重慶之怒，強其歸降，亦並無適當位置可爲『政府』之助，不

如釋放他以示寬大。」經佛海再四再三的說，幾經波折，竟獲得了日方的同意，吳開先出乎意料的恢復自由了。

他住到了南京汪曼雲的家裏，每天受到舊時朋友們的熱烈招待，他那時內心感到友情的溫暖，朋友們禮貌上稱他爲吳先生時，他總是表示謙遜地說：「不要客氣，叫我開先好了。」佛海更先向汪氏爲他先容，說一時並無適當的職務可以位置他，不必強其出而任事。汪氏曾經召見過他，除了對國家當前的處境彼此慨嘆而外，反而對吳開先加以無限溫慰。他最受窘的一次，不在被捕審訊的時候，而是在恢復自由之後。一天，他在我那裏午飯，飯後無聊，他與我以及其他兩個朋友去逛中央市場，剛到門口下車，正好陳璧君從內出來，吳開先不能不上前恭恭敬敬地鞠了個躬，又叫一聲汪夫人。不料陳璧君望了他一下，瞪着眼道：「吳開先——你好！你也會有這一天。我自有一獨立的人格，以後除在我家裏外，應當稱我做陳委員，記住了！」說着回身走了，我看到他面上紅一陣白一陣，而又不敢回一句嘴，這味道也確屬難受。

吳開先閒住在南京，除飲食徵逐而外，也實在無事可做，他屢屢向佛海表達了返渝的希望。這一件事，太困難了，而只有佛海竟然又向影佐去說：「留吳開先在此，一無所用，欲求全面和平，與其走許多不正確的冤枉路，不如把他送回重慶，讓他把目覩的一切，向當局面陳，也可以把汪先生與日方的意思，代爲轉達，這是求取全面和平的一個捷徑。」周佛海當然明白，以吳開先的地位，無論如何不會發生那樣的作用的，而影佐卻以假作真，又立刻予以同意。當一切問題決定以後，影佐還約定了開先作最後一次的談話。不料也許由於他的過份興奮，先縱飲而後赴約。入坐方定，影佐剛開口，吳開先竟哇的一聲，當面嘔吐狼藉。影佐勃然大怒，以爲他在故意侮辱，且竟欲殺之爲快。這又苦了

佛海，一再疏解，又復化險爲夷。三十二年秋，吳開先到了上海，我們幾個朋友右親者汪精衛，何消息，和平以後，他又榮任上海市社會局長，我沒有去見過他，直到共軍南下，他也逃來香港。一次我往廣東銀行陪朋友開啓保管箱時，看到他在那裏開箱。他正在聚精會神地檢點他的財寶，我想到了佛海當時爲他奔走的情形，有些惘然，我又恐他見到我發現了他的財產秘密時又一次受窘，我沒有上去招呼他。

（四九）日憲兵救了蔣伯誠一命

代表重慶隱伏在上海租界中工作的，論當時的位望，吳開先固遠不如蔣伯誠。迨吳開先返渝以後，因係由日軍公然派機遣送，形迹上就頗有嫌疑，故所受當局的重視，且遠不如馬元放（馬返渝後，值國民黨舉行全國代表大會，馬以在淪陷區捕放之經過，著書散發，竟膺選爲中央委員。共軍南下後，聞已被殺）。日人對吳開先寄以赴渝後爲和平作伏線的幻想，亦始終沒有發生過絲毫影響。重慶的一切，日本人的不清楚，固無怪其然，但如何瞞得過周佛海？佛海明知開先在國民黨裏的地位，不可能發生如此的作用。他的對蔣，即使蒙召見，連當面提出的勇氣，事前也斷定其不會有的。而佛海爲了公誼私交，奔走數月，全力担承，爲之疏通說項於汪氏及日軍之間。沒有佛海的營救，恐吳氏之屍骨早寒；沒有佛海的迴護，吳氏恐難免於落水。但當和平以後，佛海殞死監房，其由渝復員之故人中

，如陳布雷、陳方、許孝炎、雷嘯岑、易君左等，或親往獄中探問，或代爲經紀其喪，不避怨謗，不徇無限！現吳氏借其夫人吳淑芳女士養晦台灣，猶得享優裕之生活，其公子等也以他半生宦囊之所積，赴美深造。往者已矣！南京永安公墓蠻煙荒草間，佛海地下有靈，其亦將欣然于有造故人耶？

吳開先案一波方平，不料一波又起。民國三十三年仲春，爲蔣先生代表之蔣伯誠，忽於病亟之中，又爲日憲所逮捕，且同案株連者有杜月笙之心腹萬墨林（現居台灣）夫婦，有上海市黨部委員王先青與毛子佩（王現在台，毛留大陸），有蔣伯誠之夫人杜麗雲女士（前名女伶，現又在大陸登台演出），幼子字鈞（現在台）等多人。案情且更較吳開先爲嚴重，而羈押、審問，又歸諸滬南日本憲兵隊（卽貝當路憲兵隊，地址在美國學堂）直接辦理。案發，中樞密電佛海以營救之全責，在如此情形之下，佛海則殊有鞭長不及馬腹之苦。吳開先一去既無消息，更將以何種說辭，代向日人緩頰？佛海那時的徬徨之情，真有非筆墨所能形容其萬一者。

蔣伯誠，浙東人，在國民革命軍北伐初定東南時，曾一度代理浙江省政府主席。韓復榘主魯，又以蔣先生之私人代表資格，常駐濟南，甚著勞績。東南淪陷之後，密藏於萬墨林法租界西蒲石路之新居，從事地下工作。那時蔣氏以高血壓症，早已半身不遂，終年偃臥床榻，但以那時主持上海市黨部暨三青團之吳紹澍常留皖境屯溪，在滬指揮之責，托之蔣氏（吳紹澍於和平後出任上海市副市長。大陸易手，任中共「交通部參事」，現已久不聞其消息）。

日憲對蔣伯誠之行踪，偵察已久，以後如何獲得線索，自非我所能知。據事後蔣氏告訴我，當他爲日憲破獲之日，他以血壓劇升，神智昏迷，已陷於彌留狀態。正延請經常爲他診治的趙啓華醫生施

救（一說蔣之所以被捕，係日憲跟踪趙醫生而得）。趙醫生主張非抽出血液一百CC以上，將不能挽救其生命。而蔣之家人，恐其失血過多，影響體力，堅執最多抽血五十CC。正在爭持不下中，而日憲掩至，全室各人，均被一鼓成擒。日憲目覩蔣氏病狀危急，立以電話召軍醫馳至，不問情由，爲他一舉而抽血兩百CC，蔣氏竟得悠悠復甦。日憲又以其病重，即派兵在其住宅看守，復得免拘解至憲兵隊受鞫之厄。以後蔣氏一再向我說：假如日軍來遲一步，不抽出那樣多的血液，可能腦部充血，血管破裂，可以立時送命，捕之乃適所以救之也！

我一生最厭惡特務工作，避忌唯恐不遠，所以任何有關這類的機密事情，除非以耳目較近，偶然得之幕中人的轉述，否則便會近在咫尺之間，而竟會懵然一無所知。吳開先之被捕如此，蔣伯誠之出事又如此。第一個告訴我這消息的，反而是平時與此毫無關係的張善琨（張那時担任中日合作的中華電影公司總經理）。

事情大約已經在蔣案發生一兩月之後。一天佛海打電話邀我當晚到他的居爾典路寓所去晚飯，因爲這樣的事是常有的，我完全不以爲意。我準時而往，除了平時與佛海較近的幾個常客以外，並無外人。所不同的是那晚餐廳中竟爾星光燦爛，笑語喧闐。大約當時「華影」的紅星，幾乎全部到齊。似乎李麗華、陳雲裳、周曼華、白光、王丹鳳、周璇、歐陽莎菲、李香蘭等都在。而佛海那天左顧右盼，情緒異常輕鬆。飯後在花園的草地上放影「華影」剛拍好而尙未公映的歌舞片「萬紫千紅」，片由李麗華與最近訪滬的日本東寶歌舞團合演。我在觀影的時候，張善琨剛好在我身旁，我問他今天何以會有這樣的盛會。善琨偷偷地告訴我：「難道你不知道蔣伯老被捕的事？」我搖搖頭。他繼續說：「蔣伯老被日本憲兵拘捕了，因爲我與他平時有來往，日憲在他寓中發現了我給伯老的函件，因此我

也受嫌牽連，被拘押在貝當路憲兵隊。幸經周部長保釋，今天的宴會，並且請了公司中的明星作陪，就是爲了表示對他的謝意。我說：「那末現在蔣伯老呢？」他說：「他關在別的地方，我不知道。」我說：「在憲兵隊與你一起的還有些什麼人？」他說：「我認得的只有嚴譯聲（即新聞報之小記者）與毛子佩。」這一席話，我才知道蔣伯誠被捕的事。其實，那時我還完全與蔣氏並不相識。

（五十）保證人所負的兩項責任

事有湊巧，當天晚上，我於飯後回到報社去，忽然唐大郎（即唐雲旌，專爲小報撰稿之洋場才子。中共進至上海後，在新民晚報工作。）來電話，告訴我毛子佩被捕的消息，希望我能爲他出力營救，我告訴他此事剛剛才聽到張善琨所說，讓我從旁探明情形後，再爲相機行事。

爲了接連兩個人的談話，引起了我對此事的注意。翌日，我因他事去看佛海，順便問他蔣案的情形。佛海說：「伯誠的案子很麻煩，各方面都希望我從速爲他設法，即以他的病軀而論，就已覺得十分可慮。我與他爲當年的票友，論公論私，都不容袖手，但他不是一個普通的人，日憲兵已將全案呈報東京，非得軍部的同意，當地的日軍且無能爲力。我祇有盡我所能，一切看他將來的運氣吧！」我又提到了毛子佩（即和平後接收我所主辦的「海報」而易名爲「鐵報」的，那時任上海市黨部委員，向隨吳紹澍工作），他說：「必須與伯誠的案子一起解決，暫時也不可能先爲保釋。」佛海又想了一想說：「現在我的處境困難，等我在幕後活動後，將來如能達到目的，希望由你去出面辦理具保手續

。」我說：「祇要你交涉好了，我樂於負擔保的責任。」

事實上，那時佛海的環境也的確困難，與他交情較好的「梅機關」首領，又是汪政權的最高軍事顧問影佐禎昭，已經調往南洋作戰。繼他後任的是前廣東特務機關長矢崎堪十，與佛海之間相處得並不好。而且那時在「派遣軍總司令部」岡村寧次手下握有實權的辻政信，是一個澈頭澈尾的軍國主義者（即現任日本議員，著有有關中日戰事的書籍「潛行三千里」等著作多種，近仍常在報端發為高論，日人當時會尊之為「戰爭之神」，他在汪政權時代勢燄薰天，倡導所謂「東亞同盟」，並發起至奉化祭掃蔣太夫人墳墓，而對佛海則百計傾陷，一度且欲乘間鳩殺之）。蔣案的營救，在如此不利的情況下，真使佛海陷於最大的困難。

總算幾個月的努力，沒有白費，佛海兜過了在華的日軍勢力，逕與東京方面日軍最高當局接觸，理由還是抄襲了吳開先一案的老調。不過因為那時日軍在太平洋方面的戰爭，由偷襲珍珠港所獲得的勝利，已因美國麥克阿瑟元帥所領導的跳島作戰，日海軍已完全趨於頹勢。佛海的說辭，就針對了現局，以為要使日軍能全力應付英美在太平洋方面的反攻，必須先在中國拔出泥足，取得全面和平。而蔣伯誠為蔣先生之駐滬代表，為無可置疑之事實，不如將他釋放之後，責其在滬居間談和。像這樣可笑的理由，佛海在無可如何中，一用再用，而日本病急亂投醫，竟也居然一信再信。為此事幫助佛海奔走的日人，一是駐滬日軍「登部隊」的陸軍部長川本；一是佛海的密友岡田西次。他們兩人幾次為此事飛赴東京，千迴百轉，不知費了多少心計，東京大本營終於決定了由佛海方面負責將蔣伯誠以次全案人犯，准予一律保釋。

我還記得在此事決定的前幾天，剛剛軍統局的局本部秘書袁惕素潛返上海（袁現在台灣），因為

我與他的兄弟是朋友，托我爲他掩護。惕素與我一見面就問了我許多別的事情，我也告訴了他蔣伯誠恢復自由之事即將成熟，佛海且已通知我隨時準備辦理担保手續。袁惕素欣然秘密電告了軍統局本部，據說覆電上當局表示了很大的欣慰。因爲袁惕素以後將牽涉到我本身的許多問題，故附帶先在此一述我與他最初的一段淵源。

到正式辦理担保手續的這一天（日期我已完全無法記憶了），下午二時，我與另一位保證人徐承會齊（徐爲杜月笙在滬重要代表之一，當時頗得「登部隊」之信任，任爲囑托，年前在港以神經衰弱，服毒自殺），先赴上海日本陸軍部長川本在靜安寺路的寓所，由他派出了一名聯絡參謀，一同驅車馳赴貝當路憲兵隊，那時的隊長似爲杉原，一個肥矮而充滿殺氣的傢伙。起初延我們入會客室就坐，還預備了茶點，禮貌很週到。數語寒暄之後，杉原整一整軍服，立起來厲聲說：「蔣伯誠等一批人，今天已奉令准予保釋，但你們不知道保證人應負的責任？」說着取出一張預先寫就的保證書，上面是用日文寫的，他指着說：「蔣等保釋以後，（一）今後不得在佔領區再作任何政治活動；（二）如須離滬旅行，必先取得憲兵隊之同意，否則一切惟保證人是問。我與徐承會點了頭，又相視作了一次苦笑，取出筆來，迅速在保證人下面，簽字蓋章，辦妥了例行手續。於是，由杉原與我們一起到了西蒲石路蔣的寓所，蔣伯誠還睡在中間的房裏，但病况已有了很大的起色。其餘杜麗雲、蔣宇鈞、毛子佩、王先青與萬墨林夫婦等，杉原要他們排了隊，講了一次話，告訴他們今後應如何如何。最後要他們向我與徐承會鞠躬致謝。杉原才命令所有駐守的便衣憲兵全部撤退，杉原與川本的聯絡參謀亦自行引去。這樣，蔣伯誠等七人，才算脫出了日憲的直接控制，得以回復自由。蔣又與我們閒談了一陣，屢屢表示感謝之意。這是我第一次認識他，從此以後的兩年中，我成爲他與佛海之間的唯一聯絡人。

，我又爲他的經濟支持者，爲他的工作奔走與掩護者，我成爲他家的上賓。他給予我無限的鼓勵，許下了無數的諾言，我又爲他冒過許多危險，代他解除了若干困難。和平以後，使他以一個早已癱瘓了的人，竟能成爲上海著有最大助績的第一名地下工作者！

（五一） 被汪親自所否決的提案

在汪政權短短不到六年的時期中，我於身親目擊之餘，體驗到了一點，假如一個政權自己沒有獨立自主的實力，而想依附外力來圖存，結果未有不受壓迫，不被出賣的；也未有不將國家的主權與民族的利益斷送的。如其當政的人是真心與一個力量遠超過於自己的國家「友好」，這個人將是天真得到了愚昧的程度。如其你僅想一時加以利用，別人會比你更聰明，結果將是適得其反。汪政權的始末，正好給一切想依附外力，或借重外力而猶在自鳴得意者作一個殷鑒！

從汪精衛起以至他的幾個主要助手，最少我個人確信他們還不至於賣國求榮。他們從抗戰陣營中分裂，以至在敵人槍刺下建立政權，固然無可諱言每一個人除了想救國家於垂亡，也夾雜有一些私人恩怨，與若干意氣在內。但是也無可否認，汪氏的這樣做，還是抱着九一八事變後，他兼程回國時所說抱着跳火坑的決心。但是一着之錯，滿盤皆輸！他們錯誤的主要因素，一是對未來國際局勢的發展，有了錯誤的判斷，以爲日本不會與英美開釁。而自九一八國際聯盟李登爵士調查團沒有對日作正義的制裁，與緬滇公路被封鎖以後，認定英美不能有助於我，抗戰的最後勝利，前途感到一片渺茫。另

一原因是那時抗戰年餘，軍事上我們是敗得慘，而日本則勝得苦。雖然日本朝野，都已以對華侵略戰視為泥足，而近衛三原則在表面上還不是亡國條件，汪氏以為鬪武的日軍閱真會翻然改圖，如抗戰而最後失敗，則親日政權建立在先，日軍或不為己甚，甚至中山先生的大亞洲主義也可實現。當然，事後有先見之明者，對於他們此種想法，定會覺得荒唐。

而這一切想法的錯誤，其實也不必等到最後勝利纔發覺，汪氏等行抵京滬，置身虎穴，一旦與日本直接交涉，受到了咄咄逼人的反應，以及目覩了各地日軍的蠻橫情形，而日方所提「中日基本條約」的苛刻，已使汪氏等恍然於從前的判斷完全錯誤了。所以當汪氏與阿部信行簽訂條約的一天，汪氏會在衆目睽睽之下，凄然下淚。而汪政權的渴望能實現全面和平，俾以政權還之中樞，也實在是完全出於真意。汪氏等當時的處境是艱苦的，心境是沉重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儘管汪氏等沒有忘記國家民族之大義，千秋萬世，恐將終無恕辭！汪氏於離渝以後，提出了和平主張，如不因河內的一擊，息影赴歐，尚可優游餘年，恐也不至於悲痛悔恨之餘，遽爾病死異國吧？

周佛海時常向我慨嘆着說：「我們主張和平是爲了救國；但抗戰更是毫無疑義的爲了救國。」他對日人的橫蠻無理，常常表示憤懣，甚至在他的日記裏寫出「令人髮指」的語句。他是負責大部份對日交涉的責任，他知道得最清楚，他又說：「看來，我們是錯誤了，我們將不會有多大的作爲。盡了我們最大的心力，充其量日人想拿走一百分之十，我們予以掣肘，也只能拖住一百分之十。」懲治漢奸條例第一條就明定漢奸罪的構成要件，爲「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佛海於勝利後在首都高等法院受鞠時的抗辯，他說：「我的參加政權，前半段是通謀敵國，圖謀有利本國；後半段是通謀本國，圖謀反抗敵國。」不管別人對他的辯解如何看法，我則深信他的這幾句是事實，也是真話。

手不肯見至五日，在彭孚甫看至與龜至日，日且有代主任這假政權與其耳，他變成惛惛暴跳，完全失去了他平時溫文圓融的丰度。每次如「中政會」、「國府會議」、「行政院會議」開會時，往往會發爲盛怒，厲聲呼斥，有一兩次竟然把椅子都拋擲了。我前後參加過三四次「中央全會」，當汪氏分析到國際局勢以及國家前途，與當前的處境時，他的聲調由激昂而漸變爲低沉，再由低沉而變爲顫抖，最後是哽咽了，熱淚沿着他的雙頰直流下來，他用衣袖揩拭他的淚水，一面於嗚咽中匆匆結束，說出了「完了」兩字，聲音輕得幾乎完全聽不到。他每一次總是如此，現在留在此地的許多舊侶中，不少是當年汪政權的「中委」，他們與我一樣地會目擊過這悲涼的一幕，可以證明我所說的決非出諸虛構。

類乎這樣的情形太多了，我在這裏舉一個例子，以作爲對汪氏當時內心的說明。時期大概爲民國三十二年，汪政權又一次「中央全會」的召開，方在中條山作戰之後。許多「中委」們紛紛有照例的提案。依照會議慣例，也照例先交小組審查，許多都是官樣文章，沒有人注意到有任何特出的議案。會議開到第三天，已到了全部議案由小組審查完竣，提付大會通過的階段。汪氏是當然主席，那天他步向主席台時，顯得面色很難看，依了次序，有若干議案，已完全照小組審查意見通過了。下一案是「開封綏靖主任」胡毓坤所提的「擬請將中條山被俘淪軍成立俘虜營案」，大會軍事小組召集人是葉蓬，審查意見是：「擬請照提案內容予以通過。」原來抗戰時的中條山一役，國軍被日軍俘獲的達二三萬人，日軍就交給了汪政權處理，胡毓坤是直接辦理這接收事宜的人，因此會有這樣的提案提出。依當時汪政權表面的立場來講，既與重慶形式上處於敵對的地位，被俘的士兵以之收容於俘虜營，好似並不足怪。而汪氏一取這提案到手，突然重重的把桌子一拍，厲聲地說：「爲了國家拼死作戰的軍

人，日本人當他俘虜是必然的，他們抗戰難道不是爲了國家？我們也當他們爲俘虜，這是何居心？胡毓坤荒謬！葉蓬胡塗！否決！否決！否決！說完把提案重重一擲，珠淚又流滿了雙頰。全場竦然，心頭有說不出的另一番滋味。那天汪氏激怒的行動，決不是他的常態，這可以反映出汪氏的內心是何等的悲痛！對國家與抗戰是如何的看法。

（五二）陳公博完成了一半心事

汪政權中，自以陳公博與周佛海兩人爲汪氏的左輔右弼。佛海負擔了較多的實際責任，而公博提出了較多的客觀意見。雖然在汪政權中，公博以「立法院長」兼「上海市長」，汪氏逝世以後，又代理「主席」職務，位置一向高於佛海，但是因爲他始終不贊同汪氏的建立政權，又不滿於日本仍然以侵略爲目的的「和平」，他對汪政權的一切，絕不積極。他的所以參加，僅基於與汪氏的私誼，「士爲知己者死」的一語，害苦了公博。他自光緒三十三年就參加同盟會，而結果竟以「叛國」伏法。知公博爲人的，自不免爲之悼惜。

在汪政權的六年之中，我與公博很少往還，他當時的心情，我不够深切瞭解，但在勝利以後，民國三十五年四月，他在蘇州高等法院受訊期間，他不延聘律師，不推諉責任。被判死刑以後，不聲請覆判（即上訴），但求一死，且求速死。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他向蘇州高院提出自撰的答辯書，他說明不是希望對之輕判，而僅要求予以公開，使他於臨命之前，使世人稍明其心跡。他的話可信其尙

無諱飾之處，現摘錄其答辯書的點滴，以說明其當時的心境與態度：

「原起訴書中目我（公博自稱，下同此）爲『甘心降敵，賣國求榮，在敵人鐵蹄之下，組織傀儡政府，予取予求，唯命是聽。』至比汪先生爲張邦昌、劉豫。我雖不贊成汪先生組織政府，但如此比喻，殊爲不倫！在從前汪先生受人痛罵，數年以來，我都沒有替他辯護，因爲汪先生說過爲國家，爲人民，死且不怕，何畏乎罵？而且戰爭時期，最要緊是宣傳，非罵汪先生不足以固軍心，我認爲抗戰是應該，而和平是不得已。汪先生既求仁得仁，我又何必替他辯護？但現在不是抗戰時期，而是在勝利時期，汪先生也逝世了，我們已不需要宣傳，我們應該抑制感情，平心靜氣去想想，當日汪先生來京之時，淪陷地方至十數省，對於人民，只有搶救，更無國可賣。在南京數年，爲保存國家人民元氣，無日不焦頭爛額，忍辱挨罵，對於國人，只有熬苦，更何榮可求？我對汪先生的行動是反對的，而對汪先生的心情是同情的。到了今日，我們應該想念汪先生創立民國的功勳，想念他的歷史和人格，更應想想他在事變之前，事變之中，如何替國家打算，如何替蔣先生負責？……」

「不過我對於檢察官是很諒解的，當日我在重慶，在香港，極力謀黨的團結，國的統一，那情形太曲折而複雜了，並非今日檢察官所能瞭解。迨至南京以後，爲保存國家人民元氣，和日本苦鬥，如保存東南各省，使蔣先生能容易統一中國，那情形也太曲折而複雜了，並非今日檢察官所能瞭解的。在今日衆議沸騰，真相不明，尤其是政治是那樣困難而波折，承辦本案的檢察官，即使他心裏很明白，而又肯負責任，那一個敢挑起千鈞重担？說陳公博可以功罪相抵；那一個敢說陳公博無罪呢？」

「末了，我願意聲明的，我於自白書中曾幾次說：『我對於汪先生的心事是了了，而對於蔣先生的心事還未了。』所謂未了，因我想：如果中國今日還不能統一，恐怕更沒有良機，除蔣先生以外，

恐怕更沒有人統一中國。在日本投降以前，我的工作足鋪好一條統一之路，等蔣先生容易統一，最低限度當使東南不致有意外發生。在日本投降以後，我的心情是不願損害蔣先生的尊嚴，蔣先生要我離就離，要我回就回，要判罪就判罪，本身以爲服法的範則，使蔣先生更容易統一。本案說複雜是太複雜了，說簡單也太簡單了。因此請法庭隨便怎麼判，我決定不再申辯，不再上訴了。」

「我於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就任代理主席那天，曾發表聲明，說國民政府（按指汪政權）還都以來，自始即無與重慶爲敵之心。繼又強調聲明『黨不可分，國必統一。』我的聲明，當然是指在蔣先生領導之下黨不可分，國必統一，難道要在我陳公博領導之下來統一國民黨和統一中國嗎？」

公博的答辯，的確並非完全出之文過飾非，當時汪政權中人的心情真是複雜而矛盾，但是說是他們賣國求榮，完全忘記了國家民族，那未免太以成敗論人。我對於公博，也只有一句話可說，對他的心情是同情的，而對他最後束身待罪的態度是欽佩的。但我今天不避嫌疑爲他們寫出當年的事實，又何補於彼等身後之是非呢？

（五三） 南進北進所引起的揣測

日本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瀋陽北大營發動的事變中，一舉而佔有了我國東北四省。中國政府非但沒有作積極的抵抗，而且其後於一九三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簽訂了塘沽協定；一九三五年六月又簽訂了何梅協定（按何是何應欽，梅是日本在華北的駐軍司令梅津）。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日本更悍然

製造以彭汝勳爲首的「冀東反共自治政府」，使華北形成特殊化，整個華北也置于日軍的實力控制之下。九一八事變當時，也有所謂維持集體和平的國際組織，即日內瓦的國際聯盟是，但告朔餼羊，卻與現在的聯合國一樣，徒以姑息撫綏爲能事。對於九一八事變所特派的李頓爵士調查團，既絕未作出制裁方案，列強對此傀儡組織的「滿洲國」，亦且默認爲既成事實。在華東，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上海發生的「一二八」事變，結果在上海外灘英國總領事館所簽訂的停戰協定，又接受了在上海四周三十哩以內不駐紮正規部隊的屈辱條件。中國的退讓，卻助長了日本軍閥的氣餒，以爲滅亡中國，最多也只需三個月的時間，「大陸一元」夢，普遍地癡迴在日本軍人的腦海中。福兮禍所伏！日本軍閥於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的六年之中，在中國境內，隨心所欲，予取予求，這是中國受外族侵略的空前災難；卻是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迴光返照。日本於志得意滿之餘，既一誤於進行對華全面侵略；再誤於發動了太平洋戰爭。卒至自取覆亡，換來了日本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無條件投降。

太平洋戰爭是發動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距一九三七年的七月七日，剛好四年五個月的時間。日本在華軍事上的勝利，實際上並不能取得任何實際利益，徒然使日政府成爲軍部之附庸，而陸海軍之間，又時相齟齬，加以經濟混亂，物資缺乏。當日軍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佔領了我國首都南京，溯自八月十三日，淞滬抗戰起，至完成攻陷南京止，我國以最精銳部隊置於第一線，並以血肉之軀與猛烈的砲火相廝拼，也只抵抗了僅僅四個月，京滬全線，即告崩潰。但日本於作戰中明白了中華民族之不可屈。而且軍事進展愈速，地區愈廣，日軍即維持佔領區的點與線，也愈覺困難，乃恍然於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看法，完全是一個夢想。那時日本確已有了謀取全面和平之意，但政府在漢口時期德國大使陶德曼的調停最後歸于失敗以後，日方一面以軍事力量繼續向我軍壓迫；一面通過了種種

方式，以覓取和平之路。日本以戰勝國而急急求和，在歷史上是一個稀有的例子。日本於一九四〇年之所以促成汪政權，目的不在使國民黨因分化而削弱抗戰力量，其用意想利用汪氏在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的資望與地位，希冀假以達到其求取全面和平之企圖。

至太平洋戰爭前夕，對華的侵略戰爭，日本已感到曠日持久，泥足愈陷愈深。而所謂全面和平，走盡了無數的冤枉路，國民政府的答覆，是發出了抗戰到底的口號，使日本的和平希望化為泡影。但日本任何國策的決定，決不會事先謀之於汪政權，但汪政權中人默察日人對戰爭的狂熱，軍閥的老羞成怒，美國又凍結了日本在美的資金，與限制了戰略物資輸出以後，處境日感困難，軍閥們抱着一不做、二不休的心理，擴大中國地區以外之戰爭，形勢所趨，已有其必然性。問題是今後的日本，究將南進還是北進？當時揣測紛紜，只有很少數的人以為日軍如欲擴大戰爭，可能會出之南進之一途。而理由卻又顯得很薄弱，僅以日本陸海軍間之積不相能，早已成爲公開的秘密，海軍看到陸軍在中國境內的「赫赫戰果」，不免眼紅心熱，大欲一顯身手。在汪政權方面對於日本南進的看法，是認爲可能的成份很低。

北進，乃成爲大多數人所同意的看法。理由是：（一）日俄本爲世仇，况抗戰初期，蘇俄援助中國以抵抗日本的遠較英美爲多。而抗戰開始以後，一九三五年三月，既發生了在蒙古境內日俄衝突的諾門汗事件；一九三八年七月，又發生了滿洲境內的張鼓峯事件。舊恨新仇，日本當以一洩爲快。（二）日本的反共態度在那時是堅決的，近衛三原則中，就有一條是「共同防共」，冀東成立的傀儡組織，也以「反共」政府爲標榜。而汪政權之建立，更揭槩了「和平、反共、建國」爲政綱，意思就是和平纔能反共，反共纔能建國，而着重即在反共。日本既一切以反共爲鵠的，安有不北進之理？（三

（日本既與德國爲同盟國家，日德共同防共協定，簽訂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日德義三國的軸心同盟，又簽訂於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一切又均以防共爲前提。而那時，德俄之間，正在作殊死戰，希特勒一定要求日本分兵北進，直搗西伯利亞，而使蘇俄腹背受敵。（四）日本視滿洲國爲其禁臠，欲確保其安全，也必須掃除臥榻之旁的大敵。諾門汗事件的發生，就由「滿洲」與外蒙的疆界而起。（五）還有一個認爲堅強的日軍將作北進的理由，因爲如其南進，勢將與英美在遠東以及東南亞地區之利益，直接發生衝突。英國雖在歐洲方面自鄧扣克港大撤退以後，惴惴焉唯恐德國之進襲英倫本土，一時當然無力東顧。但是，日本與英國，既爲第一次大戰時代之盟邦，且美國的龐大海洋力量，恐日本尙非其敵，日本即使於日俄戰爭以後，驕滿得有些瘋狂，或者還不至有孤注一擲之勇氣。

上面這樣對日本的揣測，雖理論上不無有其根據，而日本爲自身打算，這種揣測，無疑成爲隔靴搔癢。迨珍珠港偷襲的彈聲一響，終於揭開了南進北進之謎。局外人對局勢演變的判斷，往往以常情來摸索別具肺腑的野心家，管窺蠡測，乃至毫厘千里，日本竟然選擇了一條把自己毀滅之途。

太平洋戰爭，直接關係到日本的悲慘結局，也連帶使汪政權同歸於盡。珍珠港的隆隆炸彈爆裂之聲，不啻是日本與汪政權的喪鐘狂鳴。當時日本何以會有此決策？這裏所提供的事實，係參考當時美國國務卿赫爾所著之回憶錄，以及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東條英機內閣之外相及大東亞相重光葵在巢鴨監獄以甲級戰犯服刑時所著「昭和之動亂」一書爲據。以兩人會身親其事，既是直接的第一手資料，其所述之內幕，應該是相當可信的。

(五四) 發動太平洋戰爭的內幕

其實，日本以蕞爾島國，人口劇增，想以侵略達成其擴張領土之野心，並不在對華全面侵略戰爭始有此擬議。當「一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內部發生了二二六叛亂，使軍閥勢力抬頭，對外又宣佈廢棄了海軍條約，陸軍以防止我國反攻爲理由，把軍事預算無限制地劇增；海軍又以加強國防爲名，無限制地製造軍艦。海軍的目的，主要在與陸軍取得勢力的平衡。擴軍也必然就是備戰，陸軍主張北進，以蘇聯爲假想敵；而海軍則主張南進，以荷印資源爲目標。但海軍反對陸軍在東北與華北的作爲，而陸軍則認南進爲危險而又愚蠢。一九三六年，日本號稱收拾「二二六」事件的廣田內閣，於那年八月七日，舉行包括首相、外務、陸軍、海軍及大藏的五相會議，竟然以陸軍主張的北進，與海軍主張的南進，同時決定爲基本國策綱要。

而最後，日本卒放棄了北進政策，改而南進，其間綜錯複雜的原因，造成了天奪其魄的結果。首先，自對華侵略戰爭發動之後，日本成立了大本營，變成爲戰時體制，軍費乃成爲無限度的支出，隨着戰爭的逐步擴大，不得不以濫發紙幣來彌補戰時的財政。又因物資缺乏，物價暴漲，於是施行了經濟管制，而世界市場既被遮斷，亞洲局部的貿易，使日本經濟更形萎縮。

德國在歐洲方面初期壓倒性的勝利，給予日本以最大的影響。在太平洋戰爭的前夕，日本相信希特勒已贏得了勝利，並將確保其勝利。德外長里賓特洛甫對日本駐德大使公然表示，英國的崩潰

，僅是時間問題，而且已爲期不遠。日本爲所迷亂了，他們正在考慮，假如德國真的確保其勝利，那末，在東南亞地區的英法荷殖民地將怎樣呢？如被德國佔領在先，勢將發生第一次大戰日本爲南洋委任統治地區從德國接受時候的麻煩。而德政府又不斷向日本軍部游說：「日本必須利用現階段的情勢，向東南亞推進而攻擊新加坡，在大英帝國崩潰之前，獲取英國在東南亞的權利，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軍部方面既躍躍欲試，而促成這項南進政策的重大關鍵，幾繫於那時近衛內閣的日外相松岡洋右一人之身，他簽訂了日德義三國同盟，實行軸心政策，使與英美法民主國家形成對立，並且劃定了軸心國戰勝後的勢力範圍，許日本爲整個東亞的領導國家。那時日本的國策，由此已改爲北守南進。松岡爲了實現南進政策，於一九四一年三月出發訪問德義，當他途經莫斯科時，曾向蘇聯提出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以爲南進政策的後盾。當他返日的歸程中，再度經過莫斯科，竟與蘇聯簽訂了日蘇中立條約。據重光葵所知道：松岡在柏林的時候，已從德國政府獲悉了攻蘇的計劃，日本提出的中立條約，本不爲蘇俄所歡迎，而松岡竟洩露給史大林以這一個德國將攻蘇的重大秘密。可能他的作用在使史大林怕德日兩面夾擊，而予以就範。果然，蘇俄卒讓步而簽訂了這一項中立條約。這一個傳說是有幾分可信的：那時的史大林是何等聲勢，松岡以區區一外相，當其由莫斯科啓程返日時，史大林突然出現於車站送行，擁抱着松岡說：「我也是亞洲人。」這一套把戲，使松岡有受寵若驚之感，從此解除了對蘇的敵意，以全力進行實現南進政策，松岡竟一手奠定了日本未來可悲的命運。日本對於蘇俄既已無所顧忌，對於英國，更以爲崩潰在即，是否南進的關鍵，僅繫於與美國的交涉。

一九四一年一月，野村吉三郎海軍大將，被發表爲駐美大使，表面上是爲了調整美日兩國漸趨惡化的邦交，而松岡所給他的訓令，要使美國對於日本的軸心政策，發生恐懼而防止其參加戰爭，堅囑

不許有絲毫要求妥協的表示。野村抵美後對松岡的警告置之不理，不斷與美國朝野爲改善關係而接觸。至四月，美國國務卿赫爾交給野村一個「日美諒解方案」，內容包括下列數項：

- (一) 日美兩國所抱的國際觀念及國家觀念；
- (二) 兩國政府對歐戰的態度；
- (三) 兩國政府對中日戰爭的關係；
- (四) 在太平洋地區的海軍兵力及空軍兵力和海運關係；
- (五) 兩國間的通商及金融合作問題；
- (六) 兩國在西南太平洋地區的經濟活動；
- (七) 有關太平洋地區的兩國方針。

以上各項，如美日能正式達成諒解，羅斯福總統而且準備與近衛首相在夏威夷會見，再商討簽訂具體協定。其實，雙方的意見，無論如何是無法接近的，美國藉此拖延以備戰，而日本則是在找尋開戰的機會，爾虞我詐，各懷鬼胎。但是並不主張與美國開釁的近衛，接到此項報告後認爲滿意，立刻召開聯絡會議，席上統帥部與內閣的意見，完全一致，主張與美國開始談判。正當此時，赫爾又向野村提出了稱爲「赫爾四原則」的，以作爲談判的前提，其內容爲：

- (一) 尊重各國主權；
- (二) 不干涉他國內政；
- (三) 尊重機會均等的原則；
- (四) 維持太平洋方面的現狀。

日政府對此四原則，正擬接受之際，恰值松岡再度訪問德義後行抵東北，立電日政府要求俟其回日後，再作答覆。在這機會稍縱即逝之頃，遂使美日談判喪失了一個最好的機會。原因松岡在訪歐期內，已爲希特勒、墨索里尼所說服，倒向軸心，立意與英美爲敵，所以在他經過莫斯科時，曾對美國駐蘇大使口頭聲明，警告美國不要亂動，如美國對德作戰，日本也不會袖手。希望美國考慮三點：一、不參戰；二、設法勸中國和平；三、不許有影響三國同盟的舉動。此外，並且強調了德國必勝。松岡回到東京後，又電赫爾謂需要兩星期時間考慮，才能對四原則有所答覆。而此時因美日間進行談判，德國向日本提出了抗議。松岡迅速通知德外長里賓特洛甫，日本決以三國同盟爲中心，絕對不中途變更，同時又將「日美諒解方案」秘密告知德義。旋松岡以爲赫爾的備忘錄是干涉了日本內政，又訓令野村予以退回。日美談判，至此乃益趨惡化。

迨近衛第三次內閣成立，始將松岡逐出，並任命豐田海軍大將爲外相，負責美日間的談判，但一切爲時已太晚了。軍部的南進政策，始終在積極進行，日軍且已佔領了越南北部。美英爲阻止日本的軍事行動，決定禁止戰略物資輸日，凍結日本在美商人的資金，又公佈了廢棄通商條約，更對日進行A（美）B（英）C（華）D（荷）的政治經濟包圍政策。在太平洋戰爭的前五個月，日本舉行了一次御前會議，有一項重要決定，即：「進攻越南南部，不惜與英美一戰。」但日皇曾經問永野軍令部長與美作戰的前途？永野的答覆是：「對美戰爭實力不能維持到一年半以上，勝利無把握。」

豐田登台後，繼續訓令野村與美談判，近衛且曾建議與羅斯福總統直接會談，美國也已同意此點，並指定阿拉斯加爲會談地點。但對主要問題如三國同盟、中國撤兵、南方撤兵、恢復通商等談商，均無結果。美國對此，遂表示冷淡。其間美國也曾作種種讓步，如承認「滿洲國」問題，透露可由中日

兩國間以友誼方式談判解決。汪政權問題，美國可勸告重慶政府於和平實現後合流等（見日人依據其政府檔案所著「旋風二十年」一書之記載）。日本於是年九月間又召開了一次御前會議，決定十月上旬，美日談判如仍無結果，即行開戰。而癡結所在的自中國全部撤兵問題，日本無法接受。十月中旬，因與美談判無結果，而迫使第三次近衛內閣垮台。日本陸海軍的焦躁，又已達於極點。認為非南進獲得石油等與其他資源為補給擴充，日本將坐以待斃。而日皇召集重臣會議的結果，以認為對軍部有統制力的東鄉外相，更用原任駐德大使來栖協助野村繼續對美交涉，日本一面提出新方案；而一面又以新任之東鄉外相，更用原任駐德大使來栖協助野村繼續對美交涉，日本一面提出新方案；而一面又以電報訓令野村來栖，不可過於妥協。但是美國國務院已將日本密碼譯了出來，完全窺破了日本的詭計。

於是迫得赫爾召集了中英法荷等九國條約有關國家，討論答覆日本最後提案。十一月二十六日，美國將正式答覆遞交日大使，內容為：「一切恢復九一八事變以前狀態，不但需由中國大陸撤兵，而且也要由東北撤兵。」美國這是攤牌的行為，因為明知日本絕對不能接受。而美國的答覆，乃促使日本猶豫與反對的人士，也變為贊成開戰，軍部乃下令艦隊集中千島備戰。十一月二十九日，又開重臣會議，對於南進政策，竟無一人表示反對。太平洋戰爭也從此作出了最後決定。

美國赫爾國務卿本來已約定野村、來栖兩大使於十二月八日下午一時進行重要會談。依據哈古條約規定，戰爭必須事前通告，而日海軍希望通告與戰爭的時間，儘可能縮短，以便於突襲中收穫更大效果。軍令部強硬主張談判結束的通告，須縮短至開始進攻前三十分鐘以內。美國駐日的格魯大使，尚於開戰前夕，以羅斯福致日皇要求和平的電報，訪東鄉外相商洽辦法，但一切已經太晚了！東鄉半夜入宮面呈日皇，珍珠港的偷襲，已經開始。格魯大使收到東鄉故意延遲積壓的開戰通告時，廣播電

台早已播出了日本對英美開戰的消息與日皇的詔書。珍珠港、香港、上海等處的隆隆炮聲，已震動了整個世界。歡迎日美開戰的英國邱吉爾首相聽到日本開戰的消息，欣喜得大聲呼喊：「這樣，我們可確定將獲得完全的勝利！」但是，汪政權中人，當時又怎樣呢？

（五五）斷定了日本失敗的命運

正如勝利後陳璧君在蘇州高等法院法庭上講的話：假使「一二八」日本投向珍珠港的炸彈改投到西伯利亞去的話，不但二次大戰的歷史要完全改寫，而汪政權的最後下場，誰也無法斷定其將為失敗或是成功。

一九四一年，即民國三十年的十二月八日，那天我在上海，氣候已經顯得十分寒冷。從國軍撤退四郊的炮聲沉寂以後，租界中歌舞昇平，另有一番畸形繁榮的景象。雖然有人預感到日本會在中國戰場以外擴大戰爭，但當太平洋戰爭發生的前夕，誰也沒有嗅到過這一股即將爆發的戰爭氣息。

那晚，我回家比平時為早，午夜以後，早已擁着重衾，酣然入夢。朦朧中忽然為接連的巨大爆炸聲所驚醒，揉一下倦眼，側耳細聽，聲音卻愈來愈大，而且相距甚近。我急急地披衣起床，在萬籟俱寂的時候，我已可清楚地分別出那是爆炸與步槍的聲音。我想：或許租界中發生了什麼局部的變故；也或許浦東方面的游擊隊開來襲擊。我拿起床頭的電話分機，打到我所主辦的「平報」去詢問，報館的總編輯告訴我，是日軍開進了租界，意向不明，現在情形很混亂。報社已經派出外勤記者去採訪，

俟獲得結果之後，會以電話再向我報告。我感覺到不安，最後決定還是親自往報社去，希望知道日軍開入租界的真相。

當我驅車經過寂靜的法租界馬路時，全市已經宣告戒嚴，軍警的佈崗情形，足以顯出事態的嚴重，幸而我車上懸着顯著的特別通行證，一路並無阻礙。當汽車由愛多亞路轉入公共租界時，我已看到了有日軍駐崗。日軍的黃色制服，與一頂尖角向前面突出的軍帽，很容易辨認，我完全證實了日軍的確已進入租界採取行動。基於過去一直以爲日本決不敢與英美爲敵的心理，我又在想：大約是日軍幫助汪政權收回租界罷了。誰會料到日軍在建設「大東亞新秩序」的口號下，竟然掀起了他們所稱的「大東亞聖戰」！！

等我到達報館後，採訪人員已經回來，初步證實了三點：（一）這不是上海租界一隅的事件；（二）租界的軍警，幾於完全無抵抗而讓日軍長驅直入；（三）把我從睡夢中驚醒的爆炸聲，是租界當局自己炸沉停在黃浦江中的鉅型船舶，以免供敵利用。其中最大的一艘，是當時最豪華而行駛於歐洲遠東間的意大利郵船「康脫羅梭」號。在黃浦江畔遙望，已可看到船身傾側，在漸漸向江心下沉。

關於報上新聞的處理，尤其感到爲難，我們將採取怎樣的態度？時在深夜，又逢變亂，已經無法與有關方面聯絡，幸而最後那時日本的國家通訊社「同盟社」已有稿件送來，纔知珍珠港、香港等地日軍同時進行襲擊。在英美猝不及防的情形之下，日軍且已取得了初步勝利。此時上海租界以內的槍聲與爆炸聲，漸次停止，可見日軍已完成佔領上海的租界心臟地區。

在這樣一個劇變中，而佛海剛又留在南京，許多事情，我與他都有接洽的必要。因此，我與報館的全體職工，一直守候到天明，安排好了翌日的報紙以後，我就匆匆搭乘京滬早車趕往南京。

當午間抵達佛海西流灣的京寓時，他的家人告訴我佛海一早就到頤和路汪公館開會，現在還沒有回來。我一直等待着，我希望他能帶回一些消息給我。約摸又經過了一小時餘，佛海纔很頹喪地回家，他看到我，僅勉強點了一下頭，神態不似平時那樣安閒。我感到情形有些不好，但又不便緊緊的立刻追問，也就彼此無言相對。

我們一起午飯以後，他精神纔稍稍回復了一些。他問我趕來是不是爲了戰事的緣故，我還沒有答覆，佛海已接着問，上海的情形怎樣？我說：到我搭車的時候爲止，居民除了受些虛驚以外，表面上還平靜。報館中所得到的消息，地方上也沒有什麼破壞，大約日軍已經順利完成進駐了。我問他今天汪公館開會的結果怎樣？今後我們將採取怎樣的態度？他發出了一聲微喟之後，詳細地爲我解釋，他說：「今晨汪先生接到了日本總軍司令部與日本大使館的正式通知以後，臨時召集了一次高級幹部會議。汪先生很震怒，以如此重大的問題，而日本於作出此決定之前，我們竟然一無所知！汪先生以爲日本在反英美口號下發動新戰爭，如此蠻幹，自己將註定其失敗的命運，而日本竟然如此的愚昧與魯莽，也完全出於他的意料之外。汪先生今天似乎異常激動，在他發言的時候，完全失去了平時一般的態度。」佛海又說：「我與公博等的心緒，也是同樣的複雜，我們有一些矛盾的想法：到今天爲止，日本已自己一手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悲局，四年抗戰，到現在才露出了一絲曙光，瞻望整個國家民族的前途，覺得無限興奮。但也不能不承認，三年前我們對局勢的估計是錯誤了，一切的作爲，雖惟天可表，但我們應該對國家負起錯誤的責任。同時，對自己未來的遭遇，也覺得黯淡而渺茫。至於今後問題，處身在人家軍事佔領地區的槍刺之下，我不敢說會有什麼成就，預料如日本在太平洋方面的戰事能够順利，軍人的氣餒，勢必更加囂張；否則，他們在我國的淪陷地區，搜括物資，也自必加緊

，態度也必然更兇惡。總之，我們的處境將更加艱苦，應付也將更加棘手，現在談不到什麼態度與辦法，我們只堅持一個原則，隨機應付，盡心力來保全國家的元氣，保護人民的被迫害，做一分是一分，誰還敢說會有什麼把握？」

我所知道太平洋戰爭發生時汪政權的真實情形是如此。前幾年有人寫過太平洋戰爭的發生，是出於汪氏的建議與慫恿，未免與事實相距太遠了，我敢斷言其是完全出於臆測。

（五六）武裝抗日外的和平抗日

太平洋戰爭的發生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一九四一），而汪政權終於在三十二年一月九日（一九四三）宣言參戰。明知日本最後的必將失敗，而仍然作出此項一時令人難以索解的決定，汪政權是否真的想與日本「同生共死」？要說明汪政權所以參戰的原因，應該從日本與汪政權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四日簽訂的「中日基本條約」說起。

民國十三年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之前所簽立的遺囑，誰都知道是由汪氏執筆起草的。在這短短數十字的遺囑中，反覆說：「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廢除不平等條約」，而汪氏所手簽的「中日基本條約」就是一個澈頭澈尾的不平等條約！汪氏自己又豈有不知之理？更安有不痛心疾首之理？該項「條約」自一九三九年底在上海與日本開始交涉起，至一九四〇年冬簽字為止，中間也經過了年餘的時間。所以遲遲不簽的原因，是汪政權還在盡力掙扎，還在希望能從努力中獲得改善。汪氏自己不斷

汪方，還沒有開始討論前，陶希聖高宗武因奉命參加之便，持有原稿，即挾之赴港，全文並且在報紙公佈，會引起全世界輿論的一致指摘，連日方也爲之手足無措。佛海當時告訴日方的首席代表影佐說：日本要求得世人的諒解，只有以事實來證明所宣佈草案的內容爲不確。佛海的激將法卻並不會生效，日方始終並不會作多大讓步，雖有若干點曾經略爲改善，但綜觀全部的內容，依然是一個不平等的條約！

對於「中日基本條約」，反對得最厲害的是陳公博。公博本反對汪氏組「府」，更反對這一個條約的內容。當汪政權與日本交涉時，汪氏本欲叫公博參加，而公博堅持不肯，他說：「草案的交涉，最多只是文字上的修改，實質上日本是不會讓步的，我參加了不會有好處，反而使我以後不能再表示反對。」迨「條約」簽訂以後，一次，那時日本駐在南京的大使阿部信行（也就是代表日本簽字的特使），問公博這個「基本條約」會不會發生影響？公博答覆得很妙、很乾脆，他說：「絕對不會發生影響。因爲第一、所謂基本條約，顧名思義，應該謀兩國的根本大計。照這個條約內容，連停戰協定都够不上，更談不上基本。第二、照「近衛聲明」，口口聲聲說東亞新秩序，而基本條約的內容，無一條不是舊秩序，而且是舊秩序中最壞的惡例。不過這個條約固然發生不了好影響，也再不會發生惡影響。」阿部又問公博這是什麼意思。他又說：「一般印象已經壞極了，大家都對日本不諒解，這個條約不過是對日本不諒解中的一個證明而已。」（談話係引用陳公博於三十五年四月五日在蘇州高等法院的當庭答辯辭。）其他汪政權的重要人物對「條約」的觀感，大致也與公博相同，他們也無日不在處心積慮地希望廢止。因爲參戰以後，勢必另訂一個同盟條約，所以參戰就是爲了廢止「基本條約」。

約」的一個手段。果然汪政權於參戰之後，於三十二年底與日換訂了一個「同盟條約」，內容雖仍然不會達到理想的境域，但終於取消了「基本條約」時代的一切密約附件，更取消了所謂東北駐兵與經濟合作，而且更將內蒙歸還中國，所剩下的只有一個東北問題。

因參戰而廢除了「基本條約」，確然對汪政權有利，但參戰以後，也給汪政權帶來了更大的麻煩。當時的日本人時常以半真半假的態度，向汪政權中人說：「重慶是武裝抗日；而你們則是和平抗日。」日人當時似乎有個感覺，有了一個汪政權，非但不足為助，而且給予以更多的掣肘。關於汪政權參戰以後，與日方的鬥爭，這裏舉出兩件較大的例子：

一、日本在中國廣大的戰場上，拖住了日軍三四百萬人，太平洋戰爭發生以後，日本尤感到兵力不敷分配，曾經屢次逼迫汪政權，欲以朝鮮人台灣人視中國人，抽壯丁以為日本作戰。關於日人希望把「和平軍」的抽調，汪氏以確保地方治安為辭，予以拒絕；要徵集壯丁，訓練參戰，汪氏又去就力爭，不予置理。這幾乎成為當時淪陷區盡人皆知的事實。汪政權名義上是參戰，事實上始終未派過一兵一卒，實際去參加戰爭。這是所謂同盟國間的一個奇談，也是一個奇蹟！

二、日本的目的以戰養戰，以中國資源的豐富，日本原欲竭澤而漁，而汪政權則以阻撓遲延為手段。於是日人索性對米糧、麵粉、紗布等成立統制會，由日人把持，以削減汪政府的權力。上海日軍管理物資運送的一個小小「第七出張所」，其權力且高過於汪政權的「實業部」。日人主要的物資對象是三項：（甲）米糧。日本因為不能予取予求，於是自己劃定了「軍米區」，向農民直接強迫收買。而汪政權則以必須先配給民間足夠的糧食為抵抗，甚至槍斃了舞弊的江蘇與南京糧食管理局長后大椿與胡政。（乙）紗布。汪政權堅持先從日本廠商開始，對華商方面的收購，買價不以「中儲券」

走一匹。(丙)徵集廢銅廢鐵。汪政權暗示各地軍警，不予合作，除若干大廈中之暖汽管外，民間家宅的鐵門鐵窗，全未拆除。當時處身於淪陷區的人，可以證明我的說法，我決無意於爲一個失敗了的政權，於事後再爲無聊的文飾。在如此情形之下，試問汪政權是否成爲一個和平抗日的組織？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第1册

作者:朱子家著

页数:178

出版社:春秋杂志社

SS号:12577862

DX号:000007592885

<http://book1.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7592885&d=7A11DD7A0327E1B92320FC9157846962&fenlei=11030503050705&sw=%CD%F4%D5%FE%C8%A8%B5%C4%BF%AA%B3%A1%D3%EB%CA%D5%B3%A1>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 一 身历了一幕历史的悲剧
- 二 一个似曾相识者的出现
- 三 大雨滂沱中重晤周佛海
- 四 德大使调停失败的秘闻
- 五 近卫三原则是怎样来的
- 六 汪精卫怎样脱离了重庆
- 七 河内高朗街的枪声血痕
- 八 香港成为最早的发祥地
- 九 我提出了一连串的疑问
- 一〇 形势迫得我作一个选择
- 一一 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弄
- 一二 七十六号中的丁李搭档
- 一三 在沪积极展开政治活动
- 一四 登场第一声的六全大会
- 一五 陈公博无奈一死酬知己
- 一六 汪日幻想中之全面和平
- 一七 高宗武陶希圣何事叛汪
- 一八 公馆派与 C C 间的暗潮
- 一九 周佛海左右之十人组织
- 二〇 郑苹如谍刺丁默村颠末
- 二一 如此这般的双方特工战
- 二二 追悼会终于引开了杀戒

- 二三 上海为腥风血雨所笼罩
- 二四 特工战中申报首当其冲
- 二五 金华亭被杀是自取其咎
- 二六 我逃过了五次危险关头
- 二七 日军阀徘徊于和战之间
- 二八 青岛会谈后三政权合流
- 二九 吴佩孚汪精卫鱼雁不绝
- 三〇 为民族英雄乎为汉奸乎
- 三一 非驴非马的青天白日旗
- 三二 同舟胡越凄其一纸名单
- 三三 千回百转中的人事安排
- 三四 揭开了历史悲剧的序幕
- 三五 汪精卫两行酸泪立阶前
- 三六 六年中的财政经济概貌
- 三七 法币与中储券两度折换
- 三八 汪日经济斗争又一回合
- 三九 纱布收购后的三项去路
- 四〇 汪周间仅有一次的误会
- 四一 周系十人组织暗潮初起
- 四二 三个人分成两派的习性
- 四三 税警团成为内讧导火线
- 四四 关于清乡的一幕争夺战
- 四五 我处身在内讧的夹缝中
- 四六 李士群是怎样被毒死的
- 四七 隔室中传来一阵哭声
- 四八 吴开先被捕与回渝内幕

- 四九 日宪兵救了蒋伯诚一命
- 五十 保证人所负的两项责任
- 五一 被汪亲自所否决的提案
- 五二 陈公博完成了一半心事
- 五三 南进北进所引起的揣测
- 五四 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内幕
- 五五 断定了日本失败的命运
- 五六 武装抗日外的和平抗日